



海河红浪

王 明 著

天津工厂史丛书

海 河 红 浪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锦州道6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1/2 字数101,000

1960年6月第1版 196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

天津工厂史丛书序

“天津工厂史丛书”的编辑出版，是想把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間，天津工人进行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以便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进。

工厂史的写作，是由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倡议的，并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赞同，和广大苏联作家和工人的热烈响应。在二十到三十年代期间，苏联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在高尔基亲自主持下，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对苏联的工人阶级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整理和保存了大量有关苏联工业发展的宝贵史料，还培养了一批为数不小的优秀的工人阶级作家，成为整个苏联文学队伍的组成部分。

天津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就是受到了苏联先进经验的启示，在中共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的。一九五八年，是一个伟大的、难忘的时代！中国人民以巨人般的步伐，跨过重重困难，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天津工人写作工厂史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年月

开始的。工人们意气风发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劳动，同时，回忆到了过去的黑暗年代，悲惨生活以及英勇的斗争，而更加鼓足干劲，为彻底埋葬旧生活和迅速建立新生活进行了胜利的战斗。

“天津工厂史丛书”，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精神特征的反映。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来说，大部分还是旧生活的回忆，但其中已经包含着有觉悟的对比；包含着对于以往反对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光荣自豪；而且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信心。就这个意义上说，一九五八年工厂史写作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正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革命热情高度昂扬的表现。事实上，写作工厂史活动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不但发动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参加提供材料和进行写作，并且每一篇优秀的工厂史作品的出现，都立即变成了良好的工人教材，随时随地起到了鼓舞和教育的作用。同时，就是在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集体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涌现出来了一批积极的、有才能的工人作者。

在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各工厂党委积极领导了这一工作。因此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获得比较大的成果。工会、青年团和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学生，都是这一活动积极赞助和参加者。不少的作家，直接参与了编写和整理工厂史稿的工作。

“天津工厂史丛书”，就其内容来说，是丰富的；就形式来说，也是多样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

是群众性的创作。关于它的许多想法和做法，以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还不能说是成熟的，还有待于在实践中逐步解决。但是作为天津工人阶级在描写自己的生活和斗争，在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感情，在描写工人阶级伟大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他们已经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一九五九年六月

目 录

一	“上信堂”的秘密.....	1
二	鬼子盖起大工厂.....	7
三	一九三九年大水.....	11
四	劳动二十四小时.....	16
五	童工苦.....	20
六	女工刘玉兰的遭遇.....	24
七	“泡”、“跑”、“偷”.....	30
八	“商閻王”毒打施长月.....	37
九	纪雪元九死一生.....	41
十	工人怒打日本厂长.....	46
十一	汽车司机左振玉.....	50
十二	第一个回合.....	57
十三	“关钱跑接力”的日子.....	62
十四	一个不“买账”的工会.....	66
十五	中心公园东南角.....	71
十六	赶走杨家父子.....	77

十七	斗争狗腿子張文福	82
十八	包围办公大楼	87
十九	捣毁水上派出所	93
二十	一张名片四个人	101
二十一	鄒廣华收买打手	107
二十二	流氓拙定“苦肉計”	113
二十三	五月五日端午节	119
二十四	斗争并没有停止	124
二十五	和黄色工会搏斗	132
二十六	法庭上的丑剧	138
二十七	报喜的枪声	145
二十八	枪决商子林	149
二十九	搬掉石头做主人	154
三十	一次光荣的记录	159

后 記	166
-----	-----

一 “上信堂”的秘密

我們工厂紧靠着海河西岸。过去，从我們工厂后身对过的南場到第一工人宿舍的四周牆角下面，常常能看見一些埋在地下的三角形的界石，上面刻着“上信堂”三个紅油的大字。年深日久，誰也不再去过問它的真正来历了。因为孩子們把它当馬騎，有的石头已經被磨蹭得光溜溜的了，有的或許是因为修馬路，挖溝蓋房被埋在地底下了，还有的干脆就因为碍事被挖出来扔了。可是，正是这些石头記載着我們工厂的建厂历史，也正是这些石头是日本鬼子沒有进中国以前，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見証。

提起这話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一九三六年的时候，天津东南角海河边上是一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菜园子；还有一些葦地。有一条走大車的土道从城里直到下边的“小站”。当时人們管这条道叫海大道（即現在的大沽南路）。这条道上經常有六、七寸厚的浮土。刮風天是塵土飞揚，对面不見人。要是一下雨，你就看吧，大車常常把整个轆轤都陷到烂泥里，有时累的人仰

馬翻也拉不出来。

这条大道的中間有两个村庄，一个叫宣家楼，一个叫陈塘庄。兩村相隔有二里多地，共有百十戶人家。这些住戶都是农民，有的是租种地主的土地，也有的是靠自己三亩五亩的菜园子地过活。大部份都是靠着到城里卖菜生活。别看这儿路没人修，一片都是大开洼，可是，一提起陈塘庄的土地，农民們都要伸出大姆哥贊美的說：“那可是好地方啊！兩脚往地上一踩都往上冒油！”意思就是說这片土地是非常肥沃的。沒有碱，靠海河澆水方便，地势高又得風。据說萝卜长的又大又脆，如果手里拿着一不小心掉地上，就会摔的四裂八瓣。白菜长的有兩岁小孩那么高。韭菜象小姆指头那样粗。当地农民夸耀这片土地是“刮金板”；一年年春种秋收，就是靠这块土地来养活一家老小。

春天，有一天从城里开来一辆小汽車，当时人們都管这种汽車叫“四輪电”。小車在馬路上跑的烟塵滾滾。这下子把四野的人都惊动了！擲轆轤澆园的人也停止不澆了，蹲在地上拣草的人們也站起来了，打尖捏菜的女人們也奇怪的不干活了，孩子們叫嚷着从村子里跑了出来……因为这个地方从来沒有来过这样車，当时就是在城里也是不多見的。若說是走亲戚，这儿誰家会有这样的闊亲戚呢？若說是办公事，这儿又都是种菜的老百姓，那么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呢？

車停在海大道边上，車門打开了，从上边下来三、四

个人。有拿着文明棍穿着西装的外国人，也有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带着这些人往地里走来。一边走着一边指东望西的说着。外国人也拿着棍子指指点点，问这问那儿，大皮鞋在菜园子里踩来踩去。一脚下去，一排又青又嫩的小秧就都被踩倒了，小西葫芦被踩的“叭叭”乱响！

他们相看了老大一会儿，又“哇啦”了老半天，就又上车飞一样往城里跑去了。

对着这些莫名其妙的人，人们就乱猜开了，有的说：“城里有的是好地方，偏偏到菜园子来逛！”

也有的说：“吃饱没事干的，出来见见风！”

但是老人们可不这样想，他们说：“夜猫子进宅，这不像吉祥事！”

果然，没过几天事情全明白了。原来坐汽车来看地的人是日本东棉洋行在天津的负责人。他们是来踩地盘准备盖工厂的。

当时的中国政府虽然腐败无能，可是在表面上总还得装着点架子。规定外国人不能买中国的土地，但是洋人可不管这一套。东棉洋行通过日本领事馆直接向中国政府交涉，提出要买土城、陈塘庄一带的土地盖工厂。中国政府又不敢不满足洋人的要求，怎么办呢？最后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由天津市警察局给日本人开了一个有三十公分见方的“永租”字据。内容大意是：日本人可以永远租用土城和陈塘庄一带的土地。并且上面盖有当时天津市警察局

长程希賢的官印。

这样一来，日本人强購农民的土地变得更合法了，也就忙坏了为洋人效劳的狗腿子們。现在讓我們介紹一下，看看当时帮助洋人盗卖国土的都是誰？

张雨生，当时有四十多岁，是东棉洋行专管买卖棉紗“跑合”的。东棉洋行卖出买进的棉紗都要經過他的手。这个人是整天轉悠在日本人脚下的忠实走狗。买地的时候，日本那方面的事务，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东棉洋行东京总店負責人黑田，特为买地的事坐船从日本来到天津，黑田亲自对张雨生說：“地，只要你看得过眼去就买，賬，开条子就报，我們大大的信服你！”张雨生碰到这个能捞一把的机会当然不放过。可是他对陈塘庄一带的情况不熟悉。于是他就找到一个在北洋紗厂当會計科长的程文林。这个人当时人們都喊他“程七爷”。有这样發財的机会，程文林当然也願意效劳。于是“承上启下”在中間跑腿联络的事就都由张雨生包下了。

另一个就是陈塘庄的百亩地的大地主、村付、脚行头张文鼎。这个人是土城、陈塘庄一带的坐地虎，农民們見着他都要鞠躬，喊他一声“张老爷”，他个子不高，长着一对老鼠眼睛，三角眉毛往下搭拉着。誰都知道他表面上不声不响，可是小眼睛一轉，一肚子坏主意。日本人来了，他老远地就摘下帽子猫着腰迎接，到跟前就象一条哈叭狗一样，搖晃着尾巴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跑来跑去。給日本人买地，跟农民打交道的事，全部由他办理。通过他又搬

出村子里一些所謂有头有面的人物，什么紳士、学董……讓他們出头当“中人”。这些家伙聚集到村子里小学校开了个会，一致表示：“这事出在咱庄子上咱得帮忙，人家外国人叫咱办事是看得起咱！”于是，张文福就带着这些人，腰里掖着槍踢破了这一带所有人家的門坎子。

农民們听說要失去土地，还没有来得及設想一下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张文福就領着人来了。同意卖，当然没有什么話說，不同意卖，那問題就来了，他先連軟帶硬的說：“……往后洋人在这开办工厂，不会进工厂混事嗎？比你咱这几亩地活着不强！”如果再不同意，他就把脖子一揚，慢声慢气地說：“那……好吧！可是挨着你地边某某人的地可是卖了。你用水另打井吧！”他們給切断了水道，把走道也給圈在里头了。你想，种菜园子缺了水怎么行，再說有三亩五亩地的主，誰自己能打得起井，沒法儿挤来挤去只好同意把地卖了！

丈量土地的时候，中国政府怕农民鬧事，天津市警察局长程希賢特为这件事亲自給六分局局长打了个电话。因此，量地时除了张文福、陈籍庄村正吳相，以及一些所謂“中人”外，还跟着个警察分局的局长。他們在量地时，地边、走道、井台等都不打在地亩数之内，张文福报多少亩就是多少亩，程文林专管要笔杆在冊子上登記。农民們明知道这伙子人克扣他們，也只有眼巴巴地跟在后面，在这样情况下誰还敢多說話！

他們在农民这方面买地是“零买”，可是交給日本人

的时候是“整交”。就是一包在內有多大片算多大片。譬如，从农民手中买卖地数是105亩，交的时候就报115亩。这中间十亩地数，就算他们赚下肥了腰包了。他们暗中是吃地亩数，明着还要吃佣钱。当时地的价钱是500元钱一亩，规矩是“承三破二”。就是如果地是卖100元钱，买主花103元。卖主净剩98元。5元给中人作为佣钱。如果农民的手中有“白头契”（农民之间买卖地的文约）的话，他们还要扒去一层所谓“过契税”。

这一次一共买地503.8亩。据他们自己说，以后还在这一带给日本人买了许多土地。总起来，张雨生、程文林、张文福他们除了吃的佣钱以外，每个人赚了10000元交通银行的票子。当时白面是五元来钱一袋。可以想见，他们这群狗腿子发了的一笔大财。

忙了对头一年，在一九三七年正式更换契书，是在北洋纱厂宿舍程文林的家里换。日本东棉洋行经理佐藤也来了。地是日本人买的，可是契书上白纸黑字在买主这一项上怎么落款呢？看来这些“中人”倒不怕落骂名，大概是担心将来万一落个什么罪名呢！于是，他们沿着“永租”那个办法又想了个主意，在买主落款上胡诌了一个名字——“上信堂”。这样一来如果让不了解情况的人一看，也许以为地是中国人买的呢！

这就是界石上“上信堂”来历的前后始末的全部秘密。

二 鬼子蓋起大工厂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开始建厂了。这个平常少人来往的地方忽然热闹起来。运砖瓦木材的汽車和大車来来往往連續不断。工地上扯起了电綫。日本人用鉄絲网把地围了起来不讓人們出入。农民們眼看着自己种的菜被围了进去，忙着黑天半夜的从地里往家运菜。这时陈塘庄有个叫李宝善的农民，他种的韭菜被围了进去，他要求进去起菜，日本人和狗腿子們不叫进，还打了他一頓耳光。可是，一家老小就指望著卖菜吃饭呢！没办法，李宝善又找到张文福那里去哀求。滿以为张文福能看在乡亲的份上，帮个忙。可是，沒想到张文福比誰都坏。他把李宝善送到第六警察分局，說他是故意搗乱，警察局又把李宝善狠狠的打了一頓。从警察局出来，吓的李宝善不敢在庄上呆，就跑到外地逃荒去了，直到解放后才回来。

因为张文福会看着日本人眼色行事，心眼活动会巴結日本人，孩生日娘滿月，他总得找空儿給日本人送礼。所以，他也就成了日本人手下的“紅人”了。他家的大車也

到工地来給日本人送东西，他呢，是每天站在工地上指东指西。比如来一輛車进工地，他就向东一指“卸到那边去！”或者往西一摆手“拉到那边去！”然后，跟一些头头們在一起吃喝。后来这个家伙就留在厂里，給日本人当了八年买办。

当时工厂的全部建筑工程包給了上海中国人經營的“創新建筑公司”。修建的时候，“創新”由上海带来一批技术工人，另外，就在本地招了些挑上的小工。当时，土城、陈塘庄一带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都跑到工地上来干活。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只給几个小馒头充飢。

最先盖的是几个大水楼子和周围的大牆及現在的甲字倉庫。在一九三八年建成一个紗厂，兩万多錠子，一个布場，七百台布机，一个工房，就是現在的**第一宿舍**，一个日本鬼子的宿舍，就是現在的**第二宿舍**。

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蘆溝桥事变后，日本很快就进了天津。

我們厂是一九三九年正式开工生产的，厂名叫“上海紗厂”，这个名字也是有来历的。远在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二年），清政府腐敗无能，甲午战敗，訂立了割地賠款的馬关条約。日寇开始在上海侵吞了民營裕晉、裕大兩個紗厂，成立了上海紡織有限公司，資金是白銀一万兩。由于殘酷的剝削中国工人，到一九一四年資金激增到兩万兩白銀。到一九二三年八月，增加到六万兩。先后在上海又建立兩個紡織厂，一个毛工厂，又在青島建立了第一紡織

厂。到一九三八年又建立了第二紡織厂。“上海紗厂”就是日寇在上海、青島發了大財之后，又进一步把魔手伸到天津来所建立的。

那个时候，厂子的門口，有一条通海河的水溝，寬有五、六尺，平常有一尺多深的水。漲潮时水最多到过三尺深。这条小河是过去农民用来引水澆地的。现在正好把它围在工厂和对过的日本鬼子住的第二宿舍之間。日本鬼子为了方便在上面修了一座洋灰桥，桥头上設了一个崗楼。日本鬼子为了監視工人保护日本職員和控制这条公路，每天白天有兩、三个人站崗。夜間就更多了。

日本兵端着三八大盖槍，明晃晃的刺刀，在桥头上走来走去。馬路上橫着兩個用鉄蒺藜做的三角形的架子，中間只留下一条很窄的人行道。来往的人不論有多大岁数的老大爷、老大娘，或是不懂事的孩子，只要从这里过，就得給日本兵鞠躬。吓得人們都不敢从这里走。老百姓都知道：“上海紗厂”門口是“鬼門关”！

工人們上班走到这里，更是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一不小心就得挨打。記得是一个冬天，西北風刮的電綫杆子嗚嗚直叫。太阳剛剛冒紅。从第一工人宿舍出来一个女工。当时約有二十多岁，这个人大眼睛个子不高，长得挺瘦小。她是細紗車間的工人叫王惠珍。这天馬路上冷清清的，一个人也沒有。王惠珍走着走着，忽然心里一着急，她想：“今天一定起晚了，要不，怎么看不見人上班呢！”那时，工人誰买得起表啊！她又是個有小孩的媽媽，不用說

白天劳累一天，夜里又睡不好，就是猛一起恐怕还有些迷迷糊糊的呢！心一急就撒腿跑了起来。心里只顧想迟到了要挨打，要扣工資……，过洋灰桥时也忘了給鬼子鞠躬了。

这时鬼子端着槍大声嚷：“站住！”吓的王惠珍一下怔住了。日本兵把她拉了过来瞪着眼睛說：“你的这个的沒有？”一边說着一边弯腰，表示鞠躬的意思。王惠珍这才明白惹了禍了。鬼子咬着牙喊叫：“你的‘太君’的不尊重，死了死了的給！”

这时，正好汉奸徐翻譯从第二宿舍出来，鬼子和他說了几句，徐翻譯对王惠珍說：“太君叫你把衣服脫下来。”吓的王惠珍掉了眼泪，哀求着說：“徐翻譯，你行行好替我說說！”这个汉奸哪里管这些。日本人嘟囔着叫嚷，他也跟着嚷：“太君叫你把衣服脫光嘍，跪在桥头上！”这时，鬼子們不由分說，把这个女工的上下身衣服，除了短褲外統統扒光了。用刺刀逼着讓王惠珍跪在桥头上。一直跪到天快晌午了，女工冻的抖做了一团，不能动了，鬼子才把她捉走。

王惠珍回家后，冻的一病起不了床。再加上又羞又气，沒有几天就死去了！

这里說的只是那个时候，工人受气受侮辱的一个例子！

工厂开工以后，厂子的管理人員全部是日本人，工人們就这样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面，开始了受气受侮辱、吃不飽穿不暖、一天劳动十二小时的牛馬不如的生活。

三 一九三九年大水

这一年的旧历七月，連阴雨整整的下了四十多天。只下的房倒屋塌，天上連个寻食的鳥儿也看不见，地上的蚂蚱被灌得密密層層的爬在牆上！

海河的水一个劲儿的往上漲，突然在一天夜里出了槽，水“哇哇”地往厂子里灌。那个时候我們工厂后身海河岸上根本就沒堤埝，只有几棵小树和一片荒草。日本人一看这情况，就跑到車間里把正在安裝机器的工人都赶了出来，叫工人们頂着雨挡埝。

工人们扛着草包、麻袋、面口袋……从工厂的西大牆到东大牆，沿着河边往上堆。天上嘩嘩的下着大雨，人，上面淋着，下面泡在水里。工人们就在水里跌倒爬起的一連干了兩天一夜——三十六个小时，鬼子不讓睡覺，也不讓回家。

但是，水还是挡不住！工厂院子里的水已經頂着大腿根儿那么深，大門口已經沒腰深了！

早晨，八点多鐘从城里来了一队鬼子騎兵，他們不知

从哪里抓来了三四百老百姓，用枪托、棒子逼着这些人抬土。工人和老百姓抬土，日本人穿着大长筒靴子，披着雨衣在旁边看着。装满了筐还叫添土，添上了用铁拍拍还叫添，不住的嚷：“大大的给！”一个草包二三百斤，不论老人小孩都得扛。人们又饿又困又累，地又滑，哪里扛得动？扛不动日本鬼子就用棒子打。

人们不分白天黑夜的干，水总算暂时挡住了。但是，一出工厂门往四面一望，除了工厂的大墙高高的露在水皮外头，谦德庄、南楼、土城和陈塘庄一带都象大海一样，一片汪洋。有的工人一看这种情景就掉泪了。从涨水那天起，鬼子就把住门口不叫回家，工厂墙又大房又高都被水淹了，住“高铺”的妻儿老小说不定早就被水漂走了呢。

铜丝保全老工人张广相，那时候还年轻呢，他是个山东人，脾气很倔强。他看日本人这样对待中国工人，非常生气，就联合一伙子工人去找外号叫“大胡子”的日本头儿栗林。工人们说：“水太大把房子冲走了，我们家去小孩的看看！”

栗林摆摆手说：“不行！”

工人李阿三说：“看看马上回来的有！”他还是摆手说：“不行！”工人们愤怒的凑近他说：“看看当时回来！”

他一看工人的眼色变了，就软了步问：“当时回来，……当时回来的顶好！”

工人们互相搀着膀子，趟着水往家走。当时宣家楼一

帶的人們，都跑到村邊的廟台上去了。張廣相到了家，屋裡空空的，水沒腰深。他一打听，知道老婆和孩子也跑到廟台上去了，廟台上頂着天鋪着地怎麼過呀？他忙着把屋門板落下來，把箱子放在坑上，上面搭上鋪板。然後弄個筏子划到廟台跟前，把家眷接了回來。就在這個時候，工廠人事科按着工人名單住址，划着船挨門挨戶找工人回廠去淘水。不去不行！誰不去他就打發鬼子兵來找。

日本人嫌男工人少，干活不快，又划着船到謙德莊、南樓一帶去找女工。這一天正遇上刮大風，水掀的浪頭有三四尺高。一條船從南樓那邊向廠子裡划來。船上坐了滿滿一船女工。這時，風絞着水呼呼的叫着，突然一個浪頭打在船上，馬上就進去半船水，眼看着往下沉。女工們慌了，忙着用手往外掏水，人多一活動，船三搖兩搖，一下翻了，人全部掉在水裡。女工們大多數都不會水，她們只有一會兒被浪頭涌上來，一會兒又被浪頭打下去。一個女工漂到工廠的西大牆跟前，抓住牆，剛剛露出個頭來喊：“救人哪！救人哪！”

這時，工人們看見了，急忙去船搶救。女工們一個個被撈了上來，有的人被水呛的說不出話了，有的被灌得昏迷不醒。

船到工廠後，就到日本那兒去報到。鬼子栗林還因為大家來的晚了，瞪着眼睛大罵工人：“你們統統的泡蘑菇！你們良心壞了壞了的！八格！”

有的工人跟他解釋：“不是泡蘑菇，風太大船翻了，

人統統掉在水里了！”

“人統統掉在水里了，我不信！”

他走到門口一看，女工們一個個混身上下都是水，冷的直哆嗦……，他不但不問不問，倒好象看見了什麼“高興”的事一樣，得意的哈哈大笑起來，對着女工說：“好！你們統統的水里的了，哈哈！”

笑完了拿棒子一指說：“活着的干活去！中國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沒有關係！”

工廠從大門口到風泵室，用裝機器的箱子羅起來，上下搭了兩條跳板走道。車間里也全是用箱子搭的浮橋，很多地方都安裝上水車，工人們日夜不停地搖轆轤淘水。白天，太陽毒辣辣的晒着，晚上點着電石燈，蚊子成團成球地在人們頭上嗡嗡亂叫，咬的人們想合合眼也不能。

腿泡在臭水里，天長日久都泡腫了，泡爛了，皮一層一層往下掉，一個個都一瘸一拐地走路。爛的厲害的連站都站不起來，可是日本人還給找活兒做，拆機器，擦油，裝箱子……反正不給治也不叫回家。每天用船裝來一船小饅頭，一個工人分三個，飽不飽也就是這些。

細紗車間有一個工人，因為連累帶餓吐了血。後來，他背着東西在跳板上走，一不小心腳踩空了，一頭扎在水里，當時就被臭水噏死了！工人們把他從水里撈出來，然後去找日本人，讓他們給買口棺材，查查他的家在哪儿住，給送個信兒去。找了几次，鬼子連理也沒理。工人們只好偷偷地用裝機器的箱子釘了一個“棺材”，把他盛殮

起来放在車間里，一直等水下去，才把他埋葬了。

这个死在日本鬼子血腥統治时期的工人，直到現在人們也不知道他的名子。因为那个时候工厂刚刚开工，四面八方来的工人非常多，互相間还都不認識。但是，这件事情，工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記的，而且要永远的記住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工人的这笔血債！

四 劳动二十四小时

誰都知道一晝夜是24小时，可是在日本鬼子在的时候，工人因为吃不飽飯常常是白天黑夜連軸轉！

日本鬼子对待工人就象用鞭子紧罗絲一样，一扣比一扣紧。工人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沒有办法了，工人们只好在工厂干完12个小时活之后，再到別的地方去找零活干，一直干到又該回厂上班了，才又急急忙忙赶到工厂来。

就以布場保全工紀雪元來說吧，他那时是个光棍汉，年青有力气，有技术，在工厂里拿的大工碼，一般工人工資是四毛五，他就拿八毛五，在全厂工人当中，他拿的工碼要算是最高的了。他的生活應該好点吧？可是一点也不！因为一天工資八毛五只够买兩斤豆餅或者兩斤杂合面。出一天汗，靠啃这两斤豆餅怎么能够吃飽呢！

他上夜班来的时候，太阳早落了，又困又餓干一夜活，早六点下班連到家站站脚喝口热湯都不敢。披上衣服出了厂門急急忙忙就又往灰堆造纸厂去干短工。因为造纸

厂六点半招短工。一路六七里地，迎着風啃着带来的豆餅干或者山芋干，等到赶到灰堆正好驗工。

造纸厂的短工活主要是扛葦子。从外面广场葦垛上拿下来扛起，送到厂內的楼上去。成捆儿的葦子叫葦馱子，一个重一百四五十斤，高一丈四五，粗一个人都摟不过来。这样大的捆儿一边肩膀怎么能扛起来，实际上就是用头和后背背着走。工人们一个跟着一个快步小跑，不論气力大小也得跟上流。一不小心慢了一步，后边的人往前一碰，背着这样重、这样长的东西，再大的力气也得撞趴下，只要是摔倒就得鼻青臉肿。背一次领一个一尺多长的竹牌。一个牌給二分或三分錢，短工多时工錢就賤，人少时就貴。有的时候因为葦子捆得不好，背着背着就散了，当头的举起棒子就打。打完了你还得一抱一抱的把葦子抱到楼上去，可是这一捆的錢也就算不給了，錢来的就是这么不易，当头、监工的还要从中間扒去一層。一个人干一天掙的錢只能換兩斤多棒子面。

紀雪元只有一件小褂，一干活先脫下来。不論是冬天夏天都是光着脊梁。葦子又硬又扎，肩膀和后背都被磨破了，到处都是細碎的小口子，重的就渗出血来。就是这样，他也舍不得穿衣服，因为他只有一件小褂，褂烂了就什么时候都得光着了。冬天，一会儿跑的一身汗，一会儿北風象小刀子一样，吹在身上象針扎的那么痛，只盼着背葦子上楼的时候借点暖气暖和暖和，可是不行啊，送上去就还得馬上出来。

到六点了，紀雪元忙着把腰上掖的一把竹牌子拿到換現錢的地方換了錢，就又一路小跑到工厂来上班。这一天累的浑身骨头疼，恨不得一头扎下去閉閉眼睛。可是上班来就得干活啊！他拿着工具在修理机器的时候，总是跌跌撞撞的，迷迷糊糊的睜不开眼。有时嘴里还含着沒有嚼完的东西就睡着了。这时日本鬼子查夜来了，大皮鞋“咔咔”一响，吓的他猛然惊醒，又赶快忙着干活。要是被鬼子看見了就是一頓狠打。

一个人干活养自己都养不住，人口多的就更苦了！布場的老工人刘广玉，家里有父母和三个妹妹共六口人。他在布場織布，两个妹妹在細紗是当車工，一个妹妹是精整車間当車工，父亲在洼地里推土、打更。母亲在菜园子里給地主家拔草干零活。全家都干活可是全家人都挨餓；他也得跟紀雪元一样，下了班出去找零活干。

有的人黑夜到老中山（即天津鋼厂）去拉矿石。在那里干一夜活，第二天上班来，混身上下都是紅色的矿石粉末，两个眼睛熬的紅紅的。由于过度的劳累、缺觉、再加上肚里沒食，許多人得病了，說不定在什么时候忽然就抽筋，站不起来了，别的工友們就帮着按腿，舒展胳膊，疼的爹一声媽一声的叫喊。还有的人得了很严重的胃病，一口一口的吐酸水。

有的工人晚上到海河碼頭上去“扛大个儿”，有的就租个三輪蹬着到車站接客人、串胡同，有的到工厂去推矿石，还有的到运输公司去卸貨、扛口袋，有的和別人搭伴

拉膠皮，有的抬磚、挑土籃子、挑灰合泥……真是想盡了辦法去掙那二斤豆餅！我制廠的老工人，過去誰沒24小時連軸轉過？象田捷元、楊克珍、施長月、張廣惠、郭鳳華……每一個人都能講出許多感人掉淚的故事來！

五 童 工 苦

一九四四年的冬天，上海紗厂招来一批童工，大的十三四岁，最小的九岁。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的都是破破烂烂，鞋前头张着蛤蟆嘴，脚后根露着大“鸭蛋”，手和脚都冻的青一塊紫一塊的。

为什么鬼子要招这么一批小孩，那是因为小孩干的活并不少，花費的工資却很少。小孩听话不会鬧事，更不会罢工。

这些小孩进厂以后，就住在大仓库里。仓库又高又大，里面阴森森的一点儿阳光也見不着。冬天，屋里的牆上一層白霜，稍微一見热气就滴滴答答的往下流水。孩子們一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儿，晚上就捧着冻的象石头一样的黑窩头啃，沒有被子盖就三个一堆两个一伙的縮在一塊儿睡覺。

第二天頂着星星就得起来上班。男孩子一般的是管扫車，就是給机器加油做清潔。女孩子管看車，就是学捏綫看細紗机。

常言說：“閻王爺好見，小鬼難搗”。整天管着這些小孩的主要是把頭，有一點不對，把頭就沒頭沒臉的一頓毒打。

細紗車間有個小姑娘景淑敏，那時只有十一歲，干起活來為了省衣服就光着小膀子干，等下班再把衣服穿上。這些小孩生怕廠里開除沒飯吃，總是拼命多干活，看着把頭的臉色一不高興，就嚇的連頭也不敢抬。管女把頭們都叫“姑”，她們好拜干姐妹，工人們就按照她們的排行叫“七姑”、“八姑”、“九姑”、“十姑”，她們一個比一個厲害。女把頭王淑珍是“七姑”，人最厲害，小孩們上廁所都要給她鞠躬說：“七姑，我上茅房！”她高興了就說：“去吧！”不高興就把臉一板：“就是你好跑茅房，不行！”沒法只有往褲子里尿。濕了沒有換的就只好那麼濕着干活。廠里規定不論大小便一律十分鐘，一天只許去一次。整個車間就一個小廁所，只好排隊等着。把頭一生了氣就拿個毛棍到廁所里挨着個打。嚇的小孩們一天天連口水也不敢喝，怕上廁所挨打。

女孩們，先是學捏綫。大家挨着牆站成一排，還得立正站着。一天十二個小時，總是這麼站着不許動。有的站累了把腳稍微伸出來一點兒，把頭過來就是一腳：“回去！”有的時候，小腿都站腫了，也不敢伸一伸腿。

身量長的還勾不着機器呢，就開始看車了。她們勾不着機器上面的粗紗，還得蹬着東西。人小，活兒干不熟，有時一見斷頭多了就嚇的直哆嗦，這時候把頭過來不由分說

就是一頓打，再不就抓住頭髮使勁往柱子上擡。擡得頭上直流血，她們也不敢哭出聲來。壓一個徒工的頭上不是旧疙瘩還沒下去，新疙瘩就又起來了呢！

光是挨打還不算，還得給把頭們送禮。不給，把頭就找錯，不是被開除就是被罰工，要不就等着多挨打。象把頭王淑珍娶兄弟媳婦，也要大家給送禮！徒工們吃還吃不飽，哪里有錢送禮？可是孩子們的爹媽為了讓孩子們少受點兒氣，想法借錢也得送。有一次，景淑敏為了給把頭送禮，她娘當了兩床破棉被，當了一塊五角錢。景淑敏拿着送到王淑珍家，王淑珍見了錢就笑着說：“景淑敏別走啦，在這兒吃飯吧！”去送禮的小孩們一看他們做的是大魚大肉，以為是真心留他們吃飯呢，就真的沒有走。可是到吃飯的時候，却給他們弄了盤土豆。一個人還沒吃幾口就沒有了。可是，孩子們為送禮欠下的債，當的東西，干上半年活兒也掙不出來。

童工們不僅僅是受氣、受剝削，而且常常是担着生命危險干活。那個時候什麼叫勞動保護，什麼叫安全設備啊，根本連听都沒听说过。鋼絲車間有個十三歲的男孩石小三，他的一只胳膊就是被機器碾掉的。那個時候鋼絲机上牙輪皮帶，大小刺毛輻連个安全罩兒也沒有。大刺毛輻長四十寸，直徑九寸半粗就在外邊露着，非常危險。當時車間裏不紡棉花而是紡鬼子在前綫上搶下來的破軍毯和燒壞了的破大衣。這些東西又髒又臭，撕碎了在機器上一紡，毳毛毛滿屋子飛，又嗆鼻子又睜不開眼。

石小三当时在帮别人看鋼絲机，机器比他高四倍，巡回的时候，仰着头翘着脚还看不见机器上边。他正在看車的时候，忽然有一块破毛毯塞在大刺毛棍里了，刺毛棍本来轉的很快，这样一来忽然不轉了。石小三怕损坏了机器，吓的忙着用棍子去捅，捅不动，他又丢下了棍子用手去拽，刺毛棍猛然一轉，把他的一只胳膊就给挂住了！这个棍子上都是尖尖的鉄刺儿，轉眼之时，一只胳膊就被机器挂的血肉横飞。他当时就昏了过去。

小孩們一見都吓的呜呜哭起来。这时工头过来关了机器才把他拉了出来。那个时候，根本也没有什么急救的设备。工人們把石小三抬到推料的鉄車上，給他盖上一条又油又髒的破麻袋，把他推到医务室。鬼子大夫看看給打了一針，也沒有給治就用紗布裹了起来。后来又送到城里医院，还是日本大夫，他看看說：“不能治了，这胳膊不锯下去人就活不了。”石小三的爹一听就哭了，怎么办呢，不锯又怕日本鬼子不給治了，自己又沒錢治，只好狠狠心答应锯掉。临锯的时候，狠心的鬼子連一点点麻藥都不給上。就这样，石小三死了好几个死，还落了个一辈子殘废。

殘废了，不能干活了，沒有过多久，日本鬼子就借故說石小三不好好学习，把他开除了。給了一百斤又臭又黑的糲子面算是“殘废金”。

六 女工刘玉兰的遭遇

在我们厂精整车间有个女工叫刘玉兰，因为她个子长的矮，为人和气，人们都喊她“矮三姐”。

提起她来，人们都知道她上班来不论什么时候，兜里总带块饅头，觉着不好受马上就吃上一口；不的话，一不小心，就两眼发黑一头栽倒在地上。她今年才三十多岁，为什么身体这样坏呢？在车间里，青年姑娘们总好问她，她也就常常跟这些小妹妹讲她在旧社会的遭遇。她一开始总是这样说：“你们现在学徒做工多么幸福！我们那个时候，唉！”她常常是这样一提头，眼泪就刷刷地流下来了。

“那年我老家山东发大水，一粒粮食也没有。听说天津地面大能混上饭吃，就一家子要饭逃荒到天津。没想到来到天津人生地不熟，哪里有事做呀！爹去扛‘河坝’，我和妈妈妹妹还得要饭吃。我十四岁那年，碰上个山东老乡，他对我妈说：“十四、五的闺女了，叫孩子要饭多寒碜哪，给她找个婆婆家吧！”我妈说：“这样小的孩子懂得什么呀？”可是又一想，有什么办法呢！叫孩子逃个活

命吧！媽媽难过地哭了一場就答应了。就在这一年我和一个在窑地上做飯的青年人結了婚。他也是个做苦工的，只能混上自己吃。家里还有七十多的老媽媽。結婚不久正巧“上海紗厂”（現棉紡四厂）招人，我想真是老天爷餓不死瞎家雀。厂里正用人沒費劲就驗上了。我回家跟婆婆一說，一家子都挺乐，心想这回兩個人做事也許就不挨餓了。

上班來，“堂管”叫我在搖紗看車。那時管當頭的叫“堂管”，因他年歲大，工人們都叫他“老堂管”。老堂管長得活象个“皮缸”，他混身肉一抖擻，就吓得工人們心惊胆战。我这个乡下人不会說不会道的，就知道干活，一天干十二个小时，連吃飯都沒有時間。只好圍裙口袋里裝塊豆餅、山芋干，餓了就咬上一口。干了不到一年我就怀了孕。当时我們一家子都挺高兴，虽然穷吧，老人眼看着要抱孙子了，也是喜事啊！

哪知道怀孕六个月，“老堂管”就看出来啦。他为了买日本人“大东”的好，就跟“大东”說了。一天我正干活，“大东”提着个棒子，穿着大皮靴“咣咣”地走了过来，吓得我心砰砰地直跳。他用棍敲了我肚子一下：“你的小孩有了有了的！”我怕开除，头也不回地說：“沒有，沒有！”他瞪着吃人的眼睛叫着：“我的不信，你的良心的坏了的！回家去，开路开路的。”

第二天我一上工，“老堂管”冲着我把他那身象肥猪似的肉一抖擻說：“你回家歇歇去吧！別把你累坏了，你

已經被开除啦。”随手遞給我一張开除單。我腦子嗡地一响，腿一軟就坐在地上！天哪！難道有了孩子就該餓死嗎？可是那个时候到哪去說理呢！

我知道央告也沒有用，這些狠心腸的家伙哪管工人的死活。那時日本人常說：“找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中國人可有的是。”狠心走吧！出了工廠我就坐在地上哭了一場。這是我第一次被开除。

回家後也不能餓着等死啊！婆婆在南樓一帶熟，我就跟婆婆商量，她叫和地主家說說，給人家菜園子拔草去。雖然賺錢不多，反正比坐在家里呆着強。我就怀着個大肚子跪倒爬起的給人家拔草。夏天毒辣辣的太陽晒得臉和身上的肉皮爆了一層又一層，一天連點水都摸不着喝，再加上肚子餓，有時蹲下就站不起來。

孩子生下來不幾天就死了，孩子死後的第五天，我就又來“上海紗廠”驗工，因為“老掌管”知道我干活不要滑，所以就又驗上了。

干了一年以後，我又懷孕啦，這次就有了心眼，每天上工下工都躲着他們走，看日本人來了就彎腰裝着擦紗管，或背過臉去。後來又用布把肚子勒起來，但是孩子是活的，是個生命他總要長啊！

這次因為躲着他們，直到懷了八個多月，當頭的才看出來了，不用分說又被開除了。孩子生下來象小鷄似的，我吃不飽哪裏有奶呀！有時就喂口水，有時就嚼口豆餅給他吃。孩子的奶奶說：“沒有奶也不能看着孩子餓死啊！”

孩子哇哇哭，屋里除了四个空瓮什么也没有。奶奶心疼孙子，把唯一的一条过冬的破棉裤套拿出来，换了麻花喂孩子，卖了一条裤腿吃了一顿，第二天又卖了一条裤腿，就这样两天吃了两条棉裤腿。

大人死活还顾不过来呢，谁还相信能把孩子养活！他哭，奶奶就嚼块干豆饼或山芋干喂喂他。就这样他也没死。

有了孩子上不了工，只有出去要着吃。这年我十八岁，怀里抱着六个月的孩子，天刚蒙蒙亮，就把孩子用破袄一蒙，顶着西北风，出去要饭。那时南楼、东楼、谦德庄……我都走遍了。十八岁自己也知道羞臊了，天天早早就走，晚上星星满天才回来，怕叫同院的人看见笑话。日久天长同院的王娘就知道啦。一天晚上我刚回来，王娘就端过一碗稀粥来说：“这年头都是一样啊，咱们穷人还有什么说的！快给孩子喝口稀的吧！”

谁看见孩子也心酸，说他太可怜了，人家宁可少吃一口也给我们娘俩吃。有时我要一把小钱就到点心铺去给孩子买点“八宝面”吃，人家一看我们这一身穿戴，看看这一堆小钱就知道是要来的，遇上好心的就给我们一包，小钱也就不要啦。若是遇上这样好心肠的人，下回我也就不好意思再上人家那儿去了。

我们一连六天什么也没吃上，奶奶就给饿病了，到快咽气的时候，还摸着二小子的头对我说：“二子他妈！你可要好好地抚养着这孩子呀！他是有命活着的，从小就吃豆饼、山芋干，也不死，我看他是死不了啦！”奶奶说完

這話就咽氣了。家里沒人看家了，總要着吃也不行啊！孩子大些了，我就把他放在姥姥家。姥姥家也窮得吃不上，可是總是親人，委屈不了孩子。這樣，我又去驗工。這次干了兩年多，我就又第三次懷孕，這次懷孕比上次更小心了，每天上工以前就把肚子勒得緊緊的，還注意處處躲着他們，他們在車前站着，我就朝車後頭走；他們在車後頭站着，我就朝車前頭走。反正是給你們後背看，不叫你們看出我的肚子來。

夏天車間里象蒸籠似的那麼熱，干起活來帶頭轉圈的，連喘氣都困難。這樣我還是拼命的干活，因為只有干好活他們才不注意你。

忽然日本人“大東”，雙手抹着腰，歪着脖子，瞪着兩只眼睛，站在我的車前看我，我就更慌了神，一沒留神掉在地上一個紗管，那時，掉一個紗管，罰三塊錢（等於三天半的工錢），我怕“大東”看見，就趕緊去拾紗管。不小心一腳踩在小紗管上，哧溜一下滑倒了，肚子正撞在機器框子上，我眼前一發黑就暈過去了。等我蘇醒過來才知道，我小產啦；車間的姐妹們把我扶到小屋里去，痛得我汗珠子黃豆粒似的從臉上往下流。

那萬惡的日本人、狗腿子們却哈哈大笑！他們怕我死在車間里，“老堂管”捂着嘴對我說：“你趕快回家吧！”我咬着牙，一步一身汗挪到家。到家一頭就扎在炕上了。

第二天，天還不亮，我就掙扎着起來穿衣服，丈夫知道我又想去上工，伸手抓住我的胳膊：“你歇幾天吧！二

子他媽，別去啦。”我自己知道不去會被開除了的，當時我沒說話，哪知道一下炕就摔倒啦！丈夫把我扶起來，着急的半天才說出話來：“……我說二子他媽！咱不下那号子人間地獄啦！不行嗎？”我怕開除，咬着牙一直奔門口走去。這時我那三歲的小二子，也好象懂事似的抱住我的大腿就哭起來了。這時我的心一橫把他們一推，拄着個棍就走了。我走了老遠回頭看看，丈夫還扶着門框，望着我呢。

“老黨管”見我進門上工來了，就板着臉對我說：“你從昨天就被開除啦。”就這樣我第三次又被開除了。我只有拄着個棍，抱着孩子再去要飯。

看着現在黨和政府多關心工人哪！女工懷孕上個月就下車做輕活。生孩子有五十六天產假，工資照發。產假滿了，上班工廠里還有托兒所，房子又寬大又明亮。一群阿姨給哄着抱着。下了班亲亲熱熱地抱着孩子家走，生產起來怎麼會沒有勁呀！我現在真高興，我抱着要飯的那個孩子，現在已經是中學生了。解放後生的幾個孩子都是一個個又紅又胖的，我身體不好，領導上照顧我叫我休養。我們一家子常坐在一塊說：“想起過去，真是做夢也想不到有今天哪！”

有人問她：“經三姐，你那麼高興，怎麼連個電影也舍不得看哪？”她總是說：“我有那個時間還要養養精神，等上班來多給國家生產點兒，跟你們這些小子頭們比一比呢！”

七 “泡”、“跑”、“偷”

日本在的时候工人的生活真是比黄连还苦，别说是吃大米白面，就是吃上块棒子面窝窝都算是过年了！每天除了山芋干、豆饼，就是厂里关的烂土豆，烂山芋……就是吃这个还不管饱。穿的就更甭提啦！一年四季一身衣服，冬天是棉衣服，春天把棉花抽出来就是夹衣服，夏天再改单衣服，衣服上都是补钉罗补钉的。

大部分人白天在厂里干十二、三个钟头的活儿，下工后还得去别的地方干零活，有的去拉胶皮车去，有的去扛“河墙”，还有的去做小工。这样在厂里干一天在外边再干一夜活儿，再进厂来还能有劲干活呀？人总是个人，俗话说“一个人浑身都是铁能碾多少钉啊！”为了能活着，再加上又气又恨，只有想着法儿和鬼子斗争：泡蘑菇，睡大觉，“偷”。

织布厂有个日本人叫“深田”，因为他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工人们就都管他叫“瞎子”，他最迷信。他们日本人每天都歇二次点，上午九点来钟走，十点来钟回来，

下午三点来鐘走，四點來鐘回來。

工人們摸著這個規律了，鬼子一去“歇點”，就都把機器关了，只是靠門口的地方開著幾台織布機卡搭卡搭的響著裝樣子。工人們有的躺在織布機上睡覺，有的一群一伙的坐在地板上說說笑笑，講故事聊天……。

一天，“瞎子”“歇點”回來，進門一看，車開著呢，可是車間里边有說有笑，聽的清清楚楚的，他就知道里边工人們沒有干活兒。因為要是織布機全開著，別說談談笑笑，就是面對面大聲嚷有時都聽不見，“瞎子”可火了，提著個棒子就往車間里跑，工人們都瞪著眼睛死死的盯著他，就好象他身上帶著“吸鐵石”一樣！他跑到那里，那里的機器就轟轟地響了起來，等他離開那里，機器就又沒有聲音了，他轉身就再往回跑，還沒等他跑到機器跟前，車又開了；等他跑過去就又停了。這樣，把個“瞎子”跑得滿頭大汗，象豬一樣呼哧呼哧直喘，也逮不住一個不干活兒的人。最後他只是看誰不順眼就抓住誰打一頓出出氣。可是，他下次進車間來還是這個樣兒。

日本鬼子信神，好迷信，工人們就抓住他這一點編著法兒捉弄他。布場里边有個大風泵，冬天不用時整天的鎖著，里边特別黑，上夜班時“瞎子”從來也不敢進去。工人們就拿它當了“睡眠室”了。有的工人告訴“瞎子”：“風泵里边鬼的太大的有！”“瞎子”有些害怕，他每次走到風泵門口，總是低著頭很快的走過去。工人們在里边睡覺時總是在身邊放著一堆破棧子，紗管，機器螺絲……

等，預備着日本人進來就打他。

一天“瞎子”知道風泵里边有工人睡覺，他想進去看看，但又害怕鬼。他走到門口，先低下頭，嘴里嘟嘟囔囔念了半天，就朝里边走，風泵里边有人把門，知道他來了，里边的人都屏住氣一點動靜也沒有。等他往里一迈腿，霎時間從風泵里边紗管、梭子、機器螺絲……，就和旋風刮的一樣向他飛來。他抱着個腦袋吓的嗷嗷叫，轉身就跑，因為跑得太慌了，猝地一下撞在門框上，把腦門碰了個大疙瘩，工人們看他那個哆哆嗦嗦的樣子都抿着嘴樂。從這以後他再也不敢進風泵室了。後來他還請了個日本老道，對着風泵室門口念了好幾天日本經。

織布場里有個翻譯叫楊金聲，二十多歲，因為他長得活象個肥豬，工人們就送給他一個外號叫“小楊胖子”。這小子最可惡，盡往“瞎子”面前買好，說工人的壞話。一天他偷偷的從布場的小門里鑽出來，想看看到底是誰不干活，他沒想到，車間一個干活的也沒有。他跑進車間，手里拿着一根哭喪棒，打了每人一棒子，睡覺的還踢兩腳。工人們都納悶不知道他從那里鑽出來的。

他走過工人們就三個一羣，五個一伙的商量開了，有的人主張：看見“小楊胖子”來了，就都不干活沖着他站着。也有的人主張：他要是再打咱們，咱們都上去揍他。還有人提議：明天咱們都不來上班了；看他在小日本面前怎么交待！

大家都同意明天誰也不來上班，用這個法兒治治“小

楊胖子”。給他們來個“罷工”，這樣一來就象潮風一樣，不大工夫，全織布場的乙班工人都知道了。

第二天早晨，織布場乙班的王忠、孔繁國、蘇志波……等工人一個上班的也沒有，下夜班的工人一看沒有接班的，只好扔下車就走。“瞎子”跑來一看沒有一個工人來上班，也象熱鍋上的螞蟥站不住腳了。一把抓住“小楊胖子”的衣領子，瞪著一個大眼問他：“你——你——說：工人不來上班什麼的干活？”

吓得“小楊胖子”象篩糠似的哆嗦開了，半天才說：“我的想辦法！”

工人們悄悄的躲在大門口外邊聽動靜，有的人在廠子對過的雜貨攤上坐著。“小楊胖子”找人給工人捎信：“上班來不打也不罰，還照樣給工錢。”大家在一起一商量，就準備好了對付鬼子的話。

到第三天，工人們才來上班。“小楊胖子”就又揚著脖子對工人厲害起來了，他挨著個的問：“是誰引的頭不上班？”

問誰都是一句話：“我自己不願來！”問了三四回也沒有問出來。可是“瞎子”來問時大家都說：“楊翻譯無故的就拿棒子打人，他這樣打我們不敢來！”結果“小楊胖子”挨了鬼子一頓臭罵。

工人們白天黑夜干活，就是累折了腰也賺不上一個人吃的，別說養老養小，怎麼辦呢？為了活下去，只有一條路——“偷”。

漿紗車間的工人“偷”漿紗的白面，用機器上的水和汽煮面疙瘩吃。后来人們發現機器用的油是植物油，保全工人們就把油“偷”來，炸面筋吃。清花車間的工人就“偷”棉花籽吃。

虽然厂里有狗腿子，厂門口有日本兵守衛队，搜出东西來就是九死一生，但是工人們还是要“偷”，女工把綫藏在頭髮里，鞋里，把布纏在身上，有的女工为拿一綫綫被打的死去活來。工人們看見就暗暗商量：“反正也活不下去，小‘偷’翻出來也是半死，干脆大‘偷’。”

布場保全工人們就趁着鬼子叫開門的空兒，用肥皂把鬼子的鑰匙按上一個印，然后又照樣再配一付。織布場的前後門都能開了。

一天夜里，布場保全工王樹寶、肖金利等沒回家，藏在布場平常不開的機器底下，因為這機器都是用席圍着，當時布場雖然裝了七百台車，可是平常最多開五百台。

那時布場沒有夜班，車間里晚上黑洞洞的，只有一個小燈一夜亮到天明。

鬼子每天都拿着手電筒來查夜。人們趴在機器下邊等日本人走了，就出來把布場整理車間的門打開，一次就“偷”走四十六匹布（布是108尺為一匹）。當時把布從整理間弄到保全部，又從保全部的窗子塞出去。窗子外邊搭有跳板，人們把布扛到牆頭上扔到牆外去。據說這一天，工厂的布場只交給整理科一匹布，論說織下一軸布就是兩匹，為什麼只有一匹呢？原來那一匹也被工人扯走了。那

就是說，工厂里这一天只生产了一匹布，可是却賠出去四十六匹。

王树宝他們“偷”了布，陈塘庄大槍队知道了，就到东楼王树宝和肖金利的家来抓他們。

他們問好了王树宝家的住址就闖进屋来。王树宝忙着躺在炕上装睡。这一年王树宝刚刚十八、九岁，个子长的很小，活象个孩子。他們进屋一看，屋里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妇女，炕上躺着一个小孩，什么也沒說就退出去了。

这时王树宝的娘就催王树宝走，恰好有个捆好的行李卷在炕上，王树宝还没等走，就听大槍队吵吵嚷嚷又轉了回来。王树宝忙着把他的良民証塞到席底下，裝做沒事的样子坐在那里。这一群家伙一进门就嚷：“王树宝在家嗎？”

“他不在家，你們找他有事嗎？”王树宝回答。

“你是干什么的？”

“我刚从老家来。”

“你的良民証拿来看看！”

“我們那儿沒發良民証。”

一个大槍队詐唬他說：“你就是王树宝，”

王树宝笑着說：“你們找他还能不認識他？干么这么急呀！他昨天就回老家去啦，我还看見他了呢！”

他們一看王树宝长的这么小，还能办那么大的事，准不是。他們第二次又退了回去。

这一回王树宝可就开門跑了出去，穿过六道就鑽进了葦地。

大槍队走到外面，一打听，那个象小孩似的人就是王树宝。大槍队第三次又跑了回来。可是人早已經不見了。

葦地象一片綠色的汪洋大海，望不到边摸不着底，到哪里找王树宝去呢？气的大槍队的官把兵們大罵一頓：

“你們都是瞎子！么也干不了！”

“都他媽的給我滾！”

大槍队一个个背着槍，耷拉着脑袋往回走，官就罵着跟在后面。

王树宝呢，在葦地里，听的清清楚楚的，外面罵的愈凶，他就在里边抿着嘴愈乐。

八 “商閻王”毒打施长月

粗紗乙班有个老工人施长月，旧社会时他家有五口人，三个人上工，可是还是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在日本鬼子闹“强化治安”那一年，生活就更苦了。干一个月的活给的东西只够吃三四天的。五口人盖着两床破被子。他经常是饿着肚子上工。你想，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的活，不吃东西怎么行啊？他的母亲就和家里人商量着回山东老家去住上些日子，再把家中的一亩多地卖了，弄点儿吃的回来。总不能一家都等着饿死啊！

施长月把所有能变钱的东西都卖光了，凑了点儿路费，把老娘和一家人送走了。回来，小屋里空落落的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有一捧山芋面。一捧山芋面就是对水打糊喝也喝不上一天哪！何况还得干活。他上班一边干活一边想：“再不就偷！”他一想到这儿，不由地就出了身冷汗。他从小就是个老实人，从来没动过别人的一针一线。又想到被翻出来不死也得脱层皮，心里就打哆嗦了。可是，饿的眼前一陣陣發黑，难道就等着饿死？反正怎么也

活不了，就碰碰“运气”吧！

下班以前，他拿了兩縷綫塞到鞋子里面就走了出来。

工厂門口站着十几行人，等着搜腰出厂。他恰好站在守衛王振忠的那一行。这个守衛搜到施长月的时候，把袜子都給脫光了，当他一拿起鞋，施长月就知道坏了，吓得他哆嗦着連話都說不出。王振忠把綫从鞋里掏出来，上来就狠狠的打施长月兩個耳光子。

这时上夜班的守衛正是外号叫“商閻王”的商子林。

这个汉奸狗腿子在鬼子面前經常討好說：“我一天不打几个中国人，手心就刺痒的慌。”王振忠把施长月交給了商子林。商子林一見施长月就問：“你为嘛要拿东西？”

施长月老实的說：“商爷，你还不知道呵：咱这会儿沒有吃的干不了活儿……”商子林把嘴一歪說：“哼！該你小子倒霉，我今天還沒打人呢！”

下班的工人們都走光了，他拉着施长月說：“走吧，你跟我到水楼子跟前去！”吓的施长月就給他磕响头。他揪着施长月說：“別他媽的跟我来这一套！”

他連拉带扯的把施长月拉到水楼子跟前，把他倒背着手綁上，然后又用繩子捆在手腕子上，把人往水楼子上边拉，拉到脚尖剛剛挨着地皮。这时施长月已經痛得汗順着臉往下流，可是这个沒有人心的东西还拿了一个大竹箴，往身上抽打。直打得血肉和破小褂都粘到一塊儿了，商子林也打的累了，他又問施长月：“你累不累？你若是累了跟我盘杠子去。”

一些老工人都知道，在日本在的时候，工厂院子里有个八尺多高的大铁杠子，是专为吊打工人做的。只要把人吊上去，不用打，一会儿人就沒有气儿了。商子林一边說着用手一放繩子，把施长月摔在地上。这时他又把施长月拉到小屋后边，把他吊在铁杠子上。施长月被折磨的昏昏沉沉，已經不会說話了。他又把施长月捆到板凳上，然后提了一大壶凉水往嘴里灌。

从黄昏一直折磨到天明。日本人来接班了，他指着被打得半死的施长月对日本人献功的說：“他的小偷的干活！良心的坏了坏了的！”日本人当时就决定把施长月开除出厂。

施长月从工厂里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真是迈一步一身汗，要不是在近处住，真得爬着回家！

回到家里疼的他躺也躺不下，坐又坐不住。屋子里四个空吞兒什么也沒有，难道就在这个小屋里等着餓死？那样老娘和妻子回来怎么活？施长月想到这里勉强支撑着站起来，从炕上把一块破席片拉下来，一只胳膊不能动了，就用脚踩着，用另一只手把席片撕了撕，然后塞到灶膛里划根洋火点着。用那一捧山芋面打了一碗粥喝。随后他擦去臉上的血，拄着个棍就到海河碼头上去了。他到河边上一看，人家扛活的扛的口袋那么大，自己混身上下是伤，怎么扛得动呀！不找活又吃什么呀？正在發愁，河岸那边恰好有人叫拉地車的小套，施长月生怕人家看出来他有伤不用他，就用一个肩膀扛着繩子拚命往前拉，沒有走几步，

他一下就摔倒在地上了。拉車的工人們把他扶起來，一看他混身是傷，不用問就知道他是被打壞啦。大家相互看着，誰也沒有說什麼，因為在那個時候，哪一個工人不挨打受氣呵！一個工人就對施長月說：“你別使勁拉，就跟着走吧！”

施長月從這以後就每天在碼頭上拉小套，掙一天錢吃一天，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回到工廠來。

九 紀雪元九死一生

紀雪元在日本統治時期，是單身漢，技術也很好。論說一個人賺錢一個人吃，該餓住口了吧！可是，老紀白天黑夜干還是吃不飽。心里實在恨透了日本鬼子，就和王玉起、王樹寶等工人聯合起來“偷”廠里的布。

有一天，老紀正在往下撕布，被小鬼子“星川”抓住了。他一看老紀撕的是一個大軸（折合三匹布），就知道這不是一個人做的事。當時，老紀被帶到人事系，隨後就來了一輛汽車把他送到憲兵隊。老紀從汽車的窗口看見了憲兵隊的牌子，知道壞了事，誰不知道這個地方是“許進不許出”啊！

這個地方周圍都是高牆，牆上裝着三尺高的電綫。門口有鬼子兵站崗。

老紀被帶進院子。這時正是冬天，院子裡的樹木葉子早就落光了，一條大道直通到坐落在北面的一所陰森森的大樓。樓前面有一個大養魚池，池裡的水都凍成很厚的冰。老紀被丟在這個養魚池的邊上凍了一大會兒，從樓房

里面出来三个人，中间走的是宪兵队长松尾，挎着大刀。旁边走的是两个汉奸，一个是金翻译，一个是王副官。

他们走到老纪的跟前，日本鬼子先比比划划的说了一阵，王副官对老纪瞪着眼说：“把衣服全脱下来！”老纪狠狠的看他一眼，心想：“就知道你们要对付我！”这时不由分说就上来十几个手拿皮鞭木棒的打手，七手八脚的把老纪的棉衣扒了下来，浑身上下只剩下一条短裤。日本鬼子指了指养鱼池里的冰。金翻译忙着说：“爬到冰上去！”打手们又一起上来，有的抬大腿，有的拉胳膊，硬把老纪按倒在冰上。头，肚子，膝盖都得挨着冰爬。人爬着，打手们围着养鱼池站成一圈儿，拿棍子、皮带往身上打着。爬过一圈，人已经冻得浑身麻木了，真是哆嗦的上牙合不上下牙，五脏六腑都冰凉了。不爬就打，老纪模模糊糊好象爬了十几圈，就昏在冰上了。

等老纪苏醒过来，看见自己在一个过道里躺着。他勉强支撑着坐起来想要口水喝，忽然感到头上往下滴水，用手一摸是血；这时听见旁边有人说了话：“说实话吧！还有谁和你一起偷？”老纪一看正是那个王副官，心里就明白了，这是给我来个下马威，叫我咬出别人来。老纪这时想到王玉起、王树宝他们是妻子儿女一大群，说出他们来就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自己反正是光棍一条，顶多有一条命够了，何必连累他们。老纪拿定主意就说：“就我自己，没有别人。”

话说的这么干脆利索，把汉奸王副官气的脚踩的山

响，喊着：“你嘴硬！亲呀！”

他这一喊不知从哪里蹦出来了四五十个人，把老纪架走了。拐了几个弯来到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有七八尺见方那么大地方。天棚上有个小灯泡，微微有点光，地上洋灰地都裂了缝，在左面牆角有一个烧的通红的火爐，爐子上烧着一个三角烙铁。右面牆根横放着一条板凳，上面放着一把火壶。牆上挂着象小指头粗的鞭子，鞭子，棍子……对面有三个小桌，松尾正坐在那里吸烟卷儿，坐在轉椅上仰着脖子不时的轉过来又轉过去。他的身后是一群光着脊梁的打手，这里阴森森的活象画上的“閻王殿”。王副官站在老纪旁边还是那句话：“你說，和你一伙的还有誰？”

老纪一看这个架势，恨的咬牙切齿。王副官伸出胳膊看看表說：“限你五分鐘，不說，这些玩艺儿你都得尝尝！”接着就拉长声数着“一分……二分……三分……”老纪一句话也沒說。

松尾忽地一下站起来，气的直搓手，大声嚷叫着。这时枣木棍子象雨点一样往老纪身上落。随后又换上皮鞭，这鞭子是用五股牛筋擰成的，打在身上一下一層皮，一道水泡。老纪始終沒吭声，直到打的昏了过去。

老纪被关到一个伸手不見五指的小黑室里，吃飯、拉屎、睡覺都在这里。每天拉出去过一兩次堂，有时或許过三次。

一天，在过堂以前，王副官走近老纪，装着挺慈善的样子說：“你有錢嗎？有錢我給你想想办法儿，不少挨些打

嗎？”

老紀气的眼睛都紅了，大气的說：“你們当官的心瞎眼也瞎呀？我們工人白天黑夜卖命还填不飽肚子呢，还有錢喂你們！”

王副官碰了一鼻子灰，哪里会輕饒老紀。这时他和松尾咬了咬耳朵。随后一伙儿高个子的打手一个个走过来，輪流給老紀来“大揩跨”。所謂“大揩跨”就是打手們用胳膊把人的脑袋挟住，一弯腰再一扭，人就从三四尺高的地方被摔在地上。老紀被摔死过去几次，但是，他还是沒說出別人来。

又过了兩天，那是早晨，小黑屋門忽然开了。一伙打手把老紀架到另一个小屋里。这是过电刑的地方。桌子上放着个三尺寬二尺高的机器，“叭噠叭噠”直响，松尾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个黑黑的小东西。老紀在松尾面前一站，外面的鉄門就关了。

松尾又問：“偷布誰的有？”

老紀指着自己：“我的有，旁人沒有！”

松尾眼珠子一翻，把手里的东西往老紀身上一挨，老紀渾身一哆嗦，就倒了下去。鼻孔好象被塞住了，心上好象压上塊大石头那样喘不过气来。这样連續四、五次，老紀觉得渾身的骨头都酥了，再也站不起来。但是他心里很明白，一个人也不能說。

敌人在老紀面前不得不服輸。沒有办法，他們把王干起等几个他們怀疑的工人弄到宪兵队打了一頓，因为老紀

沒有口供，最后也只有把他們放回去了。

老紀呢，就被押往塘沽收容所。

進了收容所，老紀的一個新做的棉襖就給扒去了。另外把一身死人的破衣裳給了老紀。上面虱子多的叫人頭皮發麻，可是冬天冷啊，老紀只好穿上，咬的白天黑夜站不住腳。

在這里的中國人太可憐了，一百多個人擠到一個木板搭的棚子里。日本兵把着門，誰動彈，就是棍子、槍托子給打一頓。病的，死的哪一天都有，有時人還沒死，就被拉出去扔到亂尸崗子喂了狗。老紀在這呆了半個多月就和這一些受難的同胞一塊被送往日本當了勞工。

直到日本投降，紀雪元才和那些還沒被折磨死的同胞一塊回到祖國來。

十 工人怒打日本厂长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了。十月間，天氣已經很涼了。一天，天陰得象鍋底兒一樣黑，剛剛六点多鐘，遠遠的就可以看見城里已經亮了電燈了。

這一天，離着通往鬼子宿舍去的洋灰小橋不遠的地方，聚集了一大群工人：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失業的，也有剛剛下班的。人們身上穿的全是補釘羅補釘的單衣，一個個凍的哆哆嗦嗦。但是，一個人也不走，都靠着工廠的大牆站着，牢牢地盯着工廠的大門口。

廠子門口站崗的是由漢奸隊變成的國民黨軍隊，人們只知道他們叫護路隊。警衛穿着棉大衣敵着懷，端着個上刺刀的大槍，來回走動着。他不住的向工人這邊望。

天眼看着快黑了，這一群人總是呆在這裏不走。一個警衛端着槍走過來問：“干什麼的？”

工人們誰也沒說話。

他瞪起眼睛說：“快給我滾蛋！你們在這裏要找倒霉啊！”

人們还是不走。

“喂！說你們你們怎么不动啊？沒有听见哪？……你們在这里干什么？”他逼問着。

一个年青的工人說：“告訴你，別管閑事，我們是打‘青醬’（意思即打日本厂长青木）的！”

这个警衛楞了一会儿，不知是沒有猜着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还是不敢惹这一群人，悄悄地端着槍一步一步地回去了。

厂里工人正在下班。門口沿着鉄欄杆还站着很多工人等着搜腰出門。从南往北数第三行后边站着个又黃又瘦的年青工人，看去頂多有廿来岁。他是布場的工人孔繁函。他一个劲探出头来望排头，急的臉都漲紅了。他今天并不是怕搜腰，是准备要报仇，报这八年来被日本鬼子踩在脚底下当牛当馬，挨打受气的仇。

人慢慢都走光了，走远了。

不大一会儿，从厂子門口出来两个日本人。一个大胖子，一个小瘦子。这两个人就是工人们咬牙痛恨的日本鬼子厂长藤賴和青木。

藤賴戴着春秋帽歪着嘴儿，夹着个黑色的大皮包。副厂长青木手里拿着个文明棍儿，戴着个黑边白光的眼鏡，夹着个黄色皮包。两个人全是西服大衣，大皮鞋咔咔直响。他們两个一边嘟嚕說話，一边向通往鬼子宿舍的小桥上走来。

他們剛剛走到河边上，大伙就一拥而上。布場工人

里，有一个大个子，他上来伸手就把藤賴的脖子給攔住了，大伙就拳打脚踢的把他按倒在地上。青木一看不好，撒开腿就想跑，孔繁函等一伙子工人过来就把他团团圍住，一頓雨点儿一样的拳头，打得他象賴狗一样嚎叫。皮包也沒到河里去了，玳瑁眼鏡也碎了！他連滾带爬的跑到沟里，抓起滴嗒着泥湯的皮包抱起来就跑。藤賴趁着工人打青木的时候，抱着脑袋溜了。工人们出了气，也沒有再追。

第二天，厂子里工人都喜笑颜开的講着这段事。可是，駐厂的伪軍連长郑学礼，却去給鬼子厂长道歉去了，实际上也是借着工人的威力詐財去了。

他早晨起来，兴高采烈的穿上軍裝，洗了把臉，嘴里唱着小調就走进了南厂鬼子宿舍。他一上楼就喊：“厂长先生在家嗎？”藤賴一听是駐軍連长到了，赶忙一瘸一拐地迎了出来说：“連长請，連长請！”

郑学礼进屋就表示很关心的样子說：“听說昨天这帮穷工人打了你，非常对不起，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事我一定給你找出人来，把他們送到宪兵队去！”

藤賴这一次就被工人打怕了。一听說他要抓工人給他出气，就忙着拿出一大把票子給了郑学礼，并且一再鞠躬要求郑学礼保护他。

郑学礼腰里掖着票子，从藤賴家走了出来，又鑽进青木的家里，又賺了一大把票子。

他得意洋洋地回到厂里，把那天站崗的警衛叫来，吹鬍子瞪眼的讓他找出打日本厂长的人来。哪知道，日本厂

长挨打的时候，门口的警卫队早就吓的缩在大门口里头，连看都没敢看！

这两个日本厂长被打以后，下了班吓的都不敢回家吃饭。他们和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办移交，到点下班时就问：

“你们什么时候走？一起走，一起走！”

这两个鬼子出来进去再也不敢带打人的棒子了！一个个变的象夹尾巴狗一样，从门口出来总是东西南北的望望，然后翘着脚带着小跑就溜进了宿舍。他知道工厂的各个地方，都有工人在愤怒的等着他们，复仇的烈火，随时随地都可以烧死他！

十一 汽車司機左振玉

在日本還沒有投降的時候，廠子裏來了個四十多歲的汽車司機。高個子，長的挺魁梧，見人總愛打招呼說話，一看就是個正直爽快的人。這個人車開的特別好，他給日本鬼子支店長“藤賴”開車。“藤賴”這個傢伙有個怪脾氣，不論出門開會或者是辦事，不差十幾分鐘他動身。他一上車准看下表說：“還有×分鐘，快！”這個司機總是毫不含糊地答應：“好啦！”喇叭一响，車就象飛的一樣。譬如說從土城到東車站有十里多地，要是說十分鐘到，准用不了十一分鐘。

人們都很喜歡他，稱他“左師傅”，再親切的稱呼就喊他“老左”或者“大老左”。

老左愛聊天，他常常在等着出車和出車回來的空隙時間，在車房和一些工人們坐在一起閑聊，別看這個普通開車的，却愛談論國家大事。譬如，談起“西安事變”來，老左就說：“……老蔣是個什麼東西，他根本就沒安好心，為什麼張學良扣他，是因為他不想抗日，光想擴大自

己的勢力，叫東北軍打共產黨，實際上是想消滅張學良的軍隊。當時共產黨是主張“對外別對內”，應該擰成一股勁打日本。張學良一聽有理，就把老蔣扣住了。可是共產黨領導人毛主席說：“扣老蔣起內亂對抗日沒好處，還是放了他，大家打日本鬼子吧！”可是張學良是個傻瓜，放了老蔣還去送他，結果老蔣不拉人屎把他給扣住了……”人們入迷地圍着他，聽他講。也有的人奇怪，怎麼他知道這麼多事情啊？可是又一想，老左訂着一份報紙，大概是報紙上說的。

老左平日愛幫工人弟兄的忙，不論認識的不認識的，只要有人求着他，他總是有多大力量出多大力量。

記得是一個冬天，有四個包綫工人因為干活掙的不够吃，“偷”廠子的綫被日本人抓住了。鬼子吼叫着用棍子、皮帶照着這四個人沒頭沒腦地亂打一通，打完了都反綁着扔到廠子大門口的汽車房裏。本來這四個人是在一塊兒干活的，可是挨完打以後見面都認不出誰是誰了。

天黑了，老左出車回來一進車棚，黑影里蹲着四個人。老左轉身出來就問看門的日本警備：“這是怎麼啦？”

“小偷地干活！”鬼子說。

“我的車沒有地方放，叫他們走了吧！”

日本鬼子頭搖的象“波浪鼓兒”一樣：“唔！不行！憲兵隊的送！”

老左一聽送憲兵隊，這怎麼得了！在那個時候送憲兵隊有幾個活着回來的啊！老左把車慢慢的开到汽車房裏，

裝着擦車，修理車磨磨蹭蹭地等着看動靜。停了一會兒，看門的鬼子該去吃飯了，走過來指着被打的工人向左振玉說：

“去左，你的看着，別叫跑了！”

“行！”老左一邊擦車，一邊回答。

過了一會兒，老左听着鬼子的皮鞋聲越去越遠了，望望已經進了南廠。他趕忙回來給這四個被綁着的工人解開繩子，“你們快走吧！出廠先別在傢里呆，有親戚朋友的先躲躲。”

“左師傅，我們跑了你怎麼辦？”一個工人擔心的問。

“這你們就別管了！快走吧！”

老左送他們到門口，碰上了中國警備，老左說：“你別管這件事，日本來了我對付他。”四個工人出了廠子撒腿就跑，當時廠子外面路燈很少，很黑，一會兒人就跑得沒影兒了。

老左正裝着在車房裡找人，日本鬼子回來了，問：“小偷呢？”

老左挺着急的樣子：“跑了！我上廁所去了，回來就不見了！”

“不行！”鬼子惡狠狠他說，也隨後端着刺刀拿着手电到處照。找了老半天也沒找見。鬼子不甘心地嘟囔着：

“不行！不行！”老左趁着這個機會就說：“他們跑了也活不了啦！你看頭打的大大的了，很快就會死了死了的！”

并且比划着说：“你的累了休息吧！掌櫃的哇哇哇的沒有，算了吧！”日本鬼子看人已經沒有了，最后也只好拉倒。

老左爱帮工人的忙，事事向着中国人，在工人之間傳开了，同时也引起了日本鬼子的注意。一天，一个日本警备，趁老左不在意的时候来试探他：“大左，有人說你‘八路’的干活？”

老左怔了一下，裝着不懂的样子問：“什么？扒路，鉄路的扒了？”

“不是……”日本拉着长声摇摇头。

“扒汽車路？……扒路發財的有沒有？”

“不是——”

“我的天津的開車，不識！”老左笑着摇摇头走了。

因为老左技术好，厂子里無論大小汽車出了毛病他一看就知道，而且有的非他修理不可，又是給厂子的日本头開車。所以小日本鬼子也不敢輕易得罪他。这个工人們公認的好人，倒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正来历。

原来他就是在老裕源（今天国棉二厂）領導过罢工的共产党员左振玉。那时他只有十八岁，是一个人緣好又敢干的小伙子。当时天津市党的領導者是彭真同志（当时化名傅茂工）。裕源細紗車間的几次罢工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連續取得胜利的。

有一次，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資，要求女工生小孩有

产假，去向厂方交涉。厂方不同意，并且逮捕了工人代表。厂内罢工了，汽笛“呜呜”叫，工人们都纷纷涌到院子里来。这时惹恼了一个外号叫“杨羔子”的人事科长，他站在高处扯着嗓门向着工人嚷：“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给你们两顿饱饭吃你们就闹事，有厂子你们就闹事，没有厂子你们吃树皮都摸不着。不好好干明天就关门……。”

这时一个小伙子跳上轱辘马大声地说：“工友们，团结起来，他不答复咱的条件，咱就不复工。他说咱们吃饱饭闹事，你们说这话对吗？”

“不对！”

“我们是喝西北风喝饱的。”

“不答复不复工！”工人们嚷着。

小伙子又指着“杨羔子”说：

“你们看杨二爷膘满肉肥，满面红光，你们再看咱哥儿们，一个个面黄肌瘦，咱就是把头割下来卖猪头肉，咱也卖不过他呀！”

这一下子可把“杨羔子”气坏了，他跳着脚说：“左振玉，你这小孩张口就骂人，这对你可是没有好处！”工人们哄笑起来，这家伙一气扭头就走了。这时左振玉的哥哥，怕弟弟出头闹事吃亏，劝他回家，在厂子里当头的表哥也劝阻他：“……你要求什么，我想法和上边说说。你领头闹这个干么？得了好处大家沾光，出了事你自己吃亏。再说，我在厂子里当头，你闹这些事叫我怎么办？”

左振玉一听他说这个就火了：“你当你的头，我当我的

的工人，少來管我的事！”

胆小的哥哥看弟弟頂當頭的，可就急了，過來舉手就想打他。沒想到左振玉上去就給哥哥一毛棍。氣的哥哥一邊追他一邊嚷：“以後我就不認你是我兄弟！”可是左振玉早就跑到罷工的兄弟們中間來指揮行動了。

細紗車間的罷工一直堅持到黑夜，左振玉怕有工賊破壞機器讓廠方找到借口，就一個人到車間里去檢查。就在這個時候，保安隊開來了，把廠子團團圍住，把車間的門從外邊上了鎖，用水龍頭向罷工的人們澆水。並且貼出大布告：有人逮住左振玉獻出來賞大洋二百元。並且揚言逮住後在工廠門口就地槍斃。

搜捕從夜里直到天明，從院子到車間，從一堆棉花到一台機器零件，箱子、廁所、門后，甚至樹窟窿都扒扒望望，可是連個人影也沒找到。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正在他進車間看望機器的時候，忽然發現車間外門被鎖上了，外面人聲嘈雜，他估計可能出事了，就想從粗紗車間的門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但走進粗紗車間，工人們就把他給圍住了，告訴他出不去了，外面在指名抓他。大家正沒辦法兒的時候，一個女工跑了過來說：“再不你就藏在我的車底下，我還開車干活，你就趴在底下別動。”就這樣，左振玉隱藏在并條機的棉條筒子后邊，機器轉着，棉條筒也轉着。敵人在車間轉了幾個過也沒找到，就這樣混過了敵人的眼睛。

快下夜班的時候，天還黑呼呼的。但是廠子大門口的

灯却象眼一样，瞪着明亮的大眼睛监视着工人。门口站满了保安队，端着枪等着检查工人。这时粗纱车间的工人，正在给左振玉化妆，有的跟他换衣服穿，有的递给他一个饭篮子，有人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给左振玉戴上……。

安排好了，也到了下班时间。左振玉就夹杂在人们中间走了出来，到门口，保安队用枪挡住，要一个一个地搜。这时工人们象开锅似的嚷开了：“大冷的天，这是干什么？”

“我们车间又没有罢工，查我们干什么？”

“谁闹事找谁，别找我们……。”

人们你推我挤，乱打一阵，一下把秩序搞乱了。工人们挤挤嚷嚷的一群一伙的涌出了工厂大门。左振玉就在这个人流中，在工友们千百只手的支援下，逃出了工厂。

天津暂时不能站脚了，他就在这一年逃到关外安东当了泥瓦匠。一年以后，他又回到天津做起革命工作来。

一九四四年他来到了我们厂。共产党员又回到工人群众中来，正象一粒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地上一样，它一定要抽芽，开花和结果的。正是四厂工人的斗争掀起了新的一页。

十二 第一个回合

八年，这苦难的岁月，人们总算熬出来了，虽然工人们还是穿着破衣裳，啃着“果仁饼”，可是总算是盼着不受鬼子的气了。人们都高兴的到处告诉：“鬼子投降啦！你知道不。”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周明刚的来到厂子，自称是国民党党部派来的，提出要组织纠察队。纠察队要干些什么他没说，对工人过去受的罪和现在的吃饭穿衣问题怎么办，他连问也不问，单一口咬定“得把工人都编成纠察队！”

当时工人们对国民党这个葫蘆卖的是什么药还摸不清。老左一看周明刚这个来头，就猜想：国民党是想趁着工人不了解他们的时候，先把工人抓在自己的手里，将来好便于统治。有斗争经验的老左是完全明白他们这一套。

厂子的职工小学有一个叫宋文鼎的小学教员，他和老左都住在第一宿舍，平常挺谈得来。因为宋文鼎从一九三九年就在厂子的小学校教书，所以认识的工人非常多。一天，老左找到他和几个工人，大家在一起商量说：“这八

年日本人刮的咱这么苦，他投降了咱不能让他白白的走！”

“那怎么办呢？”

老左說：“咱得跟他要恤劳金！”

經他这一提，大家都高兴了：“对！”当时有人提議：

“咱叫他發給咱三个月工資！”

老左搖搖頭說：“太少了！他刮咱工人的这些血汗叫他还是还不完的，可是咱也不能那么便宜他。我說咱要布，給他干一年的給一匹，干二年的給兩匹，干几年管他要几匹。”

大家都非常高兴，立刻选老左和宋文鼎当代表和日本人去交涉。

这几天日本人住的第二宿舍靜悄悄的。藤賴和青木自从被工人打了以后，再也不敢輕易出来了，整天愁眉苦臉的躲在家里。

早晨，他俩正在商量着什么事，老左和宋文鼎进去了，他們慌忙站了起来。藤賴还忙着讓出坐来：“大左的請坐！”老左点点头便先开口說：“現在工人选我們当代表找你們談談，我們工人过去給你們当牛当馬这些年，这笔賬算不清。今天你們完了不能这样白白地走，得給我們恤劳金。”

“恤劳金？”青木惊异的問。

“对！工人们現在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你們也知道！”

停了一会儿，藤賴故意拿着温和的腔調說：“現在你們中国的掌柜来了，我的說話的不行！”

老左接过来說：“現在厂子你們還沒交，你說給，中國掌拒來了我們去說。”

“你們先去說好，回來叫我給我的馬上就給。”蔡賴狡猾的笑着，表示他作不了这个主。

“好吧！”老左和宋文鼎二話沒說，轉身就下了樓。

这时候，国民党軍政部派一个叫高毅的上校来工厂接收。他全副武装挺神气的正在給工人講話：“……你們要好好幹，把工厂維持好，都好好作事別乱了。咱們中國胜利了，軍政部委派兄弟我来接收。过去我們抗战八年……”

老左大声的打断他的話：“可是，我們工人吃不飽得給我們想想办法呀！”

“你說什么？”高毅正說的眉开眼笑挺得意呢，被老左橫插一杠子有些摸不着头脑。

老左提高了嗓門說：“我們給鬼子干了八年，他喝我們多少血汗，他投降了一点報酬不給我們，不行！咱中国政府得給咱工人作主！”

这一下可把高毅僵了一軍。他結結巴巴地問：“那……你們說怎么办？”

“按給他干的年限算，給工人布，一年一匹。”

这家伙一听，就不負責任的往日本人身上推：“当下兄弟我还没有权利处理这件事。”

“你沒权利誰有？”工人盯着問。

“还是人家日本人……”

人們哄地一聲都笑了，不知是誰嚷了一句：“怎么咱中國勝利了，還是人家日本人有權利？”

“嗯！……話也不能那麼說！”他被几百對眼睛看的支支吾吾，毛毛咕咕，半句人話也說不出。

“你說應不應該給吧！你說給，我們再找日本人說去！”老左追問。

“我說給，可是人家日本人不給也不行啊！”

老左推推身邊的宋文鼎：“你去，把藤賴找來！”老左想，三頭對面，看他們還誰推誰。

不大一會兒，藤賴來了。老左對他說：“我們中國掌櫃的說了，你說給就行。”藤賴驚異的望望高毅，又看看工人，最後低聲說：“倉庫還有，給吧！”

這一來高毅沒話說了。

倉庫打開來，按發工資的辦法，由老左他們主持，有秩序的把布發給了工人。工人們高興的扛着布走回家去。

第一次鬥爭勝利了。工人們在這次鬥爭中体会到團結起來的力量。老左就抓住這個機會提出：“現在沒人管咱們工人的事，咱工人得自己管，咱得組織工會。”於是，工人們十二個人編成一個組，選出正副兩個組長。在工廠一進門東邊的那個小屋子外面，用寬寬的白紙寫了一個“工會籌備會”的條子，貼在門口。

工人們都擁護這個為工人謀福利的工會。周明剛組織的那個糾察隊，人越來越少。最後連周明剛也不知什麼時候不見了。

高毅这个接收大員，呆了些日子，因为工厂又归經济部接收，他也走了。可是临走时却把工厂的一輛小黑汽車給“劫收”走了。为这件事工厂找过他好几次，他不給。据說最后費了很大的交涉还是找回来了。

十三 “关錢跑接力”的日子

“关錢跑接力”，这个名詞讓現在的工人們听來，一定覺得挺新鮮，不懂是怎么回事。可是，只要問問在國民黨統治时期过来的老工人，誰沒有尝过这个辛酸的滋味啊！

鬼子投降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坐着飞机从天上飞來了。接收大員到了天津真是“劫收”：抢房子，抢金子，搶購股票，囤积布，油……鬧得天津市烏烟瘴气。物价一天三漲，報紙上头条消息常常是“百万巨款出籠，兵船粉已突破五十万大关……”鬧得人心惶惶。

厂子里以陈毅德、鄒廣华为首的接收大員們，上班來拿起報紙先看股票行情，接着就是打電話，不是問“开灤今天多少？”就是問“唐新”，“东亞”，“冠华”……打听金子价格，誰也不过問工厂的生产。車間里只留下几个沒权沒势的職員在那儿頂着，机器只要轉就行了。这些接收大員都是由國民黨四大家族之一宋子文的永興实业公司里选拔出來的。他們的待遇特別优厚，在厂子里单独有

職員廚房，每頓八菜一湯。每星期三、星期日由廠里汽車送他們進城去消遣。

可是工人可苦了！每到關錢的日子，你看吧！廠子开着大客車、卡車，由十幾個警衛押着到銀行去提款。十萬一張五十萬一張的大票子，一拉就是幾十麻袋。堆起來象小山一樣。工人領錢都需用面口袋裝或者用特為領錢做的特大手絹來裹。一到這一天，工廠的門口“送飯”的人特別多，老的，小的，抱小孩的婦女，無論刮大風還是下大雪，都在門口等着；紅燈一亮，工人們都手拿着錢，往門口鐵柵杆跟前跑，睜大了眼睛，找自己的父母、妻子、姐妹……門外的家屬也都擠到鐵柵杆外面，伸着手接錢。錢一到手，就趕快往市場上跑去买吃的。在這時候，廠門口的警衛，還常常拿槍托打人，吓的孩子們“哇哇”直哭。那種慘象，人們今天真是想也想不出！

沒有家屬的工人下了班也不敢先吃飯，也都是披上衣服出廠門就往市里跑，從工廠到東樓就有四五里地。扎緊腰帶一路小跑，到米面鋪門口挨上個兒等着。從天黑等到星星出來，等到三星下去，等到后明星出來，等到東方發亮。一個個凍的抱成一團，有的頂着簸箕，有的頭上圍着個破面袋，渾身上下都是霜雪！好不容易等到米面鋪的門開了，一個腫的臉上紅撲撲，穿着長袍馬褂的老板出來了，大聲嚷了一句：“今天沒有棒子面”，有時候眼看他屋子里存有糧食，可是他為了賣大價瞪着眼睛說：“沒有！”你要是再問：“你那屋里的不是棒子面嗎？”這個家伙就

把眼珠子一瞪說：“那个不卖！”随后把門“砰”地一声关上了！

这一夜又算白等了！工人还没等回家吃点什么呢，就又上班的时间了，白等还不要紧，最难过的是身上背着这半面袋票子，轉眼之間就变成废纸了，这半个月的血汗又算白流了！

布場有个工人罗长生，有一次关了錢，下了班急急忙忙，衣服也沒顧得穿，披着衣裳，出門迎着海大道（現在大沽南路）三步并作兩步走，一气赶到东樓。來到一家黑色鉄門的鋪子前面，他闖进去一看，还好！有一点棒子面沒卖完。老罗非常高兴，心想：“这回算沒有白来！”当問好价錢以后，忽然發現忘了帶出口袋了。急的老罗只埋怨自己：唉！怎么这么不中用啊！家里还摸不开鍋呢！附近又不認識人，回去拿又怕人家卖了，左右为难了老半天；最后想了个主意：先跟老板买袋，再回家去拿口袋来裝，他一探老板的口气，看样子也行了。老罗忙掏出錢交给老板，买了十九斤玉米面。买袋之后，老罗就忙着回家，他不放心，走了几步又回来跟老板說：“我到家拿了面口袋就回来啊！”老板点点头。

罗长生一气跑到家，跟老婆什么話也沒說，就到处乱翻。老婆急的問：“你找什么呀，啊！”

“面口袋。”老罗說。

他老婆找出一个破口袋遞給他說：“你不吃点东西再走？”

“不行啊！”老罗拿上面袋急急忙忙就跑。到了米面庄的浑身是汗，进门跟老板点了点头，还没等老罗说话呢，老板就先开口了：“拿口袋来啦，现在玉米面价又涨上两倍，不卖了！”

老罗楞住了：问：“为什么不卖，我都交了钱啦……”

“你货没拿走不算！”老板说着把钱退给了罗长生。

罗长生说了半天好话：“我家有孩子，今天就没吃的了……少卖给我点儿。”可是老板板着脸不理。

罗长生拿着钱走出来又往别的铺子去看，家家都关着门。一开都说：“涨价啦！现在不卖！”

结果只有手里擦着票子挨饿！

象这样稀奇古怪的事，在那个时候多着呢！工人们白天黑夜流血流汗，领的是国民党那骗人的票子，又受着奸商的剥削，只好都饿着肚子干活！

十四 一个不“买账”的工会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工会正式成立那天，在紗場飯厅开会。男女工人一千多，把这个不大的飯厅挤得满满的。工人们在这个会上选出苏志新等七人为工会委员，左振玉为工会的理事长。会正开得热烈的时候，突然，駐厂的国民党守衛連长郑学礼上台講开話了：“我們军队抗战八年，打走了日本鬼子。沒有军队，咱們工人就不能在这儿开这样的会……。”老左一听，这是扯些什么呀，他就跳上講台，对着台下大声地說：“叫我看不論是誰，他离开我們工人也活不了！”这时台下工人都嘿嘿地笑了，大家都小声互相咬耳朵議論开了。郑学礼尷尬的站在一边。老左接着說：“咱工人別認為是吃別人飯活着的，日本人也好，那些住洋樓的、坐汽車的也好，他們都是喝咱工人的血汗来的錢。就是军队也是一样，沒有咱工人給做槍炮子彈，他一樣也打不了仗……。”这时台下响起了一陣热烈的鼓掌聲。老左接着又講了下去：“咱工人要團結一心，要知道，沒咱自己的工会，咱工人死活就沒人管……。”这时

郑学礼不知什么时候早溜下讲台，从人群中挤出去了。

会接着进行。经过工人讨论，最后向厂方提出五个条件：

1. 开除工人必须通过工会。
2. 工人工资由工会小组评定。
3. 女工有八个礼拜的产假。
4. 不许随便任用私人，用人要招考由工会监考。
5. 升老工人为生产助理员。

会后，由工会代表把工人提出的条件交给了厂方。当时，因为厂方看到工人当时的声势，所以没怎么刁难就答应下来了。

这时候有一个叫何西千的特务每天到厂子里来，据说他是当时国民党纺管局长的腿子。这个家伙每天在厂子里到处蹓跶，一会儿到工会办公室看看，一会儿到厂长室坐坐，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一天，鄒廣华把老左找去了，说是美国军队和“国军”要开到天津了，让工会组织工人去慰问。慰问品用厂子里过去存的一部份毛巾和手套。老左一听就明白了，大概何西千这些天到处转游就是活动这件事。老左停了一会儿就问：“我们工人干活还没有手套呢，为什么慰劳他们呀？他们对咱工人有什么好处？”

“怎么能这么说！”鄒廣华不高兴地说。

老左没有理他，接着说：“那些东西是日本时候留下的，是工人血汗换来的。叫我着应该把那些东西分给我们

工人！”

鄒慶華搖着腦袋說：“那不行！上級有指示，‘國軍’來了都得去慰問……。”

“去不去回頭工會得跟工人商量。”老左說着就走了。气得鄒慶華坐在椅子上半天也沒吭聲。

老左回來就找些工人積極分子商量，這時有的工人還不太知道“國軍”是怎么回事。老左說：“‘七七’事變前，中國軍隊打中國人，欺壓工人。日本來了，他們跑了把咱丟下不管。咱要他的賬干么？”

工人們一聽，對呀！都說：“咱不去！”老左說：“不光不去。那東西咱得給工人分了。”大家都贊成。第二天又跟鄒慶華去交涉，他看工人實在不去，也沒有辦法。最後只好答應工人的要求，東西分給工人，四廠工人不去慰勞“國軍”。

花招是要不完的。又過了幾天，何西千自己跑到工會去，要工會組織工人參加反蘇游行。

工會委員們就找老左商量，老左裝着不懂的說：“蘇聯對咱工人有么坏处？咱反人家干什么？”委員們一聽都笑了。有的說：“可不是，咱反人家干什么？”老左擺擺手說：“咱工會主要是替工人辦事。管他們反蘇，反德呢！他們愛反誰反誰，咱管那些干什么？”

“對！不去！”

就這樣天津市這次由特務操縱的反動的游行，四廠的工人一個也沒有參加。

工会成立后，工人生活就一天比一天好了。先說吃的棒子面，厂子里买来后，得先由工会挑，工会把各样棒子面都蒸成窝头，分給各个工人小组去尝，大家說哪样好吃，工会就叫厂子买哪样的棒子面發給工人。

老左又提出来：“咱工人得学認字。兩眼睛，到什么时候也得受气！”于是工人就輪流到夜校，由宋文鼎、李希灵教大家認字。这时还由工会出个刊物叫“业余自修”周刊，这个刊物是油印的单篇。由地下党员苏志新、宋文鼎同志負責編印。上面有短文，有諷刺国民党贪污腐化的漫画，它一出来就引起了当时敌人的注意。敌人把这个刊物作为研究四厂工全性質的重要資料，保存在他們的档案里。如，現在在天津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展出的民語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第六期上，就有这样的內容：“……你細心想想，过去吃的是什幺，穿的是什幺，我們以我們的身體，血汗做求生的資本，必須換來同等的代價。如果牛一般的干，所得却很少，不能吃穿，就必须向厂方要求。然而一个人要求是不会成功的，所以要組織團結，這在我們勞苦工友們是不可缺少的！”还有的上面写着：“我們这团体是代表我們这群工人的。一定有人在背后搗乱，比如，給你很大好处，便于破坏团体，你要切实注意別上了当！要記住你也是一个勞苦工人……。”

这个刊物当时在工人中流傳的非常广。工人們常常在窩鋪里的小油灯下圍在一起讀。然后再把它裝在破衣服的口袋里，悄悄地送給別的工人。这个沾滿了工人手上油泥

的刊物就像一顆紅色的種子，在工人羣眾中傳播着進步思想，堅定着鬥爭意志。

四廠的工會一成立，就象樹立起一面鮮艷的紅旗，它吸引和團結着全廠的工人，為工人階級的利益進行鬥爭。工人們熱情的管工會叫“我們的工會”。

正因為這樣，它也引起了廠方和一些特務們的注意，他們在背後開始了策劃推翻這個進步工會的對謀。

十五 中心公园东南角

早晨九点钟左右，这个城市还是半睡眠状态呢！有钱的阔人们，平常是酒绿灯红过半夜，这个时候正躺在被窝里享福；贫苦的人们，却很早很早就起来卖苦力去了。所以，在这个时间里，劝业场附近的中心公园（过去叫法国花园）里是冷冷清清的，甚至连树叶落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这时，一个穿着一身蓝制服，戴一顶美国呢帽的人，正坐在中心公园东南角的长椅子上，拿着一张报纸在翻看着。他拿着报纸，不住的翻过来又翻过去，有时好象不在意地抬头望望马路上的行人。

这个人就是左振玉同志，他正在这里等待着和党组织取得联系。看来他很闲在的坐在那里，可是这时老左的心情却十分复杂，忧心这又是敌人的阴谋，可又盼望着真的是组织找自己来了。和党失去联系许多年了，多么盼望有这么不平常的一天啊！

提起来话就长了，老左从安东回来见到彭真同志（当

时名傅茂工)以后,組織上就派他到南区区委去工作。那时他才三十多岁,掩护他的职业是三义庄营盘路林成汽车行的汽车司机。

当时是做农民工作。那时小滑庄、西楼、东楼、贺家日子、小刘庄,大部份是菜园子地,这些地都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大地主李善人的地。这个大地主想把这一带土地收回卖了。党就领导了这一带的佃农組織了农民联合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

“我們要活着!”

“我們要土地!”

“反对狗善人!”

农民們游行示威到李善人公館(現在平安影院对过),要求他答复条件。以后又包围了天津法院,终于取得胜利,这片土地从这以后再沒有要过錢收过租。

左振玉就参加和組織了这一次党所领导的天津市在历史上有名的“农民的反收地斗争”。

后来因为叛徒出卖,天津市委被敌人破坏,左振玉就和彭真等同志一块被捕了。

在獄中,彭真同志对他們說:“老左,你就承認鬧过工会,其他都不知道。我們这几个人(指当时党的負責同志)可能槍斃,你俩是工人可能不至于……。”他这一說老左和其他几个工人同志都哭了。

当时敌人用尽了酷刑对付这些同志,尤其是对彭真同志,更是残酷,但是回到監獄,彭真同志总要問一問每个

人过堂的情况。一次老左告诉他：“我的口供上写着我散过传单……。”彭真同志立刻说：“这不行，这你得反供，不能承认散传单。”第二天过堂老左就反供了，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传单，我是个六老粗，我又不认识字。”这样，由于党的营救，彭真等同志判了九年零十一个月徒刑，老左等几个工人同志判了三年。

在狱中，老左和同志们一道，参加了党领导的天津第三监狱的罢饭斗争。后来，彭真等同志解往北京，老左满刑后被放了出来，可是从这以后就和党失掉了联系。

老左又开始到处做工，在他给瑞典领事馆开车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到家来找他。这个人小圆脸，扁鼻梁，薄薄的嘴唇，牙扭扭着支在外面。他第一句话就说：“左振玉在不，……竟派我来找你，听说你出来啦，我叫蒋一。”老左真高兴极了，让他住在家里，挣钱供他吃喝。他叫老左搞工会，老左就又找到自己过去认识的工人和农民骨干，把他们组织起来准备斗争。

一天，老左下班回来，准备到山东坟地的乱葬岗子去开会，他刚刚走到桥头上，就有两辆铁甲车把庄子包围了，特务用手枪在身后对着他：“你是左振玉吗？”

“是，怎么！”

“你往分局那边走！”

就这样老左第二次又被捕了。

过堂的时候，老左正猜疑被捕的原因呢，一抬头，一眼就看见了蒋一。老左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定了定神仔

細看看，可不是！審問他的正是蔣一这个叛徒和國民黨執行委員邵華。

蔣一開口了：“老左，你不是總鬧工會嗎？”老左恨的咬咬牙，反問：“我鬧不是你叫我鬧的嗎？你不是說有了工會工人不失業，我一想這是好事！你不是還叫我搞開車的工會嗎？”

顯然蔣一早就心里有數了。他沒再問下去，接着說：“你是個粗人沒什麼心眼，出去掙錢開車，不許再鬧了。”說着就走了出去。

這一次老左判了六個月徒刑。

出來後，老左改了名字叫左振五，關係斷了，他只有還干老行業，找地方去開車。

恰好四廠報考汽車司機，他就考進了四廠。

日本投降以後，他開始組織工人鬥爭的時候，還和組織上沒有聯繫上呢；但是，他相信在天津、在他的身邊一定有共產黨。只要他站穩工人階級的立場，凭着過去黨領導工人鬥爭的精神辦事，黨組織一定會來找他的。

果然是這樣的。

有一天，老左正在第二宿舍的小花園里干活，有一個叫李鴻恩的管倉庫的職員找他來了。這個人平常表現得很靠近工會，尤其是对老左十分關心，老左對他印象很好，有些什麼事也願意找他去商量商量。老左笑着問他：“老李，有事嗎？”李鴻恩笑了，拉住老左低聲說：“你明天去法國花園（即中心公園）。穿藍制服，戴美國帽，手拿

一份報紙坐在東南角的椅子上，到時候有人跟你說話。”

說完，李鴻恩就走了。老左猶疑了半天，但最後還是決定去冒冒險。

這就是老左來到這裡的經過。

十點來鐘，進園來一個穿長袍，西服褲子，學生打扮的人。他不慌不忙走到老左身邊的椅子上，坐下輕聲的說：“你是左振玉嗎？”

“是！”

“你認得李鴻恩嗎？”

“認識！”

“好，你跟我走吧！”這個人和藹的說。

他領著老左走進耀華里一座小院子。院子里堆滿了貨物，他們直接上了二樓。坐下後，這個不相識的人笑著自我介紹：“我叫劉元春。……你的工作做的很好呀！有什麼困難嗎？”

“困難是有的！”

“你過去搞過工會嗎？”

“搞過，在老裕源（即國棉二廠）。”

“很好，這就算咱交個朋友。我也愛搞工人的事，四廠的工會咱得好好搞搞……。”

談話就是這樣開始了。

四廠從這個不平凡的日子起，在黨的直接領導下進一步發展了地下黨的組織。由左振玉、蘇志新、宋文鼎、李希靈等同志組成領導核心。四廠的工會，也就是從這個不

平凡的日子起，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对統治阶级和他的爪牙們，展开了新的斗争。

十六 赶走楊家父子

在厂里只要你提起楊胖子来，工人都会咬牙切齿的說：“这小子，太坏了！”要問为什么工人这样恨他，那就得慢慢的从头說起。

厂子剛盖起来的时候，东棉洋行介紹給厂子一个日本翻譯，这人姓楊，人們都管他叫“楊三爷”。他有个儿子，在“創新”建造公司当监工，厂子盖好以后，日本人見他能欺压工人，又会說上几句鬼子話，就留他在人事系当了一个小職員，后来就被提升为日本翻譯。他們都很胖，工人們都称呼他們楊胖子，籠統的叫楊胖子又怕分不清，以后就管他爹叫“老楊胖子”，管他儿子叫“小楊胖子”。

先說老楊胖子吧；那个时候他有五十多岁，名叫楊之章。鑲着滿口金牙，天津口音，矮个儿，一臉橫絲肉，走道时一走一哼哼，从背后看真象个大狗熊。因为他行三，工人們見了他都远远的喊他声“楊三爷”。開大水以后，日本人見他老了，就派他到工房管宿舍。在宿舍里日本人

是大閻王，他是二閻王。在管理室一坐，夏天拿着日本膏藥旗的小扇一搗，真是說一不二，敲詐勒索什麼都干。就拿洗澡這件小事來說吧，那時第一工房的東北角，有一間小屋，屋裏只有一個四尺見方的池子，那就是日本時期工人洗澡的地方。他告訴燒澡塘子的工友劉玉海說：“每天燒熱後，你先請我去，別人等會兒！”池子小，人多，誰都想洗個乾淨水；可是不行，工人們不論來多麼早，也不能先洗。到鐘點洗澡了，老楊胖子就呼呼哧哧地走來了。工人和家屬們不論是刮風下雨，都得到外邊等着。第一水總是他先洗。有時不知道的人就問：“到點啦！怎麼還不叫洗？”劉玉海就說：“三爺還沒洗完呢！”就是他來晚了，也得給他留着。他不先洗，別人不許進澡塘。

那時工人們住在工房里，出門進門帶個包袱行李都得到他的管理室登記。趁着這個機會，他還要對工人說：“進城啊？給我捎兩個泡兒（大煙）來，我回頭給錢。”要不就是：“回頭給我捎兩斤肉來，到我家去拿錢。”可是誰敢要他的錢，要了錢你就甭想活了！可是工人又不敢不捎，有時只好把包袱里仅有的幾件衣服當了，或是找親戚朋友借幾個錢給他買，買來以後還得給送家去。還得表示甘心情願不要錢。工人們餓着肚子也得這麼辦，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說”。

他規定宿舍里任何人不得招局打牌，可是他呢，公開的在工房事務所（管理室）里間屋招局打牌。有時，他約工人去打牌，工人們吃飯還顧不上呢，那還有心打牌！可

是又不敢不去，只好說：“一兩塊行，多了可不行啊！”他連拉帶扯的說：“这么死心眼儿，就是玩玩么！”結果三下兩下錢都跑到他手里去了。

因为他是管理宿舍的，工人想要住房子都得先找他。找他就得給他送禮才行。厂里有个工資員姓騰的，原来和老楊胖子的关系还算不錯，都住在工房甲字內，兩家只隔着二三个門。不知因为什么姓騰的讓日本人給开除了，这个狠心腸的老家伙，就翻臉不認人。头天开除，第二天就逼着人搬家。誰馬上能找得着房子，四五个孩子上那去住呢，孩子“哇哇”的哭，老婆也哭，急得老騰咬牙跺脚，跺得地都山响。沒有錢給他送禮，只有托个人跟他求情，想多住上几天。老左和苏志新找到老楊胖子，好話說了一車也是不行，他不見东西不吐口。老左回来以后气的对老騰說：“沒有人心，別跟他說啦！在外边找房子，我們大伙給你湊錢。”最后讓董錫元在土城一带找了一間小房，就这样搬出去了。对下級職員都是这样，对待工人那就更甭提了！

宿舍里的杂工每天上班以前，都得先到他家白效劳一个多鐘头，扫院子，倒土箱，提涼水。誰不买他的賬，誰的事就别想干了！連在宿舍門口卖东西的小販，見了他都得先給“三爷来点儿！”才能卖呢！理髮根本就没有花过錢……。

小楊胖子名叫楊金声，比他爹还要坏，他經常穿着西裝，油头擦的亮亮的，整天提着个小棍儿到处轉游。

厂里有个电灯匠叫宫殿臣，这个人，身材很高大，有四十多岁，工人们都管他叫“大老宫”。一年冬天有人偷了电线，让日本鬼子给查着了，宫师傅怕鬼子猜疑与他有关系，吓得跑啦，想躲躲风声。又不敢在工房家里藏着，只好黑夜白天都在大开洼的葦地里。冤家路窄，让厂里守衛给看见了，进厂就报告给日本啦。小杨胖子象得了什么喜事似的，叫上日本人“門間”和二一个守衛到野地里把宫师傅抓了回来。十冬腊月的天气，宫师傅被扒光了衣服吊在院里铁杠子上打。打完后再灌凉水，灌饱了再用脚踩肚子，連冻带灌死了几个死，最后还是开除了。

一九四二年，他借着自己結婚和給老楊胖子作寿为名，“飞帖打网”，各个与厂里有关系的商号、厂里的职员工人，甚至不認識他的人，都收到了他的請帖。誰收到了請帖也不敢不去，卖褲子当袄也得“送礼”。旧社会穷人娶媳妇赔錢，可是他賺錢。結婚这一次就賺了五百多塊伪联幣。老楊胖子做寿賺了一千五百塊联幣。

一九四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最猖狂的时候，人們連豆餅都吃不上。他却和日本人組織一个什么“娱乐队”，去河北省的大城、宝坻、永清等六七个县宣傳强化治安。回来还到处吹嘘“大东亚共荣圈”，討好日本鬼子。

他打罵工人的情况都无法計算，据他自己供認：“記着名字的就有三十九人之多，还强奸过四名妇女。”

这两个大汉奸，在日本投降以后，还大搖大摆的在工厂出来进去的。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工会以后，就要求工会

想法处理他们父子俩。

一天上午，在第一宿舍的工会办公室，召开工会小组长和工人代表会。男的女的把小屋挤的满满的，窗子外面还站着许多工人。老左向大家说明开会的目的：“仗着日本人，他过去骑在咱头上，他是大汉奸；今天咱工人有权处理他，咱大家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随后就把杨胖子父子俩叫来了。这两个家伙进屋来，还扬着头满不在乎，工人齐喊：

“叫他把头低下！”

“叫他站着！”

他们一看这么多的人，都仇恨的盯着自己，吓的老杨胖子忙着把两个胳膊搭拉下来了，低着头一动也不敢动。工人们就站起来对大家控诉他们的罪恶。

会愈开愈起劲，工人们都忘了回家吃饭。直到工会主席根据大家的要求，宣布限他们爷俩“三天之内搬出工房”，大家才出了这口气，高高兴兴的散了会。

这两个汉奸，就这样被工人赶出了工厂。

十七 斗争狗腿子張文福

斗过楊家父子以后，工会又领导工人斗争狗腿子張文福。

老工人们都记得，日本鬼子在的时候，最苦的日子，莫过于三次“治安强化”了！真好象一条绳子勒在工人的脖子上，一次比一次勒的紧！有的工人说：“再多来两次强化，工人就都死了！”

日本人讓工人吃土豆、苦棒子面、豆餅、果仁餅……。棒子面經常是长了綠毛的，干成一塊一塊的象石头一样硬，吃的时候要用鑊头砸碎，好歹上鍋蒸蒸就吃。因为一碰就散，所以吃时还得用手捧着吃，又苦又辣！果仁餅本来是土地用的，黑的和土色一样，里面尽是一些头髮碴子，工人们領到这个，也只好一塊一塊的用手拿着嚼！有的时候發給棒子粒；工人家里又没有碾子沒有磨，只好煮煮吃。可是，就是这个还吃不飽呢！工人们經常餓着肚子去上工。有的工人下夜班后，不回家睡覺，就跑到菜市去，在地上拣人家扔了的白菜帮子和烂土豆吃。

就在日本鬼子这样殘酷的对待工人的时候，狗腿子张文福，还要从中榨工人的油水。

这个日本人的忠实走狗，自从給日本人买地，在鬼子面前立了大功以后，随着工厂的建成，一直留在工厂里沒走。他是人事科負責人福出手下的亲信，外号“小福田”。給工人采买粮食都是他跑腿包办。

别看这个家伙在厂子里沒有担任什么名义，可是权限却不小，每月領錢。天天吃飽沒事就到市場上去蹓。哪个粮店来了坏棒子面，哪只輪船又卸下豆餅了……，他就跑去告訴日本人。什么越坏他就越买什么給工人吃。因为东西越坏，他越能从中撈錢。买了以后，由他的大車給运到厂子里来。

到月底关吃的了，工厂門口，口袋堆的就象山一样，可是誰也不敢問里面是什么，反正發給什么你就得吃什么。

工人们站着，一个个的都拿着口袋等着。这时，张文福常常是戴着个緞子帽刺儿，穿着个灰大褂，拿着棍子往旁边一站，看着人們給工人往口袋里倒粮食。当工人一个一个走过来的时候，倒粮食的人兩只手攥着两个口袋角，对着工人的粮食口袋嘴一倒，报一下名字，工人就得赶快走过去。每个人都是同样的給法儿。可是这攥着的两个口袋角里却有名堂呢！那兩只大手起碼抓住兩大把面子。看看吧！就是这种东西他們还給不够数，你想几千工人，他們賺多少哇！回去抖落口袋时，张文福他們这些人就又从申撈了一把。

因为他坑害工人，从中贪污，又在日本手里买好，所以他在四厂发了财。几千工人的厕所，大粪归他。日本盖工厂时剩下的许多地，也归他雇人种着。他呢，在厂里拿着钱，混着吃喝。工人见面还得喊他一声“张爷”。

工会成立以后，工人们有了主心骨。许多工人都跑到工会来要求：“咱中国胜利了，过去坑害过咱工人的汉奸，咱得跟他算算账！”

这时工人们一下就想到张文福。纷纷要求工会送呈子到当时的国民党市党部和社会局去告他。

老左根据组织的指示说：“咱别让他们处理，张文福有的是钱，他拿钱一运动就完啦！要处理他咱工会自己处理。”

工人们非常同意老左的意见，于是工人们自己组织了一个斗争会。

这一天，工人们听说要斗争张文福，高兴得连饭都不回家吃了，工会小组长和代表们早早就来到会场。有的女工抱着孩子也赶来参加会。工会的小屋子挤得满满的。

张文福被领进来了，他翻着三角小眼睛不住地看大伙，表示满不在乎的样子。工人们说：“你就站在那儿吧！”

“好吧！”张文福点点头，还满神气呢。

这时老左说：“今天这个会就是为你开的。叫你在会上对我们工人说说你过去都作了些什么事，你喝工人多少血，你向大伙说说。你引起了大家的公愤！”

张文福小眼睛一翻，苦笑笑：“我没么说的，你们大

伙說我做了什么……嗯，我就認什么吧！”

有的工人恼了，喊：“揍他！你喝工人那么多血，你裝傻行嗎？”

接着工人就質問他：“你为什么給工人买苦棒子面？”

“那是人吃的东西嗎？”

“喂牲口还給把粮食呢！……”

张文福裝着結結巴巴地說：“那是日本人的主意……不是我呀！”

“日本人怎么知道哪里有辣棒子面的？”这一問，他不說話了。

工人又說：“你得說說，你从中賺了多少东西？”

“我記不清了！”

有的工人恨的跑上来一把推了他一个趔趄。

张文福慌了，忙着說：“反正我給大家买坏东西吃，是为賺一部分錢唄！”

工人提議：“不行！咱得开除他，他是汉奸走狗……。”

“对！馬上叫他出厂！”

“他貪污的我們工人的，他得給我們退出来！”

“他雇人种的地也得交出来！”

當場大家討論，一致同意：

1. 叫张文福立即滾出工厂。
2. 罰一百万法幣，賠償工人損失。
3. 把地交出来給工会。
4. 把他討好日本人，天天接送日本人的車和大黑馬沒

收。

就是这样，这个盘踞在厂子里八年的狗腿子，被工人赶出了工厂。

张文福交出了地，由工会农菜股负责分给工人种了，出的菜廉价卖给工人。车和马由工会集体使用。

一百万法币用来开了一个工人合作社。在第一宿舍的门口。这里的日用品如毛巾、手套、鞋袜、肥皂和吃的东西，从来不涨价，工人可以自由赊账，月底有钱再还。免得工人为了买一双鞋也得走十几里地进城去买。这受到工人们的热烈的欢迎。都说：“这工会是真给咱工人办事啊！”还有的说：“工会真好，我正那么一想，他就那么来了！”

十八 包圍辦公大樓

厂方答复工会提出的五大条件以后，没有过多少天，工人们突然发现厂子里来了一个生人。这个人是大高个子，胖胖的。也是上班就来，下班就到职员食堂去吃八菜一汤，他也不进车间，也不干活，总是穿着一身便服，一个油泥点儿也不沾。这个人是个干什么的呢？

后来工人们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厂子里新上的警备队长。名字叫和金波。是国民党经济部某个官的亲戚。

“厂方不是同意我们提出的条件，不能随便任用私人吗？他们为什么不尊重咱们工人？”工人们马上就找到工会，工会研究以后推老左和郑庆龙去和厂方交涉。

下午四点多钟，老左和另外一个工人就上办公大楼厂长室去了。工人们在楼下等着听信儿。

老左他们进了厂长室，正好陈毅德，总工程师谢震华都在。他们穿着笔挺的西装，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见老左他们进去，陈毅德身也没欠地哼了一句：“有事吗？”

老左说：“我们想问一下，厂子里新来的那个和金波

是干什么的。”

鄒廣华一听就不高兴了，把臉一板說：“你們工会不能干涉我們行政太厉害了！”

“你們不是答应工人提出的这一条了嗎？”老左質問。

“我問問你們，我們工人的亲戚朋友，失业的、吃不上飯的更多的是，我們随便上来一个行不行？”郑庆龙也走上前来質問。

鄒廣华輕蔑地用鼻子哼了一下，把头偏到一边去。老左走近一步坚决的說：“这件事我們工人要管。你們能干不能干的都来了，将来把厂子搞垮了叫我們工人受罪那不行！”

陈毅德不答理地坐着，鄒廣华站了起来，生气地說：“你們管不行！”

老左大声地說：“我們工人要管。过去就是因为你們这样裙带風，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来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才把咱們中国弄的乱七八糟。現在你們再这样办就不行，咱就是得按工会提的条件办事，用人招考，誰能干叫誰干！”

鄒廣华搖頭晃腦說：“那个不行！”

老左說：“那个不行！工人找上来你可对付！”

老左一甩手就下了楼。

工人們一听說情况是这样，就翻了江了！人象潮水一样从各个車間涌到办公大楼里来，糾察队把職員們集中到一个小屋子里。整个楼下，窗子外面連材料科的大台台上

都挤满了人。

工人们向楼上喊：“不许上私人！”

“上人招考！不尊重工会提出的条件不行！”

“谁有本事谁干！”

“楼上的下来和我们工人说话！”

“皇亲国舅都得滚蛋！”

声音真象开了口子的洪水一样，好象整个大楼都摇晃起来。

这时可把楼上的人吓坏了，逞凶的鄒廣华也坐不稳沙发，偷偷地从窗戶缝往楼下看，急的团团转。大鼻子陈毅德也没有刚才那么大派头了。一个劲儿地对鄒廣华说：

“不行！咱得下去一下呀！”

陈毅德在前头，鄒廣华跟在后面，从楼梯上走了下来。陈毅德不住地点头说：“……你们别这么闹，咱有事大家慢慢商議！”

“我们不是跟你们商議了嗎？”工人们说。

这时驻厂的军队在大門上对着工人架上了机关枪，连长郑学礼在指手划脚的吩咐军队包围工人。工人一看可火了，在外面的许多人跑回去拿出刀子棍子准备和军队拚，还有的要上去夺军队的机关枪。屋里的女工們也都急了，一个个都操起了办公桌上的壶碗，还有的把釘書器，墨水瓶都拿在手里，吓的陈毅德和鄒廣华忙着捂上了臉，一动也不敢动。老左拦住了工人，指着外面对着他俩说：“你们架枪跟工人冲突起来把厂子砸了，我们工会不負責任！”

陈毅德吓的一劲地嚷：“是誰叫架槍啦？啊！快去告訴他們……”总务科长許曉航吓的直給工人作揖：“看我！看我！讓他們馬上撤了！”說着慌忙从人群中挤了出去，站在院子里对門口喊：“誰叫你們架槍啦？快撤了！”

軍隊把槍撤了，工人們都站在那里憤怒地要求厂方答复。鄒廣华拿起電話，工人寧上去按住不叫打。这时老左說：“叫他打！”陈毅德一劲儿向大家点头：“大家別急，咱得請示一下……”

“你是厂长，你請示誰，”

“你別应付我們……”

正在纏持的时候，突然从外面来了一輛小灰汽車。从車上走下来一个大高个子。工人們一看这个大圓‘餅子’扁臉，貓貓腰的樣子，有的就認出来了。这是第三棉紡厂的厂长，外号叫“大樹張”。看情况他是被邀請当說客的。

这家伙大搖大摆地走进办公室，自己找个高桌子爬了上去。先咳嗽兩下笑迷迷地說：“兄弟我想和大家見見面……”他剛說一句。有的工人就說：“他算干什么的，叫他出去！”老左說：“听他說什么！”

他又接着說下去：“你們工人要好好做工，至于厂方有些事情，行政上有权利处理。你們要是干涉行政，那就不好办了……”

这时站在前面的女工嚷嚷开了：“你听他說些什么呀？”

“拉下他来揍他！”

“吐他！”这时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的女工扯着他的大衣角就从桌子上往下拉。后面一个男工“嗖”的一下就抽出一把刀子来！

“大褂张”，被拉的差点儿从桌子上翻下来。他哆嗦着忙着向工人作揖：“我是为你们了事来啦！我是为你们好……别打！别打！咱别误会了！”

这时女工们往前一拥，一齐搭住他的衣裳，连拉带推，终于把他从桌子上翻了下来。

陈毅德一看这情况，忙着弯腰打躬地说：“我答复，我答复……”

老左拦住大伙说：“大家松开他，不是厂长说答复咱了吗？咱叫他写个布告！”

鄒廣华这个在工人面前总逞凶的人，也溜到一旁不敢言语了。

这时总务科长端过来墨和毛笔。又取来一大张白纸铺在桌子上。陈毅德拿起笔来颤抖着在纸上写：“……以后凡我厂纳用职工，一律招考由工会监考。警备队长和金波未經正式招考手續，应立即令其出厂。”

总务科长，马上拿浆子把这张布告贴在办公大楼外面的墙上。

这时陈毅德和鄒廣华，外加上“大褂张”都站在那里，等待着工人发放他们。老左提議：“厂长，你光写了这个不行，我们工人为这件事下班都没有回家，整整耽誤了两个小时，你得給加班加点費！”

陈毅德和鄒慶华同时一愣，可是他們一看见工人都站在那里不动，馬上說：“可以！可以！”

老左一摆手，工人们散去了。他們三个象吓破了胆的囚犯一样，一个跟一个有气沒力地上了楼。斗争結束的时候正六点，太阳已經西下了，火紅的晚霞正照在办公大楼前面新貼的布告上。白紙黑字显得格外鮮明。工人们上班来的下班走的从布告跟前走过，都站住脚望望，然后胜利地互相笑笑走了过去。

后来，老左将这次斗争的情况向組織汇报了，組織上認为这次斗争搞得很有气魄。

十九 搗毀水上派出所

在天津的革命歷史博物館里，陳列着一條渡船。這條船就是當年在海河上楊莊子渡口的擺渡，它不僅是早晨、黃昏，風天、雨夜來往擺渡了一般的行人，而且它和工人一道經歷了一次鬥爭的風暴。它，可以說是反動的國民黨統治時期，工人階級團結和鬥爭的見證。

我們的第四棉紡織廠和第五棉紡織廠中間只隔着一條海河。站在我們廠子后面的河邊上，就可以看見對岸五廠的沿河圍牆和廠房。他們上工的汽笛我們聽的非常清楚，我們發出的鬥爭的警報，他們也全知道。

在那些被敵人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的日子裡，五廠的地下黨員張家樞和孫世瑤，經常坐着這條船來四廠找共產黨員左振玉共同研究如何向敵人進行鬥爭。五廠工人們為了逃避敵人的監視，也經常在晚上坐着這個擺渡到四廠的工會來開秘密會議。四廠工人們，在五廠紅色工會成立的日子，曾經化妝成秧歌隊，扛着高蹺腿子，渡河去祝賀，實際上就是用高蹺腿子當武器，防備敵人破壞選舉，以支援

五厂。当五厂起訴向伪警察局告汉奸李义修的时候，需要錢，四厂的工人們用食堂盛饅餡的大簸籬，放在工厂門口写着：“工人团结一家，自动捐款援助五厂工会”。工人們便勒紧了腰帶，把錢慷慨的扔到簸籬里面。有的工人把半个月的工錢都放到里面。然后，由工会把这些錢送过河去。

四厂和五厂工人亲密的团结在一起，这使敌人非常震动。因此，四厂和五厂当时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釘。在河防上，在工厂的警衛上，加强了对兩厂工人的監視。当时敌人对这两厂工人的力量是畏俱的，所以就阴谋利用流氓打手打架、斗毆等办法，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逮捕起来。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春天刚刚来到，海河早就解冻了，掀着浪浪大浪向下游奔流着。人們有的已經換上了夾衣裏，有的还穿着薄棉袄。

这时上級党指示：“国民党开政协会沒有誠意，他們撕毀政协決議，嘴臉都暴露出来了。太鬧紅了他們該捕人了，咱要合理合法的斗争……”老左他們接受了党的指示，便派了王玉起、沈文光、徐文財、李子华、陈恩玉、李子峰等七个工人代表到五厂工会去联系，研究有关生产的問題，和怎样設法在生产上消灭敌人的借口。

这七个人刚刚到五厂的門，門口的两个衛兵就端着槍問：“你們是哪儿的？”

“四厂的。”

“你們干什么？”

“到工会联系事情！”

“你们不能进去！”

那么打电话联系吧。一打电话五厂的张家枢和王老五等都迎了出来。这时他不得不让进去。可是当办完事出来，门口的卫兵却变成了四个。

一个胖子班长，他问：“你们哪个是代表，你们干什么来啦？”

沈文光说：“我们联系事情。”

这个家伙无中生有的说：“你们联系事情还带刀子？”上来就打沈文光两个嘴巴。后面的三个卫兵端着刺刀就往前上。王老五嚷：“你们吃着我们，喝着我们，还打我们，你们不能打我们的来宾！”他跳上去用手一迎，一个卫兵上来就给他一刺刀，把衣服挑破了一个大口子。这时四厂代表们都把自行车往墙根一推，一齐拥了上来，两厂的工人空着手和卫兵揪在一起搏斗起来了。一个工人两只手夺下两把刺刀，徐文财、陈恩玉在和卫兵撕打的时候，又各自夺到手里一把刺刀。伪军一看没有吓住工人，就搬动机头往上上子弹，这一下工人更火了，甩掉刺刀就夺枪，滚在一起，打成一团。

这时，四厂李子华骑上自行车就回四厂报信去了，五厂的曹鸣平也跑到车间去报信，接着警报器就“呜呜”地响起来了。工人们纷纷从车间跑了出来。连五厂工房的老太太也拿着菜刀赶来指着卫兵骂：“你们凶什么？人家参观来你打人家？你讲理不讲理？”

五厂警报器一个劲的“呜呜”的叫。

四厂工人正在車間里干活，听见五厂求援的号令，就知道出了事。各車間沒用通知，就都自动的停了車跑了出来。党员苏志新讓李希灵，李希慧穿上白衣服，化裝成护士模样，率領工人分成兩路，去支援五厂。他先过河去了解情况，然后再决定行动。

厂方見工人停了工，鄒廣华忙着下令关大門，阻止工人。但是工人们勇敢的冲出了厂門，排成整齐的队伍，一队准备經解放桥（旧名法国桥）过河，一队直奔楊庄子摆渡口。

工人们来到河边一看，摆渡的船却在河中間下了锚。这时准备来四厂报信和迎接四厂工人的五厂工人代表六七十人，也来到了对岸河边上。一边是支援的，一边是来迎接的。西边岸上的工人都喊：“把船摆过来！”可是船还是停在河心不动。这时四厂的工人们急了，乱喊：“你摆不摆呀？”有的工人喊：“不摆，游过去揍他！”摆船的一个大胖子一听工人们要打，就站在船上指着岸上的水上派出所大声地说：“不是我不摆，我这拉家带口的，得听人家当官的！”

楊庄子渡口紧挨着水上派出所，水上警察們听见工人们喧嚷就一个个悠悠蕩蕩地出来了。工人们一齐上前要求下令摆工人过河，警察一看工人有四五百人，就摇摇头说：“你們这不行！这純粹是起哄，五厂鬧事用你們去干嘛？”

四厂工人们正在跟派出所交涉，对岸的五厂工人可等急了，一个叫王小秋的工人，一下就跳到水里往这边游。海河正是春汛时节，浑黄的河水，打着漩涡，翻滚着大浪流的很急。王小秋浮到中间就没有劲了，浪头一会儿把他打下去，一会儿又推了上来。眼看着就要被水冲走，四厂麻场工人刘俊元和另外两个工人“扑通，扑通”接二连三的跳下水去救人。

这一下工人真是怒火千丈，一齐上来质问警察：“你叫摆不叫摆呀？”

“眼看就要淹死人啦！你见死不救……”

“不叫摆砸他！”这时工人们一齐上前来举手就打，吓的警察直喊：“不是我们，是我们的害呀！”边说边跑。这个派出所一共有十来个警察跑的跑，藏的藏，有的鑽进了住户屋里，有的溜进了胡同。工人侯玉亭等拿着砖头就追……。这时王小秋水淋淋的被工人们救上岸来，他一爬上来就狠狠地喊了一声：“打呀！”四厂一个工人看见他被淹的浑身上下直哆嗦，忙着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袄给他披上。回身拾起砖头就去追打警察去了。

摆船的一看工人连“官面”上都敢打，忙着起锚开船。这个时候，五厂的王老五等六七个工人代表也过河来了。大家追警察追到派出所，进院一看警察都跑光了，只有一张小圆桌，上面放着茶壶茶碗，刚倒的茶水还在冒热气呢，工人们愤怒地上去就是一脚，壶碗哐哐啦啦破的破，碎的碎滚了一地。这时屋里的蒋介石象也被扯下来踩

烂了，玻璃窗子也砸了，电话机也被揪下来扔到海河里去了，最后连派出所的砖围墙也被“哗啦”一声推倒了。

工人们从派出所出来，迎面正碰上—个穿着黑色军装，肩头上戴着金线和金花的洋子，后面还跟着一个随从。有人认识他是为水上警察局的刘局員。他威风凛凛地一边走一面还大声地威胁工人：“不行！你们不能过去！我看你们是不想干了！都得把你们这些捣乱分子开除！”这时他刚刚走到一个牆根底下，話还没落音，一个工人窜上去一把揪住他的领子：“你还逞凶！”人们呐喊了一声：“打呀！”砖头，瓦块，拳头，棍子……一齐往他头上身上落。跟来的随从早溜的没有影儿了。这个家伙鼻子口冒血。头上的帽子也被踩扁了，肩膀上的金花也被揪下来了，军装扣子也掉光了，鞋也不知哪里去了，这一回他也不吹胡子瞪眼了，只顧跌倒爬起的向着工人不住的作揖哀求，连连說：“兄弟我說錯了！兄弟我說錯了！我对不住大家……”

直到苏志新从五厂了解情况赶回来，才劝住了大家。

摆渡上满载着四厂工人，向对岸摆去。

“打倒貪官污吏！”

“駐厂军队滚出去！”

工人们喊着口号，浪花拍打着渡船，一片排山倒海的声势，震动了海河兩岸。

这时支援这次斗争的兄弟厂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了。

造纸总厂的载货汽车自动停下来讓工人坐。天津市的植物

油厂、自行车厂、毛织厂、棉纺一厂、棉纺二厂、北洋纱厂、钢厂等许多厂子有坐汽车来的有步行来的，有骑自行车来的，有的是派代表来参加，有的是成群结队扛着大旗来支援。天津市学联的代表也前来慰问。

五厂的大院子里人山人海，口号震天震地。厂门口站满了工人的纠察队。四厂第一摆渡上岸的工人王明铃、郑庆龙等到了五厂门口都自动的和五厂兄弟并肩站在一起。驻厂的伪军灰溜溜的背着枪躲在一边，工人们自由出入，他们只是翻翻眼睛，咽咽唾沫再也不敢多话了。

这时在五厂的厂长室里，四厂的工人代表，正和伪警察局政治科科长李业昌、伪军连长郑学礼讲条件，要求他们立字据。

突然，在厂外的马路上，远远地开来一辆摩托车，车上驾着一挺机枪，后面跟着一辆吉普车。厂门口的工人纠察队不约而同的挡住厂门。当车开到跟前时，摩托车和吉普车“嘎”地一下停住了。从后面的吉普车上下来一个穿绿军装两道金线三花的军官。原来是伪军护路司令部的赵副团长。他一下车就点头哈腰的笑着说：“兄弟我是给你们了事来的……”

工人们指着机枪问：“了事为什么还带机枪？”

“把枪落下来。”

“不，不能进去！”

结果，这挺冲前支的机枪，只好掉过头去，枪口朝后开进了院子。

斗争从下午两点直坚持到六点，天黑了下來，电灯也亮了。伪军赵副团长和李业昌等不得不同意工人的条件：

1. 撤退驻厂军队；
2. 赔偿工人损失；
3. 惩办行凶的士兵；

另外又写了一个字据给工人，换回他们的四把刺刀。这个字据现在还完整的保存在天津历史博物馆里。上面是这样写的：

令收到：

刺刀四把

此 致

第四厂

李业昌印

五月四日

当四厂代表沈文光和五厂代表王老五站在院子里的桌子上，宣布这次斗争胜利结果的时候，伪军的军官们，也垂头丧气的宣布：把行凶的士兵扣押起来。

工人们热烈的鼓掌，喊着口号，互相欢送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走出五厂大门。

在反动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一次天津市规模最大的工人罢工运动，就这样胜利的结束了。它在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十一 一張名片四個人

楊庄子渡口水上派出所被砸了以后，沒有过几天，伪天津市警察局局长就給四厂工会来了一封信，上面写着：

請左振玉来局有要事談

李汉元

从形式上看好象是挺客气的一封信，实际上是一张傳票。

老左一看就知道是因为打局員和砸派出所的事。当天晚上就拿着信去找党組織請示。当时刘元春同志和老左一起研究和分析了一些情况，决定去，但是刘元春同志叮嘱老左：“去是要去，不过去之前一定把厂內事情安排好，防备去了之后發生变故。要注意，根据情况决定斗争方式。”

回来之后，老左就想：水上派出所是工人砸的，局員是工人打的，但是，如果全承認起来，这个罪名可就大啦！敌人一定要當事人，也可能引起逮捕工人一类事情。那么一定得設法把这个責任推了，怎么个推法儿呢？临去

的时候，他又拉上五厂的三个人一块儿去，目的是找外厂的人做旁証，把这件案子責任推卸掉。

当老左他們走进警察局的局长办公室，正局长李汉元不在，副局长毛文伦什么話也沒說，就拿起一張六寸的照片遞給左振亚：“你看！人打成这个样子！你們鬧風潮，打工作人員，得受法律制裁！”这个“軍統”的特务头子一上来就来个下馬威。

老左把照片放在桌子上說：“不是我們工人打的。恐怕他平常不得人心，地痞流氓趁机会打的他。”

“你說那个不行，我們这里有人看見！”

“看見了是誰。”老左問。

毛文伦蛮橫的說：“不論是誰，你得給我找出人來！”

老左不軟不硬說：“人我找不出来，你要是硬要，那我就只得承認是我打的。”

“你承認行嗎？告訴你这件事你們得負責任！”毛文伦暴跳地嚷着。

老左不慌不忙的說：“責任就是工会領導不好，碰上这种事！”

“告訴你，我們知道是誰打的！”

“你們知道姓嘛？叫嘛？”老左一边釘問一边想：莫非他真的知道是誰打的？

老左这一問，这个家伙停了一下，就找出四个人名字交給老左：“給你看！”

老左接过来一看，一个也不認識！就說：“那好吧！”

几千工人我不能个个都認識，你得叫我回去查問一下。”

回厂后，老左到人事科查了一下，厂子里真的根本就没有这四个人。这一回老左可抓住理了。問題很清楚：不是警察局这群无能的特务搞錯了情报，就是毛文佐想詐唬老左，讓他說出真人来。这样，当然打錯了算盘。

于是老左拉上了几个工会委員說：“走！咱們到社会局去！”

当时国民党的社会局是在现在的中心公园附近。他們坐上車到了社会局，找到劳工科长楊乐天，找了个张秘書，又找到社会局局长胡孟华，老左气昂昂地說：“我們工人碰上这种事，你們管不管？”这一群官儿們被老左一質問，都楞住了。老左把名單一摆說：“我們沒打人，偏說是我們打的，給了我們这四个人名，我們工厂根本就没有这几个人！凭着个大警察局随便認賴我們工人，这算什么，你們要是不管，可別說我們工人一生气都到这儿来！”

胡孟华一看这个情况，忙着說：“这没有什么，叫楊科长跟你到警察局去說說就算啦！”

老左說：“那以后再有什么这种事怎么办？你們总說我們工人好鬧事，这个事也怨我們工人鬧，咱这回得把話說清楚！”老左他們拉上这几个人一塊儿，又到国民党市党部找到苑宝璜說：“咱天津市这么大的警察局，随随便便找我們工人的岔儿，誣賴我們，不承認还不行。这种事市党部管不管哪？”

于是又拉上苑宝璜一起坐汽車到了警察局。

毛文佐一听说四厂没有这几个人，又来了这么一伙子人看着他，也觉得舌头短了。但是他还是充作挺有理的样子，重复他那句话：“你们得承认打了人不能白打！”

老左接过来说：“不是我们打的，我们怎么承认？”

毛文佐强词夺理地说：“你们不闹风潮，他也不能挨打！”

苑宝璜出来给毛文佐找台阶下：“这个事就别争了，想个办法解决算啦！”于是他把毛文佐叫到屋里去了一会儿，出来后苑宝璜就对老左等几个工人说：“这个事怎么也得解决呀！我看这么办吧，打的这个人医药费你们花吧！”

老左和几个工会委员递了个眼神，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事不能太随便了。这些家伙是什么勾当都干得出来的。于是老左说：“你们要是没有法儿出这笔钱，叫我们出也行；反正人不是我们打的。”

毛文佐这个时候也有些象泄了气的皮球——劲儿不是那么大了。可是他还是板着脸对老左他们说：“法律上有这么一条，打了官员总要受法律制裁。找不出人来，这个案子总悬着不能归档，这往上边也交待不了……”

“那你叫我们工人怎么办？”

毛文佐说：“你们找出两个人承认起这个事来，拘留几个钟头，也没有他的罪，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

老左一听，要真的这么样解决了倒也好。可是又一想：真的找出人来具结划押，他到时候“反口”怎么办？老左说：“人家没打，硬找人家认罪，你叫我怎么跟人家——

去說，你要是叫我承認起來我就承認得啦！”老左回頭對幾個工會委員說：“你們看這樣好不好？你們先回去！”

這群官兒們都不約而同的說：“那可不行！”為什麼他們反映的這麼快啊？這裡有個原因：你想工會委員們回廠和工人一說：警察局無故的拘留工會的理事長，工人們知道了，還不得砸到警察局來。

這個時候楊樂天和苑寶璜說：“你們去找人吧，承認起來就算完了。我們作保證。”

老左說：“這個事我們得回去跟工人們商量商量，我們幾個人作不了主。”

這群官兒們滿口答應：“好，好！”

回到工廠以後，老左和蘇志新等幾個同志一商量，決定利用一下苑寶璜、楊樂天這些人，把砸水上派出所這件事結束了。

“給他們抹抹嘴頭好辦事！”老左自己湊了幾個錢在登瀛樓南號請苑寶璜、楊樂天，還有水上分局局長和社會局的張秘書吃飯。當時工會怕老左出事，有蘇志新，工人王玉起等三四個人也跟去了，他們躲在外面等着老左和這些人交涉。

吃飯的時候，老左說：“叫我們找兩個工人也行，可是到時候他們警察局反口怎麼辦，他們要是那樣，叫我对工人怎么交待。”

這一桌子被請的人都說：“不能！我們保證！”

楊樂天拿出了他的一張名片遞給老左：“你把我這片、

子拿去。哪个工人到警察局去了案，把这个带上，他们一看就知道啦。”

吃完了，老左拿着名片和苏志新、王玉起等回厂把情况对工人们一說，工人们都自报奋勇地说：“叫我去吧！叫我去吧！”最后决定让王洪德和王延海去。

第二天，老左、王玉起、沈文光等和去了案的工人满满当当坐了一马车。车从南市过去，到东浮桥菜市旁边的红砖太校门口停下，工人们从车上跳下来。这里就是天津市警察局。

王洪德他们拿着名片进去之后，老左和一些工人就把车赶到警察局门前，海河邊上的树蔭涼底下。他们是防备进去的人万一发生变故，好立刻回厂报信。等了不到两个小时，王洪德他们真的被放了出来。

他们又重新坐上马车，鞭子一扬，大黑马就小跑起来，工人们坐在马车上又说又笑。别看国民党那些牌头上挂金花的，出门坐汽车的家伙们，凶起来象龇牙狗，见了吃的象饿狼一样，可是归根到底他们也没有斗过咱们工人。

二十一 鄒慶華收買打手

工人的斗争，象風推潮水一样，一浪比一浪高。这使得厂方想坐在那里稳稳当当的剝削工人，統治工人，越来越不是那么順利。他們当然不甘心这样的处境。所以，代行厂长职务的总工程师鄒慶華越来越显得忙迫了。他和伪市总工会的大特务头子傅秀山，駐厂军队的連长郑学礼勾結起来，密謀推翻党所领导的四厂进步工会。

在工会委員中有一个叫欧阳朝的，他和傅秀山都是老华新棉紡厂的国民党员，青帮师兄弟。他們都是河北小于庄人。这个人尖尖的白臉，鼓眼珠子，大高个儿，能說会道的。他抽过大烟，滿嘴黑牙根。他在和日本大耍恤劳金的斗争中裝的挺积极，所以混进了工会，并且当了联络委員。

一九四五年冬天，天津市要选市总工会。几个特务头子就开始到处拉攏和扩充自己的势力。工职派的头子伪总工会理事长傅秀山和工联派的头子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員苑宝璜明爭暗斗，你想法倒我，我也想法倒你。在这时

候，傅秀山就想抓四厂这部份势力，于是派了特务王清田，苏砚田想打入四厂的工会。可是，他们来了左振玉根本沒有接待，并且告訴他們：“我們这工会是工人选举出来的，不經過选举不合乎工会条例。”这样来了兩次，兩次都被頂的灰溜溜的回去了。

傅秀山沒有抓住四厂这部份势力，当然不甘心。恰好，碰上了欧阳朝，坏蛋見坏蛋，一下就挂上勾了。欧阳朝从这开始，就完全成了在工会内部的奸細。他在鄒廣华和傅秀山之間跑腿通風报信。并且又帮着傅秀山拉了一批厂子里的工头恶棍，象修理厂的刘金山，棧务科的邵金荣和失业的流氓工人薛国良。这一伙子人天天泡在一起大吃大喝。河北大街的川魯飯庄，劝业場附近的便宜坊，登瀛楼、惠中飯店……都吃了个遍。

厂长刘××和鄒廣华为了达到推翻进步工会的目的，不仅参加阴谋計划，还情願出錢当老板。

鄒廣华解放后被判了刑，在他的笔供上是这样写的：“傅秀山、薛国良、刘金山等到我家去，同我研究推翻四厂工会。由傅秀山提出把当时左振玉领导的工会推倒。并提出三个办法：

1. 利用厂外失业工人，跟当时左振玉的工会打架。

2. 讓刘金山联合厂里的人，反对左振玉的工会。

3. 联合駐厂軍隊，逮捕当时的工会人員。

当时我同意这样做。这三个办法同时并进，我負責和厂长刘××报告研究推翻工会的計划，叫刘××支持他們。刘

××對我說：‘給失業工人一部分錢，讓他們去搞吧！’
我当时指示刘金山：‘你們用錢，把单据交給我，厂方給
开支算啦！’”

事实上，他也正是这样办的。当时傅秀山經常提个大皮包到厂子里来。欧阳朝就在厂子里，到处散布：“左振玉可能是共产党嫌疑。”“他有个戒指，上面刻着镰刀斧头。”“跟左振玉早晚得倒霉……”“左振玉恐怕是八路，跟他走沒好处！”于是工会委員中的动摇份子或胆小怕事的，象王廷海、袁秀、温錫銘、李樹桐都一个个被拉了过去，有的吓的不敢动了，有的給他們干起事来，叛变了进步工会。他們一方面分化工会，一方面收买打手。郝廣华就忙着叫薛国良到楊庄子招人。为什么偏到楊庄子招人呢？这里有个緣故。楊庄子为爭脚行出了名。原来有个脚行在楊庄子东头，但是因为西头人厉害，所以夺了脚行。从这，一提起楊庄子西头的人，就都知道那里耍胳膊根的人多，惹不起。

薛国良到楊庄子宣揚四厂招人，厂方沒有任何条件，是失业的就能上工。这时候前后不几天，就在楊庄子招了白宝华、靳成德、林宝琪、张金貴、张金榜等四十多人。薛国良就对流氓白宝华說：“明天先去两个上班，厂长同意啦。”

第二天，白宝华就进厂了。他到浆紗車間一干活，工人發現了就报告了工会。因为当时厂方不讓本厂失业工人上班，經過工会斗争交涉才勉强同意讓日本时被开除的石

小三，左华章两个残废工人上了班。厂方当然不替工人着想，而是想收买工贼走狗或者是弄些掏门子挖窗户进来的人。所以工会提出来：“上人要工会监考，谁能干谁干。”

白宝华怎么进厂来的，谁也不知道。当时工会就有人找到他问，白宝华挺气粗的说：“厂子招我来上班的！”

“你是四厂过去的失业工人吗？”

回答说：“不是。”

这样情况，工会当然不能叫他上班。王三跟他说明理由，白宝华就气昂昂的出了厂子。

他找到薛国良就问：“为什么我干了半天，工会不叫干？”

薛国良就趁机说：“这都是工会的事，厂方是同意你们上班。要不叫你去干嘛？”

白宝华听了这个就到处对这一伙子所谓失业工人说：“现在四厂工会干涉，咱一个人也上不去。我干了半天就被赶出来了！”

这一伙子人少数是失业工人，更多的是流氓，一听说这个就伸胳膊挽袖子闹起来了。

这个结果，正是郑展华的阴谋。他明知道违犯工会提出的条件，工会准不愿意，所以他故意通过薛国良招了这么一伙子人，而且是一伙子打架耍流氓不眨眼的人，利用这些人来跟工会闹。

薛国良领着这一伙子找到工会，要求上工。并且一口一个“你们是工会，为啥不管失业工人？”

当时老左他们几个地下党员一研究，就明白了这是厂方的阴谋。于是老左就提议分化他们。经过工会研究，让一部份真正的失业工人上了班，打手流氓没有叫上。薛国良是四厂失业工人，但是厂方用钱收买了他，让他当招牌，煽动工人对工会不满。所以虽然工会几次叫薛国良上班，他都是挑肥拣瘦的不干。

一天，他又闹到工会，并且说：“给我头我也不干！”

老左问：“为什么。你想呆着拿钱那不行。四厂真正的失业工人多着呢！你不愿意，你就别来这个厂！”

“我是四厂失业工人，你为啥叫我离厂？”

薛国良站在工会门口大喊大叫。老左急了，抓住就给了他一个耳光，王玉起等几个工人也早就火了，在后面你一拳我一脚的揍了他一顿把他赶出了厂子。

薛国良被收买就是为了干这个来，他当然不在乎这些。他找到了白宝华、靳成德、林宝琪说：“现在鄧厂长叫你们去两个代表到他家，合计上班问题。”于是白宝华和靳成德就跟薛国良到住在城里的鄧廣华家去了。

回来后，薛国良就对林宝琪他们三个人说：“厂长和咱见了面，现在厂长已经说啦，天罗地网已经安排好啦，尤其是鄧厂长和法院院长住一个院，都是南方人，有什么事也好办。……你们要想上班，就有一个办法，找左振玉打架。打伤了他也好，咱受伤也好，必须把左振玉弄到法院押起来。”

白宝华接着說：“我上班被赶出来，这口气还没出呢，我甘愿背伤……”实际上，这是在鄒廣华家里早就商量好了。因为鄒廣华早就通过薛国良許了白宝华他們許多条件：“你顶着跟他鬧事，干不了活家由厂方管着，法院有傅秀山办，厂子里有刘金山顶着。只要推翻左振玉的工会，你們就都可以进厂。”

在推翻进步工会以后，鄒廣华果然照着他說的那么办了。这些流氓打手在推倒进步工会以后，都涌进了厂子。就是所謂的“三鬼”、“五魔”、“一棒錘”，他們什么活也不干，每天提着个棒子在車間轉游，監視和打罵工人。他們不仅是白拿錢不干活，鄒廣华还另外給他們甜头，不断的請他們吃喝。他們在外边飯館吃飯可以报賬，甚至他們不回家吃飯的时候，鄒廣华都派人送飯給他們吃。这些当然都是后話。

二十二 流氓拙定“苦肉計”

一天早晨，太陽剛剛出來，霧氣還沒有散盡。馬路上輕易看不見一個行人。在工廠對過的“沈記”豆腐房的后屋裏藏着十幾個手里拿着家伙的彪形大漢，在外面的房左房右，有人在來回張望踴躍。

下了夜班，老左和一個工人一道往土城家里走。他們剛剛走到豆腐房拐角的地方，突然閃出來四個人，一個大個子衝上來把老左抱住，這個人背後又上來一個大高個子的人，拿出一個剝皮子用的刀子，照着抱住老左這個人的后腦勺就是兩刀，刺完了轉身就跑。血順着被刺人的腦袋往下流，衣服全沾滿了血。這個人拚命的抓住老左的衣裳，大聲的叫嚷：“救命啊！有人殺了人啦！”

“有人行凶啦，救命啦！”

跟老左一塊兒走的工人，一看不好，轉身就往廠子里跑去報信。

這時，早就安排好了的土城派出所，一下子出來一群警察，他們端着槍不由分說，就把老左帶走了。

象演戏一样，老左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工厂的气笛“嗚——嗚——”的叫了起来。工人们听说工会的理事长出了事，纷纷关车跑了出来。厂子门口忙着关大铁门，工人却一齐上来往外拥，把大铁门都挤的扭歪了，人黑压压的向土城派出所赶来。

土城派出所离工厂只有五个电线杆子那么远，高高的台阶上面一所灰砖房，被工人包围的水泄不通。工人们高喊着：“把我们的代表放出来！”

“把流氓捆起来！”

“把自己刺破头的押起来！”

“不放不行……不放我们就不走。”

这时警察一看来了这么多工人，也不敢动老左了。不大一会儿，厂长刘××也来了。他眼看着厂子里乱了事，怕工潮再闹起来，又看见一个个工人愤怒的样子，就假仁假义地对警察说：“有什么事找我，我办。把我们工会老左放出来，先叫他回厂……。”

警察们听厂长刘××这样说，就松开了老左。刘××接着就对工人说：“完啦！完啦！没事啦！咱都回去上工。”

刘××给派出所解了围，暂时把工人的情绪缓和了一下。老左和工人们一道回了工厂。

作案的人是谁呢？这件事一过就都知道了。拿刀子刺人的是打手林宝琪，被刺的是流氓白宝华。他们砸碎过工会办公室的玻璃，又在大道上，工厂门口，左搬玉家的

房左房右，等了左振玉好几天。这是厂方怕逮捕老左，工人鬧工潮，才和这些流氓同定的一条“苦肉計”。

事情过了一个多月，法院来了傳票，傳老左去过堂。

老左一进法院的候审室，一眼就看見了白宝华坐在那里。他看見老左忙着把臉扭到一边去。老左走到他跟前說：“白宝华，你住挂甲寺，我住土城，咱們平日沒冤沒仇，你为什么耍这样干？”

白宝华低头不說話。

“我左振玉搞工会是給咱工人办事，你沒見也总有耳聞吧？拿咱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圖这两个錢，就卖命污害人，咱这穷人的命也太不值錢啦！你想沒想，你要是死了，厂子里能管你家一辈子不能？你家有老少，我也有妻儿老小。你死了就算賺了錢，你陷害我，我死了你忍心，你不覺得亏心？”

“以后你要上班这好办，咱通过正当手續。工会是替大家办事的，不是我左振玉一个人的事。……你背了伤有人給你錢治嗎？沒有我給你几个錢，你家生活有困难你可以找我……”

老左一提到錢，正刺到他的心里。原来鄒廣华答应他背伤后，家里用錢厂里給。可是后来厂子里給的錢不多，自己倒落的什么也干不了了。薛国良也不朝他的面了。这个流氓大概覺得自己这样玩命太不上算，掉着眼泪說：

“我对不起你老，这怎么办呢？”

老左說：“上堂你就說不打官司了，咱們在下边自己

了。”

白宝华答应着：“那也行！”

因为白宝华也听说过老左这个人，谁有事求着他，他是说一不二的。

这时候，法官叫上堂。堂上有法官，法警，记录员。

法官问：“左振玉，你砍的白宝华。”

老左说：“不是砍的，是他们自己刺的。我们早先根本不认识。”

法官把脸一沉：“还有自己往自己头上刺口子的。”

老左比划着说：“你看看他的伤，破的口子有二寸长。您想想，人脑袋是圆的，要是用刀砍了这么长的口子，那该多深了，……要是砍的那他早就活不了啦！”

“你说那不对！人家告的你是砍的么，你杀人不承认哪？”

老左说：“你看看伤……”

法官挺神气地喊了一声：“叫检验吏来，当堂验！”

不大一会儿，检验吏来了。他用尺在白宝华的脑袋上量了量伤口，左右相看了半天，又用手摸摸，最后又拿放大镜闭着一只眼，咧着嘴看了半天，对法官弯弯腰说：“是砍的！”

老左当然知道，他们早就被买通了。他也不再解释，只是严正的說：“绝对不是砍的！”

法官一拍桌子：“怎么你还不承认！”转过脸去问白宝华：“你说，是他砍的不是？”

白宝华唔唔嘖嘖地說：“是……我也不想打官司啦，我們願意下堂去了。”

法官一听就急了：“白宝华，你这样說……你明几个死了誰管？”

白宝华自己也知道根本死不了。可是法官还一劲拍桌子說：“你死了法院可不管！你告了状你又反复，你以后出了事可別找法院……”

老左說：“法官，我是领导工会的。关于他的事不是我們私人有仇，是牽涉到工会。……你對我們打官司这样热心，将来事情鬧大了，工潮起来，你們法院可別說工人願意鬧事。”他回头对白宝华說：“咱有事下堂去再說。”

白宝华答应了一声。

法官气呼呼地坐在堂上，他也知道四厂的工人不是好惹的。老半天才嚷了一句：“好，那么你們具結。白宝华，你以后死了可不許再找法院。”

记录捧过来录供紙，两个人都划了个十字。

下堂来，老左对白宝华說：“你这血衣服回家就脫了吧！我給你送点布去先做件衣服。”

白宝华赶忙說：“那敢情好！”

事后，老左亲自到他家去看他兩次，給他送了兩匹布、还有十元錢。

厂方这次阴谋失敗了。

但是，流氓白宝华并没有被老左感动，改邪归正。养好伤后，厂方又收买他，他又成了推翻进步工会的主力。

在黃色工會成立以後，他又成了廠子裏有名的打手，一天出出進進什麼活也不干。上班來在車間提個棒子，揹着女工的胳膊逼着和他在車間裏溜，隨使用紗管敲女工的腿，說臊話調戲女工。見工人們在一起說話，就湊過去瞪着眼睛問：“你們說什麼？”誰敢反對，他就拿棒子打你一頓。然後就去報告說你有“八路”嫌疑。

解放後，在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軍一鎮字第三九六一號判決書上關於他在四廠一段的罪惡活動是這樣寫的：“被告白寶華，又名白風春……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在中統四廠協助匪特，勾結地痞流氓，陰謀推翻進步工會。并伙同匪首打群架，調查進步工人，積極鎮壓工潮及“六二”運動。帶領爪牙，手執木棍，匕首凶器監視工人。一九四八年被告與中統特務蘇鏡田，傅秀山等匪特結盟大肆進行反革命活動。解放後不知悔改，在管制中不老实悔罪，造謠煽惑羣眾。

上述罪行均經被告供認不諱，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七條三款第十條三款之規定，處有期徒刑十年。以資改造，此判。”

二十三 五月五日端午节

日本投降后的第一个端午节前夕，由四厂工会發起，联合二厂、三厂、五厂、六厂、七厂的工会向紡管局要求發給工人半袋面。理由是讓工人过好胜利后的第一个节日。这个要求，很快的就被答应了。

敌人所以答应得这样痛快，正是預告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非常不利的局面就要出现了；这一点，当时四厂的地下党组织是非常明白的。因为土級党已經通知了左振玉、宋文鼎等同志，敌人就要进行大逮捕，鎮压工人运动。为了保存党的力量，組織上决定讓四厂地下党的同志们，暂时撤退到解放区去。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懂得，只要一天不离开，就要为工人的利益斗争一天。

过节的前一天下午，工人们都在欢乐的扛着白面往家走的时候，老左对沈文光等工人同志說：“哥几个过节哪儿也别去，都到我家去坐坐！”

第二天晚上，因为过节放假，大家都愉快地聚集到老左家里吃捞面。这时老左一边吃着一边对大家說：“咱們

工会以后活动要小心了，厂方跟军队、警察局、特务、打手已经勾结起来，准备对付咱们工人。咱手无寸铁，光凭着硬干不行。”

又說：“以后工作得抓住骨干，活动要隐蔽些！”

“上班下班，要特别注意。现在厂里变化很大，特别是修理场的刘金山和棧务科的邵金荣这些人……。”

“万一有什么变化，得走就走，得跑就跑……。”

工人们一听都非常难过：“老左，怎么你今天尽說这样話？”

老左也很留恋大家，他接着嘱咐：“要记住，只有这工会是咱们自己的，别人组织的工会，咱工人不能叫它存在！”老左暗示大家：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就不可能给工人谋福利。那么，就要和它斗争。

.....

就在这同一个时间里，在巴黎飯店，特务打手們也在聚会。特务头子傅秀山在布置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张贴标语的是王子林領头；頂着打架的是刘釜山、邵金声、邵金荣、楊有德、楊丙海、张金貴、张金榜、靳成德、林宝琪、白宝华、孙景才等人。并且分配好誰管紗場，誰管布場，誰去麻場……。

傅秀山給这些人打气說：“你們干吧！厂方支持，郑連长支持，厂外有我。出了事与你們毫不相干。”

这个阴谋的策划已经很久了。傅秀山把这些人抓到手后，就在土城和这批流氓地痞拜了盟兄弟。之后，这些

人几乎每天都到惠中飯店廿六号去找傅秀山。他們吃遍了天津市有名的飯館，叫女人陪着玩乐。这笔开支都是由鄒廣华蓋章厂里給报銷。

端午节的早晨，这群家伙由外号叫“糖瓜”的人事科长領着，悄悄的溜进了工厂。

老左吃完早飯，准备进厂去找党员苏志新。他一走进厂門口，一眼就看出形势变了，到处都是提着棒子，戴黄色袖箍的生人，一个个横眉竖眼的来回踹。駐厂軍隊摆开陣势，端着槍站在工厂門口。

这时，郑連长叫人把老左找到他的办公室里，对老左威胁地說：“左振玉，我接到团部命令，叫我逮捕你。我看咱沒冤沒仇，各自方便好啦！”老左一看这形势，想跟工人取得联系已經不可能。于是冷冷地說：“好吧！”轉身就走了出来。他走到門口，对着两个平日接近工会的守衛說：“馬志广，张明武，你們俩把槍上好子弹跟我走，見有人貼近我，你們就开槍。”

这两个警衛真的跟在老左后面走了出来，恰象两个衛兵跟在老左的身后。

老左到第一宿舍家里推了一輛自行車出来，看看四下沒人，才摆摆手說：“你們俩回去吧！”在路上碰見了苏志新，他們互相交換了一下情况，随后老左就騎上車子直奔灰堆，由灰堆过了海河。后来他和党员苏志新同志一起轉移到解放区去了。

敌人所以不逮老左，是怕鬧起工潮，所以采取了这个

办法。老左走了以后，郑连长就在厂内楼上楼下，各个車間，虚张声势地乱打电话：“啊，左振玉没有逮着，跑啦！”

“左振玉是共产党！他没进厂就跑啦！”

“老左一看事不好就溜得没影儿啦！”

“逮住左振玉了吗？”

“没有，跑啦！”

电话铃嘩啦啦乱响。車間的工人听的清清楚楚。有的工人就从車間里往外冲，可是有的門被鎖住了，有的門早被打手們把住。

这时，沈文光和另外一个工人分头在大門口和布場整理車間被軍隊逮捕了。另外一个工会干部正在各車間巡視，看小組有什么情况，他刚一进布場，也就被逮捕了。

他們拳打脚踢地把沈文光等三个人上了綁，押上了汽車。

当天晚上被送到河北护路司令部。押了三天后，又解到天津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棉紡五厂的地下党员张家枢等同志也被捕了。这是天津市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互相勾結起来，破坏工人运动的一次規模相当巨大的罪恶活动。

四厂，从一九四六年阴历五月五日这一天起，天空也象被团团烏云盖住了；院子里，車間里，到处都晃动着棍棒的打手，瞪着贼溜溜的眼睛监觀着工人。

黄色工会成立了。邵金荣当了伪工会的头子。他們上

台头一件事，就是向工人开刀，进一步迫害进步力量。凡是在进步工会时期表现积极的，或是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律开除。包括李希灵、李惠、王玉文等，以及左振玉的弟弟左振起，苏志新的弟弟苏志忠，苏志新的姐夫杨忠国等等，也被开除了。不到两个月，先后共开除了六十多工人。

二十四 斗争并没有停止

四厂的进步工会被摧毁了，但是四厂的工人斗争并没有停止。

女工王玉文是进步工会时期的积极分子，工会小组长。鄒廣华逼着她自己提出“告退”离厂。王玉文不同意。这时，打手們就在伪工会私立公堂审問她。

阴历六月二十八日，王玉文正在和女工李素文一块儿吃饭，打手楊怀三来了，他一进紗場飯厅就罵：“王玉文，他媽的！叫你，你为什么不去？”

“我自己的休息時間，我願意不去就不去！”王玉文說。

“走！”楊怀三逼着她来到工厂大門口旁边的伪工会办公室。

这时伪工会的一群打手刘金山、靳成德、刘桂林、林宝琪都光着脊梁，赤着大脚板，扭着腿在桌子上坐了一排。

这一群打手一見王玉文进来，就不干不淨的罵起来：

“叫你，你不来，好大架子！”

“你他媽的凭什么說不來？”

“你三爺叫你你都不動……”

王玉文氣的一跺腳：“我看你們是三孫子，走狗，……”

楊懷三在後面上去就打王玉文一個嘴巴，一下就把這個小姑娘打倒了。這幫打手就嘿嘿的樂起來。她爬起來隨手就拿起一個茶碗，照着這些打手扔過去，他們一躲沒打着，茶碗打在窗子上把玻璃打得粉碎。王玉文一看沒打着，又拿起一個茶碗扔了過去。這時打手們嚷着：“好，你敢砸工會！”這一群打手象惡狗一樣撲了上來，劉桂林揪住王玉文吼叫着：“你這麼厲害，一定是‘八路’，你說，左振玉跑哪兒去啦？”

王玉文說：“你說我是‘八路’，我就是‘八路’。”

“嗨！看不透一個小黃毛丫頭這麼厲害！”

“誰叫你們請我來呀？”

劉金山罵着：“把汽車開來，送她警備司令部！”

“不送，你們都不是人！”王玉文說着昂頭就往外走。

這時鄒慶華來了，假充善人地說：“別，把汽車開回來！”於是他把王玉文領到大樓里去，又叫鄭連長審問。這樣關在廠里不給吃不給喝，折磨了三天三夜。

七月一日廠方宣布，把王玉文趕出工廠，打手們馬上就到第一宿舍，把王玉文的家從工房裏趕出來。那一天正下大雨，被子、衣服、鍋、碗、瓢、盆……都被扔到大街上。逼的王玉文母親給這些打手磕了頭，他們把老太太推倒在地上，把工房的門鎖上轉身就走了。

这只是被开除的许多人中的一个例子。工人们被厂方和伪工会欺压的无路可走了，于是，这些被开除的工人，找出被捕放出来的王玉起，和被开除的工人陈恩玉、王贵发、王大福等三十多个代表，联合厂内的三百多工人开始告状：告厂方和伪工会。

在那个时候打官司告状，第一得有錢，第二得有人。一群失业工人，哪里来的錢哪？于是大家就卖衣服当被子，你十万（伪幣）我八万的往一起凑。有了錢那里去找人哪？一群穷工人，那能巴結得上有錢有勢的人！于是姓张的托姓李的，姓李的托姓赵的，好不容易轉弯抹角找到一个姓楊的連长。

楊連长住在佛照楼旅館二楼。工人们买了些礼物去賄他。这家伙一見錢就滿口答应：“好吧！咱过几天逮捕他們。不过，咱得花錢請客，讓刘法官把新工会这帮工賊逮起来，把老工会支持起来！”

工人们一听都很高兴。就把大把的票子交給他托他去办。楊連长拿到錢后对工人說：“請客的时候你們不能露面……”意思就是工人不能跟着他。于是工人们只有远远地等着他。这个家伙每天領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到“致美斋”吃飯。

过了五、六天，工人找到他問：“究竟这人多会儿能抓呀？”

他搔了搔后脑勺說：“……我看軍法处刘法官也管不了。咱找王鑫培吧。他在日本时候做过大官，現在是塘沽的

保安司令，和国民党数一数二的人物唐二虎、上官云相是磕头弟兄……”工人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物：“唉，不论是谁吧，只要能帮着把工贼逮起来就行！”

接着又是天天请客，过了一个多月，他又对工人说：“老头不肯出力气，你们认他干爹，他就给办啦！……不过得一个人拿三十万元香底几钱！”

工人们大伙一商量到了这个份上，只好“认吧！”

又花钱买了很多礼物，到中原公司后身王鑫培家里去，给他磕头认干爹。

这个人青帮大头子，有五十多岁。穿的西服革履挺阔气。见面就说：“没有什么，有欺侮咱爷们的不行！你们这个事，我一定给办。”

工人们又花钱请他吃喝。

这个时候工人们几乎天天挨饿了：他们天天托人请客，从劝业场到南市，从南市再到土城，几十里地都是地下走，连几分钱的车钱都花不起！厂内纱厂皮辊室王玉田等许多工人不断的捐钱送给他们。做包饭的工人吴占海，偷偷的留些饭，用篮子装着送给他们吃。甚至连外厂的人——过去给四厂建厂时包过工程的冯荣祥，也卖了戒指把钱送给他们说：“你们告，成功了再给我！不给我也没关系！”

又过了许多天，这个青帮头子看看这群人的油水快吸干了，就顺手轻轻一推说：“我给你们又烦个人，是报社编辑叫张云龙……。”

工人們又請姓張的吃喝。

姓張的有一天領着這三十多個工人代表去見憲兵隊的一個團長。這個團長見面就大模大樣的說：“我們不能支持失業工人，你們沒有權利告廠方和工會。要告狀得在業的告，你們告無效！”

廠內工人王玉田知道這個情況後，就和失業工人一塊兒，用紅格紙起草了一個告廠方和偽工會的呈文。由王玉田偷偷帶到廠里去，發動工人蓋章告狀。參加蓋章的有三四百工人。呈文上蓋的滿滿的都是工人的戳子。工人們把這個呈文交給了這個憲兵團長。

大家都以為有這麼大的官出頭來管這件事，這一回准行了。於是都高高兴兴的準備恢復老工會；工人張榮友買了一丈二尺白布，大家聚到旅館里，把這些布撕了三四百個胳膊襖，上面用毛筆寫上“老工會”，下面寫上第×號。又買些紙做了不少旗子、標語。上邊寫着：

“打倒欺壓在工人頭上的新工會！”

“反對廠方收買打手壓迫工人！”

“地痞流氓滾蛋！”

.....

通過工人王玉田把這些東西送到廠里去，分給工人保管。女工陸綺珍把這些東西偷偷地放在車間的皮圈兒筒里，上面用皮圈兒埋起來。並且湊錢買了一盒別針預備着。廠內工人們日夜懷念着老工會，知道了這件事是多麼高興啊！

工人們都兴奋的互相傳遞着好消息，悄悄地組織起來，準備着——有人來抓偽工會的人，廠內工人馬上行動起來；貼上標語，戴上胳膊箍。在廠外的失業工人馬上進廠，大家重新建立自己的進步工會。

沒想到這個團長和法官坐汽車到四廠來了之後，廠長和鄒廣華在南廠職員飯廳請他們吃了一頓。這兩個官臨來時提的皮包還“扁扁”的呢，回去就成了“鼓鼓”的了！廠子裏花了多少錢給這些人，工人當然不知道。只知道這個團長和法官回去就對工人說：“……你們這個事我們不能管，你們純粹是和廠方搗亂！要告，你們到警備司令部去告！”隨後把呈文還給工人。

工人們又白白的花了一大堆錢。

一定要告！非斗倒偽工會不可！工人們把呈文遞到警備司令部。稽查南處所長呂繼望說：“你們听信吧！我們就抓去！”於是坐上汽車，拿着呈文又來到四廠。這群失業工人又一次徒步跟到四廠，在門外听候消息。

呂繼望一到四廠，就把呈文交給了鄒廣華。也就是說把原告的呈文交給了被告。這時廠方和警備司令部就在廠子裏審問起工人來了，他們按照呈文上蓋章的名字，把工人叫來一個一個的審問，迫着工人寫“悔過書”。

同時，把第一個蓋章的王玉田逮捕到警備司令部。

工人們的鬥志，象燃燒着的烈火一樣，越來越熾烈。他們派代表到北京告到北平行轅檢查團。在反動的國民黨統治時期是“天下老鴉一般黑”，檢查團的人來了一趟四

厂，也是吃的滿嘴流油，腰包塞的，“鼓鼓”的回去了。
最后一次却糊里糊塗地把状告到大特务头子的手里了！

工人們連續跑了半年多，几乎穷的連孩子都卖了！結果不仅沒有抓起一个坏蛋，反倒把自己的人給逮了进去。这口怒气沒有出，工人們不甘心。結果又找到一个叫李健助的人。这个人家住南市。瘦瘦的，戴个紅光眼鏡，穿西裝，經常挎着个文明棍，身后跟着个便衣。他出入警备司令部，总是有一群官儿弯腰敬礼地送出来。

当时工人們可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看着他挺“牛气”，他收到工人的礼物后就說：“不要紧，厂方那样办，我叫他負責任；我取消他的工会……”随后叫工人給他雇輛小汽車就到四厂来了。

也和其他那些来四厂的人一样，回去后就对工人变臉了：“你們別再開了，再開把你們也攔起来！左振玉是共产党，是我搞走的。你們再搞乱可危险……”

“那么……二爷，你老是哪一部份，你怎么知道左振玉是共产党？”一个工人問。

“我是‘軍統’負責人，傅秀山是我手下的人。”

到了这一步，工人們全認清了，告状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

被逮走的工人王玉田，在獄中关了三个多月。因为他的口供总是“老左的工会好，替工人办事……”

“左振玉是好人！”

“我們支持的是失业工人，不是搗乱份子……”。

所以，他受尽了各种酷刑，混身上下被折磨的皮开肉烂；放出来后没过多少日子就死了；

今天，老工人回忆起这一段事来，都感慨地说：“工人阶级没有了共产党的领导，真象没眼的家雀一样——乱撞头！今天讲起来都是笑话；在国民党政府告国民党的人，这不是象自己往火坑跳一样！”

是的！我们记录下我们工人的这一段真实的经历，就是要工人们知道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记住这个历史上残酷的教训，血的教训！

二十五 和黄色工会搏斗

这个事情是因为厂方在山西招工引起的。

厂方眼看着被开除的工人没有饭吃，不准复工，却另外派魏麻子到山西招来一批工人。目的非常明显：山西人背井离乡，到天津来只有依靠他们，那时厂方就可以更随便统治工人了。

山西工人跟着魏麻子来了，住在第一宿舍，工人们一个传十，十个传百都知道了。车间里的工人不由得就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地讨论起这件事来：

“怪！咱厂这么多失业工人不叫上班，跑那么远去招人！”

“他们这是没安好心！远道来的人好听他们使唤！”

“他们准是骗人家来的！”

“不行，咱得罢工……要求厂方把人送回去！”

“要上就得上咱厂的失业工人……”

工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各车间的工人自动地碰了头，选出韩树和、周华亭、吴通义，女工何家庆等十多

个同志为代表，准备向厂方提出交涉。

这时有人偷偷地看见，魏麻子领着一队山西工人进厂来了。这些人刚刚进细纱车间，一声笛响，车一下全关了。男女工人都从车间跑了出来，坐在仓库前面的大道上。

魏麻子一看工人关车罢工了，就领着山西工人退了出来。

鄒廣华知道了这件事，就派人把领导这次斗争的青年工人韩树和弟兄叫到厂长室。韩树和弟兄一进门，鄒廣华就笑着说：“来了好啊！”并且亲自端过一碗水来让他们坐下。对他们有软有硬地说：“你们哥儿们在厂里年头也不少啦，也是老工人。你们最好别跟着出这个风头，闹，对你们来说可没有好处！”并且指着韩树和对韩树和的哥哥说：“他年青……你回去劝劝他！”

反正是说来说去，就是不让他领头罢工。韩树和愈听愈火，站起来就说：“我们工人一致要求把人家送回去，你们看着办吧！”说着转身就出来了。

第二天，形势变了。前面走的是伪工会的一群打手，山西工人排着队跟在后面。但是，他们刚刚走进车间，工人们谁也没说话，忽地一下车又全关了。工人们又都跑了出来。

第三次，鄒廣华对伪工会的人们说：“人一定要上，打架也得上。你们打死工人我负责任！他们把你们打坏了，厂方给你们养家……”伪工会的打手们，准备了許多

斧把，鉄叉子，釘了釘子的木棍……。在沒有領人上車間之前，先把厂子門口的大門關上了。駐厂軍隊在工厂二道門兩邊架上兩挺機槍。

工人一看厂方是想動硬的了，都拿着毛棍、棒子、刀子……喊着：“走，往前冲！”

細紗車間和麻場的男女工人从車間裏跑了出來。女工甯金香看布場沒出來人，就說：“為嘛布場沒出來人哪？”她跑到布場門口就砸門。這時打手林宝琪上來揪住她往後一推，就把她摔倒在地上。她爬起來就抓住林宝琪的衣領撕打。其他女工也上來打他，林宝琪見勢不好，就跑到修理場。原來布場早被打手們把門給反鎖上了。里面工人急的跺脚捶門，但是，門是鉄的，怎麼出得來呀！

工人們拥到二道門，和軍隊成了對峙狀態。軍隊就橫着槍往回推工人，工人就往前冲，來回拉鋸。最後工人們一齊往前一拂，一下冲出了二道門。這時，被稱為“特務窩”的修理廠，門“嘩拉”一聲開了，鋸成一截一截的鉄管子，从屋裏飛了出來。有許多工人被打傷了，紗場一個小女工的头被打破了，血流了滿臉。

工人們一看這樣情況，眼睛都氣紅了。二道門口恰好堆了一塊磚，工人們把這個“特務窩”团团圍住，紛紛拿起磚頭往修理廠砸去！

鉄管子、磚頭、打梭棍、毛棍、紗錠子……在人們头上亂飛！軍隊看工人反抗就“乒乒乒乒”地放開槍了。女工何家庆站在台阶上嚷着：“工友們！別怕！他是放空槍

吓唬咱們呢！”

偽工會的打手們趁着放槍的時候，拿着凶器沖了出來。工人們和打手扭打在一起，許多手無寸鐵的女工揪住偽工會的人就用嘴咬……吶喊聲，撕打聲混成一片！結果，打手們倒被打了一頓；張金海脖子上挨了一刀，林寶琪手被磚頭砸傷了，還有的被打的嘴斜眼歪，跑到修理廠關住大門不敢出來。

這時從外面開進廠來許多大汽車，這是憲兵隊來了。一個個都掛着雙“盒子”，他們從車上扑扑通通的都蹦了下來。國民黨天津市市長杜建時，警備司令部的稽查处長，還有許多叫不出名字的官兒們也都來了，大小汽車擠滿了一院子。

工人韓樹和、吳通義、何家慶等忙着整理隊伍。四個人站成一排，準備着下一步的鬥爭。正在這個時候憲兵隊沖進了工人隊伍，女工尚寶珍剛說一聲：“走，不怕！”就被憲兵打了一個嘴巴。隨後他們就把吳通義從人群中架走了。工人們一看憲兵把人抓走了，又一齊擁了上來。

這時杜建時由憲兵保護着站在高處，準備對工人講話，但是他剛一張嘴就被工人們的喊聲堵了回去。

“把我們的人放回來！”

“把山西工人送走！”

“軍隊滾出工廠去！”

杜建時講話沒講成，又換了個尖嘴猴腮的稽查处長。他一上來就說：“我看大家還是給廠子里留點面子……”

“你是干什么的？”

“把我們的代表放出来再說話！”

工人們喧嚷着冲了上来，結果这个家伙也只好灰溜溜的走下台阶。

厂方一看动硬的失败了，打手們也不頂用了，只好改变方式来軟的。他們派人来叫工人选出代表去談判。韓树和、何家庆等几个工人代表在一起研究了一下，就来到厂长办公室。

当时在坐的有伪市长杜建时，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有警察局长，有伪工会的刘金山等人，还有代理厂长鄒廣华，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

杜建时首先开口說：“这个事得解决呀，总这样不开工也不行啊！”

代表們說：“我們第一个要求，就是把人送回山西去！”

杜建时斜了鄒廣华一眼說：“行，这也可以办到……”

代表們又說：“得把抓起来的工人放出来！”

杜建时又說：“……我想可以吧！”

“第三，我們罢工这一天，厂方得給工錢！”

杜建时点点头說：“这都行！”

沒有想到他們答复得这么痛快，韓树和想：他們这可能是一条詭計，因为这些人撒謊，比喝口凉水还来得容易。于是他跟問一句：“你們說的这些有嘛証明，……你們得給我們立个字据！”

鄒慶華不耐煩了，蠻橫地說：“答應不完啦嗎？還要什麼證明？”

杜建時接過來說：“可以吧！”這些人在一起噉了幾句，就寫了一個字據，用大信皮裝着交給了工人。韓樹和接過來一看上面沒簽字蓋章，就指着這張字據說：“你們不蓋章這玩藝兒等於無效！”他把字據丟在桌子上。

鄒慶華又忍耐不住了：“廠方領個幾千萬元錢都不蓋章，你們這個事還值得蓋章，……”

工人代表們站在那裡，根本沒有理他。最後，他們又湊在一處，噉一陣，一個個都在字據上蓋了章。

這次鬥爭勝利了。雖然，敵人的迫害工人的詭計還在後面。但是，由於工人們的英勇鬥爭，到底把壓在工人頭上的黃色工會沖激得落花流水，廠方也不敢不在表面上暫時退讓了。

二十六 法庭上的丑剧

深夜十二点多了，工人韩树和正在家里睡觉，忽然被一阵扑扑通通的声音惊醒。他翻身坐了起来，就听见一阵脚步声来到屋子跟前。一听就知道是有人从窗外蹦进来了。接着就乒乒乓乓地砸门：“开门！查户口！”

“查吧！”韩树和的父亲从屋里走出来把门开开，一下从门外闯进来好几个人，手电筒贼光光的在屋子里照来照去：“谁叫韩树和？”

“我！”

“你起来咱们谈点事情！”韩树和一看这种情况，就知道他们根本不是查户口，是来抓他的。他穿上衣服下了地。一个便衣拿着手槍对着他的胸口说：“走吧！”韩树和的母亲一看就吓哭了，她紧紧拉着儿子不放。韩树和安慰妈妈说：“不要紧，一会儿就回来，你把大棉袍给我！”他知道去了就回不来了！

就在这同一个时间里，有几个便衣正在第一宿舍单身女工住的屋子外面绕来绕去。女工何家庆听说有人找她开

会，忙着披上衣服跑了出来。到門房一看，是几个穿便衣的人，她一个也不認識。其中一个嘻皮笑臉地說：“我們是來請你去談件事情……”

“談什么事情說吧！”何家庆說。

“这个你到地方就知道了！”

这几个人把何家庆带到土城，推上了汽車。

另外，也还是在这个时候，周华亭正在車間里上夜班。忽然門口警衛給送信來說：“周华亭，你的父亲死了，叫你馬上回家……”周华亭一听，連手也沒有顧得洗，撒开腿就往厂外跑。他一出厂門，忽然上来几个人把他連推带拥就推上了汽車，开走了。

这一天从半夜一直到天亮，他們一共逮去了韓树和、何家庆、周华亭、王洪德、王庚英、臧秀坤、陈桂珍、孙秀英等十八个工人。

看，敌人这种抓人的办法是多么見不得人！很明显，他們干这种勾当是怕广大的工人知道的。

这个逮捕的工人名单，是鄒廣华、刘金山、靳成德等人开的，由靳成德和伪軍郑連长送給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

过堂的时候。第一个就把韓树和叫了去。問：“是你领导罢工？”

“不是！”韓树和回答。

“你还嘴硬……”

“厂里几千工人能听我十八岁小孩的，是厂方办的事”

不合理，工人不滿意！”

“你真會說！”審問的人把桌子上的紙一推說：“看！這都是關於你的情報！”

韓樹和一眼也沒看說：“我不認字！”

又問：“左振玉你認識嗎？”

“認識！一個廠子的人么，能不認識？”

“他是‘八路’，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哼！你不知道？”審問的人把桌子一拍，上來兩個人拿皮鞭子往韓樹和頭上身上亂抽一頓！

接着又問，他還是這幾句話。

又往頭上澆開水……！

折磨完了，把韓樹和推了下去。又把女工何家慶找來了。

何家慶一進門，這些傢伙們就把驚堂木一拍：“你是‘八路軍’煽動分子，你在廠內煽動罷工，你說，你是不是？”

何家慶搖搖頭說：“不是！”

“不是是嘛？”

“是工人唄！”

“……你在紗場飯廳組織秘密活動，策劃罷工，你說是不是？”

“不是！”

“不是是嘛？”

何家庆确是在纱场饭厅开过会，可是恰好这一次会并不是研究罢工的事，这分明是被伪工会的狗腿子看见了报告的。

何家庆说：“厂方和新工会制造矛盾，打伤了不少工人。我们发了工育，想大家凑点钱去瞧瞧这些受伤的人。”

“你不招，可是有人招啦！”

何家庆说：“不管是誰招了，我就是不招。不是，怎么能招！”

这时上来两个人打了何家庆两个嘴巴；审问官一挥手说：“好，把刚才那个叫来！”

不大一会儿，带上来一个男工。审问官气极败坏的指着这个男工喊：“你说，你不是刚刚说完，你们在纱场饭厅开会煽动罢工吗？……”

这个男工看着何家庆说：“我们是开会敛钱……”警察把这个男工踢了下去。接着用板子狠狠的打何家庆，她一滴眼泪也没掉，跺着脚大骂：“你们长了耳朵没有，你们为什么不讲理，你们想屈打成招啊！”

他们把每个被捕的工人都审问了一遍，一个字的口供也没有得到，最后没有办法了，用一条绳子把十八个工人拴在一起，解往天津市法院。

誰都知道，法院是判罪的地方。但是，没有罪名怎么能判刑呢，

当时代行厂长职务的鄧廣华，他在解放后判刑时的口

供上是这样写的：“……我建議叫工人具名控告，經厂长陈毅德采纳，由我叫林宝琪去办理。”

当时确是由伪工会的刘金山，靳成德和伪工会秘书楊勁鋒写了一个呈文。内容意思是：“厂内有少数不法分子，私通八路，煽动風潮，致使生产停顿……”下面写的是被捕的十八个工人名字。原告处写着“申紡四厂工人总代表林宝琪”。

写完之后，由刘金山和靳成德拿着找到林宝琪說：“现在人靠得住的还就是你，你这人我們信的着！”接着就和林宝琪一块到鄒慶华那里。

鄒慶华講：“不要紧，你去告吧，沒錯！”

刘金山和靳成德也說：“你就說是总代表，还不是手到擒来！”

托手林宝琪当时有点嘀咕，因为他們平日所作所为太恶了，自己也覺着心虛，便对鄒慶华說：“现在外边拿刀子等着我的多着呢，我可打不了这个官司。”

鄒慶华給他撑劲說：“怕什么，回头我在咱厂里給你找間房子，別回家去，看他們誰还能找你的事……不要紧，去吧，沒有問題。”

刘金山說：“你就是工人总代表！”接着把呈文拿过来叫林宝琪按个手印。

传票下来了。

厂里用厂长平日坐的小汽車，把林宝琪送到法院。

在法庭上一边站着的是十八个被捕的工人，一边是自

称“工人总代表”的林宝琪。

检查官装模作样地问了问林宝琪的名字、住处、岁数后，就开始拿着呈文对林宝琪问：“你知道他们谁煽动风潮，谁私通八路，……”

这十八个工人的眼睛一齐钉在林宝琪的脸上，林宝琪被这些愤怒的眼睛看的老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一群青年工人中，确实是一个共产党也没有。这一点林宝琪心里明白，因为他们根本也没抓住谁通“八路”的证据，呈文是捏造的，他的这个总代表是自封的。现在，他如果咬一句谁是“八路”，那这个人就是不死也得被剥层皮。

可是厂子派他来顶着打官司，不用说厂方和伪工会就是要他把十八个人都咬成“八路”的，他一想，一下得罪这么多仇人，官司打赢了，他自己也活不了——因为这一群人哪一个没有父母弟兄，亲戚朋友，将来若是知道了是谁告的，谁咬的，早晚不拿刀子捅了他！这个打手想到这里，不由地心里也哆嗦了。他吭哧了半天对检查官说：“罢工的人多，我看不清，谁私通八路我也记不准了！”

检查官把惊堂木往桌子上一拍，指着被捕的一群工人说：“把他们带下去！”

工人们被领到窗子外面去。

屋子里只剩下检查官和两个法警。这个官可火了，他指着林宝琪说：“林宝琪，你写完了呈文，到这里你又说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说！”

林宝琪說：“不見實，我不敢說！”

檢查官變了臉說：“你在廠子里，廠長是怎麼安排的，你在廠長那里出風頭，你到這又不照呈文說……這是你按的手印，你今天不照呈文說，我把你扣起來！”

林宝琪說：“不客氣的說，那呈文是廠子里寫的，他們叫我按的手印。”這個流氓打手當然不傻，他明白在法庭上就是挨頓打，也比回去在半路上叫人拿刀捅死了要強的多。所以，檢查官訓了他半天，結果白費了唾沫。

這一堂算沒有過成，被告沒有口供，原告沒有訴詞，法官生了一肚子氣。

林宝琪回到廠子里，見着劉金山就狗咬狗咬起來了：“我是沒照呈文說，你們怎麼不去，你們叫我去得罪這麼多仇人……你們拿我添餡呀，我不干，我他媽的也不是傻子！”

結果，這場官司打了半天還是沒有口供，論理說過堂沒有口供是不能定罪的，可是國民黨的天津市法院却也給這些工人定了罪了——罰他們作苦力；誰家能湊幾個錢到法院去煩人活動活動，誰就早出來幾天，誰要是沒有錢，誰就還以莫須有的罪名在里面干苦力活兒。

二十七 报喜的枪声

一九四九年一月，正是冬天。

天津市被国民党陈长捷的军队闹得乌烟瘴气。他们在大街上见人就抓去修碉堡、挖战壕。陈塘庄、下河圈一带的民房拆了许多，把木料都运到城外去修工事。国民党的官儿们就忙着抢飞机票准备逃跑。兵们就到处抢劫，被赶出来的老百姓只好拉儿带女在大街上住窝铺。

工厂里隔不上三天准出一次布告：因时局紧张，暂时停工×日，工资给百分之五十……。有一天，忽然厂长陈毅剃了个光头。鄒廣华和一些平日西装革履的职员们，“沙船”皮鞋也不见了，西服领带也入库了，一个个都穿上了布袄、棉袍；脚上换上了“洒鞋”。年龄稍大一点儿的，索性留上了小黑鬍了。

穷苦的工人们可并不害怕，因为大家早就象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这一天了。在工厂里到处都能听见人们惊喜的议论：“别怕！共产党就是对咱们这样的人好！”还有的说：“我岳父在解放区，我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别

听他们瞎嚷嚷！”还有的人索性谈起从住在农村的亲戚朋友、老乡那里听来的关于解放区人人有地种、有饭吃、劳动光荣等等故事。大家都等待着，偷偷的传递着好消息：“解放军过了灰堆啦！”“西营门攻下来啦！”人人都象等着一件最高兴的事情就要发生一样，又着急又紧张。厂子里到处都会看见三五成群的工人在一起小声谈论，见到有人来了又都走开去干活。

一月十四日下午，突然天空飞起了许多红红绿绿的信号弹，枪声越来越密。它告诉人们，灾难重重的天津就要解放了。

当天夜里，驻在南场的陈长捷的军队吓的慌的滚爬的爬，一夜之间全跑光了。在厂门口的太沽路上扔的黄乎乎一窟子弹，还有子弹箱子、军装、步枪、手榴弹……。厂子里的驻厂伪军早就换上了便衣，偷偷的杂在职员和工人中间，把枪都捆着放了起来。

十五日天刚蒙蒙亮，解放军分三路进了工厂。在前面的是一个拿手枪的解放军，他带头冲进了六楼办公室，喊了一声：“不许动！”这时陈毅德、鄧震华等许多人，都从桌子底下、柜厨里边、小屋里举着两只手钻了出来，一个个自动站了一排。解放军问：“都准备好了吗？”陈毅德忙着回答：“都准备好啦，都准备好啦！”随后驻厂的伪军把已经捆好的枪枝抱了好几抱，恭恭敬敬的放在解放军面前。

就是从这一天起，工人真正见到太阳了。军事代表彦

有余、何錫福進廠和工人見面，他們穿着朴素的灰布軍裝，平底布鞋，見着工人就笑着打招呼。過去的廠長室是工人根本不能去的地方，這個時候工人總是一群一伙的去廠長室找軍代表問長問短。象賈歷文、王玉亭、王淑珍這些小姑娘，下了班就去找軍代表學習唱“東方紅”，聽講解放區勞動英雄趙占奎的故事。工人們不論是在家里在廠里，只要看見軍代表，總是有說有笑的圍上來一大群。

後來，工作組搬到工人宿舍去辦公。他們訪問工人，準備恢復生產。並且公布：原級、原薪、原制度。接着就開始整頓伙食、研究工人的福利問題。不久，左振玉同志也回來了。他在黨的領導下，很迅速的又恢復了英勇的，有過光榮鬥爭歷史的紅色工會。

因為工廠保護的好，很快就開工了。在一次職工大會上，軍事代表彭有余講話說：“我們要推倒壓在我們勞動人們身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要把革命進行到底。站起來當家作主人的工人階級，要帶頭髮展生產，支援前線，解放全中國。”就在這次會上宣布：“今後工人要當家作主人，取消污辱工人的不合理的搜腰制度。”

大家一邊聽講話，一面你瞧我我瞧你的直笑。粗紗有個老工人感動的說：“我干紗廠30多年，還沒有嘗過不搜腰的滋味呢，今天真是叫咱們工人當家作主人啦！”

門口一排一排搜腰用的鐵欄杆被拔掉了。工人們上下班挺着胸脯從廠門出入，真是從心眼兒往外樂！許多工人

自动把过去“偷”的厂里的电綫、皮帶、搬子、鋤头、鑽等等都交还給自己的工厂。

在那些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里，工厂的院子里、車間里，到处都可以看見工人在自动的擦机器、清理車間、收集废料、整頓倉庫……。并且是不論走到那里，都能听见快乐的唱“东方紅”的歌声。

二十八 槍決商子林

从解放那天起，厂子的领导上接到检举商子林的信就跟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飞来。这些检举者有的是被商子林打死的人的家属或是朋友，也有的就是被商子林打成残废的工人，也有的做儿女的检举商犯对其父母的毒打和侮辱……。

老工人王相臣在检举信中写着：“过去工人干一天活吃不饱，没法就偷一点线或布头，下工时将心提到嗓子眼上，那时最怕的是万恶的走狗商子林，若是让他搜出来就是九死一生。有一天工友李凤楼偷了一点布被他搜出来，把李工友吊在铁杠子上，一阵乱打，打的他连屎带尿装了一裤，快打死啦！日本鬼子不叫他再打，他背着鬼子暗地里打。还说：我见了中国人就有气，他一天不打几个人就不过瘾……。摇纱女工魏小妹，偷了一团线，他把她的衣服脱的一丝不挂，锁到汽车房，头朝下吊起来，用水龙头的嘴对着阴道冲水。那时正是十冬腊月。小妹回家后就得了子宫病死了。这样万恶的走狗，不能叫他逍遥法外，咱新

社会有关部门，应该把他逮捕起来，还我们工人的血债。”

另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商子林外号人称‘商閻王’，受过他害的人是数不清的，上下班时，‘閻王口’真难熬。有一天一个女工，下班晚走了会，他不叫出門，叫女工脫褲子說：你一定是挂了东西啦！吓的女工就哭了，他站在女工面前冷笑着說：別他媽的跟我来这套，中国人还有什么羞臊，結果把女工弄到小屋去啦。”

准备甲班五組的檢舉信上說：“商子林見工人‘偷’东西，冬天就吊在鉄杠子上，先用热水往身上潑，完了再用冷水潑……。”

抄录这些信件三天三夜也是抄不完的。

人們自然要問，他这么大的罪恶，怎么国民党沒槍斃他呢？那是这样的：商子林在日本統治时期，和一个姓齐的守衛合伙偷修理厂的皮帶被左振玉看見了。左振玉告訴了日本鬼子：“女工小小的偷，他打的这么厉害，可是他大大的偷！”这样日本鬼子就把他抓住了。鬼子把他送到宪兵队挨了頓打，以后他再也沒有回厂。

日本投降，国民党来了，工人以为中国政府来了，对汉奸一定得懲罰呀！当时麻場就有几个工人商量找商子林报仇，沒想到商子林却穿上了国民党的軍装，当上手槍班和警备队的官了。这样工人誰还敢惹他，有的工人會給那时的警察局写信，檢舉他。可是，国民党政府根本就沒理睬。施长月在解放桥一带拉地車时看見过他。施长月說：“那时仇人見面，真是火串到脑門子，恨不得馬上过去狠狠的揍他一

頓。但又一想：不行！只能眼看着他在那抖威風不敢動他。

解放了，这个万恶的汉奸跑的沒影儿了，工人們紛紛写檢舉信，帮助政府寻找綫索。这个狡猾的东西，終于沒逃出人民的巨掌。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日，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蔚藍色的天空，万里无云。上午八点多鐘时，毒辣辣的太阳已經高高的挂在天空，厂里所有的工人就象办喜事似的，一个个笑容满面，直奔操場走去。虽然，天那么热，操場上連棵樹也沒有，可是工人們都有秩序地坐在地上等着。有的夜班工人剛剛开完生产會議，也奔来了。不了解情况的人，听說要开控訴大会，就問：“控訴誰？”

“商子林。”

李师傅又問了一句：“誰？”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

有人拉着长声說：“商——子——林。”工人們乐的跳起来嚷：“报仇啦！”

操場上坐滿了三千多工人和許多家屬，人是一眼望不到边。台上橫挂着：“控訴汉奸恶霸商子林大会”几个大紅字，四周挂滿了喇叭。喇叭里正放着“白毛女”选曲：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

赶走了寒冷，

天上地下都照透！

.....。

大会由厂級党政工团組成了临时控訴委员会。主席宣布开会，霎时会場上鴉雀无声，靜听着主席的講話：

“……汉奸商子林，解放后逃跑到遙远的江西省南昌，离我們天津有二千多里地远，但是我們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終于把这个万惡的商子林，依法逮捕归案，血債要用血来还；……。”会場上頓时响起了春雷般的掌声。这时听到囚車的声音，由远而近，越来声越大。不知誰說了一句：“来啦！”人們有的拾砖头，找木棍，也有的把皮带解下来都准备着打。囚車停在操場的右边，人們拥了过去，把車围了个水泄不通。法警把車門打开，从車里推出一个人，他剃着光头，头上围着一塊白毛巾，白粗布对襟的中式小褂，裝的眞好象老实农民一样。認識他的人，都异口同声的說：“嘿！这小子裝的倒象啊！”这时人們都沸騰起来乱喊：“打死他！”“打呀！打呀！”“拿刀子刮了他！”商子林被押上台，跪在台的右边，砖头就象雨点一样飞向他的脑袋。紧接着控訴开始。粗紗工人施长月和死去的女工魏小妹的女儿魏金弟等都一一上台控訴。有的同志提起过去的痛苦，难过的當場昏了过去。工人們一致要求政府給商犯以严厉的懲办。

为什么工人們这样恨商子林呢？提起他来，沒有一个不知道的。就連十几岁的孩子也可以說上几件商子林的罪惡事。

日本統治时期，商子林經常搖着脑袋說：“我看見了中国人就有气！”他不高兴时見了人就打，挨打的人都不

知是为什么！

一 商子林叫工人偷，卖的錢工人得分給他三分之一；不然的話就得叫他毒打一頓，或是在日本鬼子面前給你說点坏話，开除你。更可恶的是还想着法儿陷害工人。譬如有一次，他对浸紗工老张說：“你明天上点貨！”老张一想：他讓我上貨，不偷吧，他明天得找我要錢；偷吧，挺害怕。不过最后还是为了不敢得罪他，情願去冒冒险。老张轉天帶了一些錢，下班時商犯直接从挨个等檢查的人群中把他拉出来了，并且对着日本守衛队长桑田說：“他的小偷地干活！”日本队长一搜果然不錯，滿身都是錢。当时商子林毒打了老张一頓，后来还开除了。

控訴大会一直开到太阳在正南方，沒有一个人早走的，也沒有人去歇阴涼的。法院代表講話，他表示：要为工人作主，为民除害……。最后高呼口号：“血債要用血来还！”

“要求政府給我們报仇！”大会在欢乐的歌声中結束了。

沒过多少天，厂子門口貼出了一张紅色显目的大字报，写着：“今天上午七点在厂子对过槍斃商子林。”工人们喜欢的互相奔走相告。领导上为了照顧早班的工人，停了一个多小时的車，大家都跑到刑場上去看。商子林就是在他横行霸道过的地方，在我們工厂的前面，被槍决了。工人们激动的喊起了口号：“感謝党和政府給我們报仇！”“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們要用生产成績来回答党和人民政府！”。随后就是热烈的掌声，直到执行的汽車走远了，手掌都拍的疼了，大家才欢乐的奔向車間。

二十九 搬掉石头做主人

解放以前，車間里是把头的天下。在厂里最出名的有麻場的“錢家五虎”；粗紗車間的“三大強”；准备車間的“三十六友”；細紗車間的“张家皮輪房”、“三大王”，这些把头都是厂方的忠实走狗，他們和伪工会勾結起来，在車間里打人罵人，强奸妇女，勒索敲詐，真是只許他們放火，不許別人点灯！哪个工人上班来不是提心吊胆！誰也不知道一天会碰上什么不幸的事情！

工人們見了把头，真是混身打哆嗦，尤其是女工們。在織布場里有个有名的“混身流坏水”的把头刘鳳山。他把准备車間的女工都編上号：一万，兩万，三万，四万……。 “万”的意思就是长的好长的坏，值多少錢！他得意洋洋地把坏蛋流氓往車間里領，他对打手楊振生說：“我們車間里开窑子，我是老板。”并且說：“你看×××的大腿多白呀，你敢去摸她大腿嗎？”他要是一高兴，工人可就遭殃了。他冬天穿上兩件棉袄，然后把車間的窗子全打开，冷風从外面灌进来，穿单衣干活的女工立刻冷的

工立刻冷的縮成一团打战战，他死死的看着女工，咧着嘴毗着牙乐。乐够了就打人。常常是不知为什么从第一部車打起，每人給一个嘴巴，一直打到那头。一天，穿扣女工张玉珍被他打的眼睛里含着泪，混身哆嗦，一下被他看見了。这个流氓把头一歪問：“你哭！为什么不哭响？”接着就又劈头盖臉的打开了，……一直打得这个女工放声大哭，喊爹叫娘的求饒他才住手。他在准备車間管推軸，可是他上班来总是推“牌九”，軸沒有了，車就停着。女工关玉琴找到他說：“刘先生再給推一个軸吧！”他正打牌，一下就跳起来火了；拉住关玉琴的胳膊，从浆紗車間一直打到穿扣的屋子里，按着关玉琴的脑袋往机器上撞，撞得她满头是疙瘩，臉上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以后落下了个抽筋的病，一直沒有好。

女把头王淑珍在把头里拜干姐妹排行第七，工人見了她都得叫“七姑”。这些女把头都是一天三脫四換，說穿青的都是一身青緞子衣裳，說穿白的都是一身白。上班来油头粉面的往車間的椅子上一坐。好几个工人围着她轉，按时候給她把雞蛋冲好送去，不住的給她端茶倒水，她睡覺了还得給她盖上被。

她的媽媽一年做兩次寿，誰要不送礼就給小鞋穿。

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她对許桂荣說：“桂荣啊，我媽媽明天过生日，你打算送点什么呀？”許桂荣本来家里就沒有吃的，經她这一問，不知怎么回答好，只連連說：“我回家跟媽商量商量！”

許桂榮到家一說，媽就說：“眼下沒吃的，拿什麼送禮呀，她媽不是一年做兩次壽嗎，下次再送吧！”

沒想到第三天一上班來，王淑珍就變臉了：“哼！我看你找倒霉！”當時她就把許桂榮看車的錠子數給改了。本來看三百四十個錠子，給改成三百二十個錠子。那二十個錠子的錢，王淑珍就入了自己的腰包。發錢的時候，許桂榮明知道錢少了，自己干些窩裡話，但是也不敢找她問。

她想叫秦桂榮給她送禮，就想出個壞主意擺布她。她明知秦桂榮手頭慢，看不了一台車。就強迫她去看一台不好看的車。秦桂榮哀告地說：“七姑，我看不了！”，她一瞪眼：“你看不了開除你！”秦桂榮只好掉着眼淚去了。剛看不大一会儿，就開大花了（即頭部斷了），秦桂榮很害怕，就找王淑珍說：“車開花了。”王淑珍正想找她岔呢，不問青紅皂白，上去就是一頓大嘴巴。打着不解恨，又揪住頭髮往牆上碰，頭髮被揪下來一大把。後來又從屋裡拉到外面去打。夜間兩点多鐘，她把秦桂榮推出紗場的大門說：“你被開除啦！”

一卷實的秦桂榮被打的滿身是傷，回家不敢對媽說。直到她媽看出來問她，才知道她挨了打。娘兒倆哭了一回，沒法，還得想法上班呀；秦桂榮的媽媽領着秦桂榮到王淑珍家，娘兒倆給她下了一跪，才算又讓她回廠干活。

一些男把頭就想各種方法勒索工人。“錢家五虎”之一錢長祥，在麻場是一霸，誰也惹不起。工人一發錢，他就拿着木盒子說：“該請客了吧？”工人哪管家裡孩子老

婆三天三夜沒吃飯了，也得狠狠心拿出錢來給他。

過年過節他在廠里賣吃的，他賣的比外邊貴，可是工人還得買他的。

一次一個女工不知為什麼得罪了他，他青天白日當着許多工人的面把她推倒，往身上撒尿，然後就往死里打。

提起粗紗的“三大張”來，更是人人咬牙：他經常帶着一把刀子，看中哪個女工就強姦。

還有精正車間的楊秉鈞（即楊少臣），他為了達到污辱女工的目的，利用職權，隨便開除工人，扣工資，給小鞋穿。逼的許多女工上吊自殺，以至隱姓改名跑到外廠去不敢露面。

至於這些把頭們打罵工人更是不計其數。如細紗車間女工王淑華被打的當時死過去兩次；胡玉珍的胳膊被打折了；張玉昆一天挨四次打回家就吐血得了心臟病；張金榮在班上有急病他們不給假，結果到家就死了！

這些禽獸不如的封建把頭，都是偽工會的暗探爪牙，特務腿子。他們大部份都是日偽時期的“整裝隊”、“特務隊”、“保安隊”、“三一部隊”、“國民黨”、“青幫”等等反動組織的成員。

他們就象大石頭一樣，壓在工人頭上，使得工人別說直起腰來見見天日，就是大氣都不敢出！

解放了，這些壞蛋突然都變了。見着工人也點頭彎腰的說話了，還穿上了制服假裝進步。可是暗地裏還在繼續作惡。如楊秉鈞，對工作不負責任，使得合股機銅瓦燃

燬停產；并且还繼續玩弄女工，威脅×××不准搞對象結婚，并且說：“你搞對象我拿刀子把你們倆都捅死，等國民黨來了我跟你結婚。”

他們在車間里破壞工作制度，排擠積極分子，阻撓工人訂生產計劃……。工人說：“車間里有他們，我們就不能徹底解放！”“要在生產上前進，就得掃清道路，搬掉石頭。”

黨滿足了工人的這個要求，在一九五二年八月，繼續壓反革命運動以後，偉大的民主补课轟轟烈烈的開始了。工人把這些壞蛋一個個都撈了出來。黨和人民政府給工人撐腰，在布場大禮堂召開了全廠的控訴大會，那些過去被他們欺壓污辱的工人，今天都站起來了，讓這些壞蛋跪下，低頭！工人向他們鬥爭，講理倒苦水……。政府接受了工人的意見，當場就把這些壞蛋逮捕法辦。多少年來騎在工人頭上為非作惡的封建把頭劉鳳山、張玉田、楊秉鈞（即楊少臣）、張奎海、王淑珍、錢長祥、張金貴、張金榜，都判處了徒刑。

搬掉了大石頭，當家做主人，工人們擦掉眼淚，帶着勝利的歡笑，向黨寫決心書，寫提高生產倡議書。那個時候，真是我們廠子有歷史以來第一次歡騰的時刻。你從織布場，到紗場，到麻場，看吧！牆上，機器上，辦公室里，走廊上，到處都貼滿了紅紅綠綠的大字報，上面密密層層的都是工人的簽名。你想吧！一個名字一顆心，一份力量，再加上黨的領導，我們工廠的生產怎麼不會是象跨上了千里馬一樣，一日千里以至萬里呢！

三十 一次光荣的纪录

站起来的工人阶级，成了工厂的主人。过去挨打受气的童工王淑珍，今天成了出席全国群英会的劳动模范，并且代表中国纺织工人出国进行了技术表演。过去被踩在脚下的清花保全老工人陈志，布场保全工吴乃扑，电气工人杨锦升，织布工人杨恩成，粗纱工人葛国起……，今天都成为本厂的工程师、车间主任以及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在党的领导下，几年来在生产上创造出许多我厂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成绩。先不谈许多工人成长为红旗手的故事，也先不谈我厂从1954年以来连续被评为天津市模范厂，以及1959年被评为出席全国群英会的先进集体的事迹，在这里就讲一讲我们厂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创造“零分布”的故事吧！

要讲创造“零分布”的故事，得先从解放前的生产情况谈起。

我们厂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厂里出的布是“飞马牌”。那时候一提“飞马”市布，不论工人和群

众；都会摇摇脑袋摆摆手说：“不行！比不上‘大五福’和‘阳光’。”确实是这样，“大五福”和“阳光”是全国馳名的好布，就連我們厂的工人也看不上本厂出的布——布面上的小黑点（杂质）就象燒餅上的芝麻似的，黑糊糊的一片，窟窿象大大小小的蜘蛛网。为什么質量这么低劣呀？原因很多。誰都知道，当时工人一天干12小时的活，还吃不飽穿不上。車間里夏天象大悶罐热的喘不过气来，几乎哪一天都有昏倒的工人从車間抬出去；再加上餓的眼睛直冒金光，又不断的挨打挨罵，誰有心好好干活呀！”

另外，厂里的一大部份机器都是在青島被火燒过的，缺胳膊少腿，日本鬼子为了賺錢又把它运到天津来开厂子。机器是該直的不直，該平的不平，都不成規矩。簡直是沒娘的孩。厂方光算計喝工人的血汗，工人被剝削的一个个面黃肌瘦，誰还有心思管机器！坏了就拿榔头砸砸，再不就用鉄絲纏纏，有时还用綫繩綁綁，反正湊合着开起来能轉就行了。

那个时候車間里到处飞着迷眼睛的棉花毛，房梁上堆的有四、五指厚，堆的太多了就“叭嗒”掉下一块来。織布机上象穿上了白袍一样，都看不见机器的黑色。要是从房上往下看，就恰好象剛下过雪的一堆一堆的小坟丘。一进布厂就可以看見許多白布吊在房上，这是为了防备屋頂上淋水滴嗒下来弄脏了布，所以用布兜着。

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能織出来好布呢？

1949年解放后，厂子里發生的每一件喜事都鼓舞着大

家的生产热情。机器经过检修也翻了身，被擦得油黑闪亮。真是党指到哪里全体工人就做到哪里。在1957年年底，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市纺织管理局提出要搞“零分布”，党委号召：“要从人民的需要出发，过去的布穿在身上只穿一年，现在就要穿一年半，两年。要把质量最好的布，献给国家献给人民。”所谓“零分布”，简单的说就是：一匹布连头发丝这么细的一点残都不许有。全匹都是优等布才算“零分布”。这个战鼓敲响以后，整个厂子象开了锅一样，真是人人心里都沸腾了！不论是老工人，学徒工，以及勤杂工甚至是家属，你随便问他：“现在厂里的中心任务是什么？”都是很快的回答：“搞零分布。”

有一次市里的一位负责同志到厂里来视察，他从第一道工序的清花车间起，直视察到粗纱、细纱、浆纱、络布、整理，不论哪个工人，都是在紧张的工作着。因为全厂的职工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为“零分布”创造条件。在前纺的工人提出来要“猛攻不匀率，大战油色棉”，在细纱车间展开了“捉疵点”“捉疙瘩”的竞赛，争取不纺粗线，以优级纱供给布场。

准备车间提出：为了“零分布”要出“零分轴”，保证所浆的纱百分之百达到标准。

食堂的师傅们提出：为工人准备了应时可口的饭菜，花样多，保证工人健康。

科室同志的工作都面向车间。有的同志在深夜还到车间去给上夜班的工人送水，送手巾把，帮助做机器上的清

潔工作。

布厂的工人情緒就更高了，車間里各个工区的牆上都貼滿紅紅綠綠的挑战書，决心書，感謝信，表揚先进的大字报。修机工人楊克貴写了一首詩：

过草地爬雪山，
紅軍不怕远征难；
我疵点是小殘，
英雄面前没困难！

看这些大字报：

我們丙班八工区为了提高零分布（一軸二匹零分布），决心要和甲班同志并肩作战，歼灭一切敌人（小殘），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我們全組：馬素卿、刘克敏、刘长文、孙玉順、王繼英，在明天上早班求助战。

丙班八工区

我們青年扫車小組的小伙子們，为了配合車間实现一軸兩匹零分布，要在下班后把車間1008台机器的大小毛刷，梭籠子，接梭盒等部分做到彻底清洁，坚决奋斗到底。

織整車間青年扫車小組

我們青年突击队，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一軸兩匹零分布，坚决鼓足革命干劲，要在关車后突击1008台“龍門档”，不消灭风棉决不罢休。

日常班青年加油小組全体

乙班麻紗全体副工长，为了学上海、赶上海，决心歼

影响零分布的敌人——小残。以黄继光的精神突破70%
的零分布，决定干到夜两点。

吕大来、杨克贵、王相文、任文忠、
林金凤、翟玉兰、李志国

乙班工段的同志们决定在今天夜里重返前线，用猛烈的
炮火向影响零分布的敌人——小残展开激战，保证今天
夜里拂晓前要攻占70%零分布的最高据点。

坏纱侦察速，明日全体出征。

丙班上轴工、加油工、纱房的同志们明天上午7时乘
厂帮助歼灭坏纱，保证消灭坏纱，为夺取零分布斗争到底。

梭子组保证：

1. 出勤率100%，上班早到一小时，晚走半小时。
2. 全面检查，保证梭子质量高。
3. 包打车间纬缩关键。

表扬：宁培香自从织麻纱以来，一匹次布也没出，他
是工作中的干将！

表扬：小孩母亲田桂珍下班不走，苦干到9时。小孩
母亲朱桂珍二十四日早晨三时就来厂支援两班。他们的共
产主义风格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感谢支援我们的整理丙班，木管房，梭子组的全体英
雄好汉！

布 场

这些大字报象万朵鲜花一齐开放，工人们就在这些鲜
花围绕着的车间里，为实现自己的决心紧张战斗。机器轟
轟响着，布就象从机器里往外倾泻的流水一样！每台机車

上都挂着小牌，一面写着“零分”，一面写着“有残”。每个工人，都以自己在交班时小牌上还是“零分”两个字，当做最光荣最高兴的事。

在交接班的时候，该上班的同志早早就来了，可是该下班的同志都迟迟不走，互相帮助查布面做清洁。青年徒王和清洁工索注赶也不走，帮助生产的工人装梭。

到下班的时候工人不走，党总支書記只好到車間去赶工人回家。当时工人们答应一声說：“嗯，回去！”可是象“捉迷藏”一样，一轉身就又回来干上了！没有办法，在車間办公室召开了个临时会。支部書記吳乃朴同志說：

“小孩母亲一律回家休息！”青年男工們高兴的跳起来嚷：“对！对！”

可是小孩母亲們都急了，紅着臉对总支書記提意見：

“我們不走！为什么不讓我們妇女留下？”

青年們得意的說：“你們有小孩應該照顧！”

“我們小孩安置好啦，有人照顧！”

总支書記和車間主任看誰也不走，只好指名說：“你留下；你走！”

被指出叫走的工人就急了：“走，为什么叫我走？”領導上实在沒有旁的办法，就說：“这是組織决定！”但是，还是不願走。就接着耐心的說服：“休息是为了給明天的大干准备力量……”直到說得工人答应了，穿上衣裳出了厂門。可是，沒过多長時間，这些走了的工人，又在車間里出現了。女工张桂珍，家住在挂甲寺一带，过去每逢下

晚十点班或者上夜班的时候，总要年迈的父亲接送她。可是，有一天她应该上早六点班，她在家睡了一小觉，醒来一看表正是夜两点，忙着穿上衣服就往厂里跑。胡同里黑的对面不见人，她深一脚浅一脚的穿过了胡同奔上大马路。当她来到车间，工人们都惊讶地问：“你来的真早啊！谁送你来的？”张桂珍楞了一下笑嘻嘻地说：“我自己来的！”“嗨！你不是害怕吗，怎么胆子也变大了？”

张桂珍自己也觉得奇怪，她想了想笑着说：“我一路上心里光想着零分布啦！”

工人就是以这样忘我的热情，不仅苦干还加上巧干，改进了大毛刷、小毛刷、切緯刀的位置、打梭板等等，消灭了布的脱緯和毛边的现象。并且还到兄弟厂去学习，到青島去“取经”。终于战胜了一切技术上的困难，优質布的产量达到了一千匹布中只出兩匹次布的最高记录。

俗語說：“行家眼里揉不进砂子”，1958年春天，在青島召开了全国紡織业質量會議。会上把从全国各地带来的样品編成号放在一起，然后不記名投票。評比内容包括：測驗布的强力，經緯密度、柔軟度、布色、光澤、疵点、有殘沒殘等項。我厂生产的哩嘜被評为全国第一。

我們的工厂在偉大的共产党领导下，和全国的工人兄弟一样，正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不断的創造新的成績，那个生产“飞馬牌”的时代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

后 記

一九五八年春，市委指示要在全体职工中进行一次“为谁劳动”的教育。根据指示精神，我厂开始发动群众，掀起了想过去看今朝，大写回忆录的高潮，并编写了厂史连环画。收集解放前工人劳动条件及日常吃、穿、用等照片和实物，以及过去特务把头们用来打骂工人的凶器，采取新旧对比的办法举办工厂史展览会。许多老工人回忆起过去的痛苦生活流下了眼泪，一致表示：要在实际工作中为建设社会主义献出全部力量。有些青年工人看完展览以后，在意见簿上检讨自己比生活、比待遇、不爱劳动等错误思想。使得全厂职工意气风发，在生产上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局面。

为了把我厂过去的生活和斗争用文字记录下来，以便更好的教育职工，由市委宣传部为我们邀请了天津市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同学来厂帮助我们编写。他们不眠不休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反映工厂发展全貌的一部通史和一部厂史资料。这个工作为我们这一次重

新編写工厂史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这次的編写工作，是在天津作家协会的輔導下，剧作家于雁軍同志直接下厂，党委抽調工人徐启霖、楊克珍共同組成了編写小組編写的，插图是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美术編輯吳燃同志的帮助下由工人王羽来同志画的。在編写过程中，并邀請我厂在敌人統治时期領導斗争的地下党员等同志以及本厂73名老工人，科室干部，参加了这个工作。計参加座談，写文字材料，以及从包头、北京、石家庄、邯鄲、保定、天津市寄来回忆信件的就以下这些同志：

万連海	王丕起	王 忠	王学良	王玉文	王洪德
王振庭	王明紡	王樹宝	王湘文	龙玉琴	孔繁涵
石小三	石金龙	田德奎	史福渊	史桂珍	卞长保
刘洪升	刘玉蘭	刘广玉	宁培荣	任宝和	任文忠
閻花珍	苏志成	李洪書	李子华	李希灵	李桂蘭
李秀荣	李德宣	李永惠	李洪恩	沈文光	何錫福
何家庆	林貴生	东玉珍	高俊和	高丽芬	高俊洲
荆鳳有	岳时岱	侯玉亭	施长月	紀雪元	陆琦珍
陈金荣	张广相	张广惠	张文玉	张舒怀	张桂珍
张又發	张树堂	张成清	景淑敏	郭鳳华	董岳奎
孙少华	楊恩成	賈秀荣	賈历文	樊宝昆	魯秀珍
韓景和	韓树和	韓志云	韓树德	等。	

这一次工厂史的編写，也可以說是我厂工人为进行自我教育編写政治教材的一次規模較大的集体創作。

我們进行这项集体創作的基本方法是：集体回忆、

統一編寫。即根據大多數人對某一事件的回憶，然後由編寫小組統一安排和編寫。廠史資料的主要來源是依靠我廠老工人的回憶和口述，和當時領導我廠鬥爭的一些地下黨員同志們的幫助收集起來的。如現在任天津內燃機械廠副廠長的左振玉同志，是我廠在過去黨所領導的進步工會時期的理事長。他的工作很忙，但是他犧牲了許多休息時間給我們介紹當時的鬥爭情況，提供當事人線索，有時直到深夜十二點還不休息。又如遠在內蒙古包頭市建築公司工作的蘇洪年同志（即蘇志新），白天因為工作忙抽不出時間，曾一夜未睡為我們寫了長達數千字的材料。現在保定工作的當時的地下黨員宋文鼎同志，熱情的為我們介紹了當時參加鬥爭的一些同志，使得我們能夠多方面的進行了解。我廠的許多老工人，曾經開過近百次座談會。象布廠老工人王忠同志，過去沒念過書現在他還在業校學習，就熱情提著考他們在日本統治時期工人自動的組織起來罷工鬥爭的情況送給我們。清花車間老工人郭鳳華，在炎熱的夏天中午不休息，自動的找到編寫小組講述工人過去怎樣受打手把頭壓迫和怎樣作經濟鬥爭的情況，並且幫助我們收集各方面材料，讓我們去深入訪問。象王奎起、蘇志成、韓樹和、王樹寶等許多工人同志，只要找到他們，總是一遍又一遍的百說不厭的幫助我們仔細的了解當時鬥爭的情景。還有許多老工人到處為我們打听線索，隨時隨地的告訴我們。其他如各個車間的負責同志，不論生產和工作多麼忙，都對廠史編寫工作給予很大的支持和關心。這就使

得我們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都能够尽快的克服。

为了使材料更真实全面，我們除了請领导和参加斗争的老同志、老工人閱讀我們編写的初稿外，我們还訪問了天津市历史博物館，到法院和公安局翻閱过解放后判刑的我厂在国民党統治时期代行厂长职务的鄧廣华，和工賊刘金山等許多封建把头，特务打手們的口供和判決書，以及通过一定組織手續所取得的口述材料。查对了我們保留的一些历史資料及到外地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查証。

我們在这里所写出的，还仅仅是我厂工人在敌人統治下二十多年来的生活和斗争的历史。解放以后的历史我們写得还很少，而解放后，随着国家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我們厂也相应的进行了新建和扩建，职工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修建和扩充了职工宿舍、俱乐部、托儿所、幼儿园及职工工业校、职工子弟小学等福利設施。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在生产方面也是奇迹層現，人材輩出。工厂工人为社会主义建設所提供的劳力和智慧是極其巨大的。因而我們将来还要更进一步發动全厂职工，来編写我厂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在党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反映当家做主人的工人階級新的生产和生活面貌的工厂史。

中共天津國棉四厂委员会

